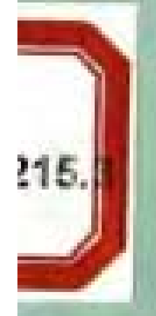
海耶克論海耶克

對話式自傳

Hayek on Hayek:
An Autobiographical Dialogue



自由主義
名著譯叢



F. A. Hayek ／著
Stephen Kresge & Leif Wenar ／編
李華夏・黃美齡／譯

海耶克論海耶克 對話式自傳

本書是半自傳式的著作，主要來源有兩種，一爲海耶克自1945年開始親自撰寫的「自傳筆記」；一爲專家學者們與海耶克的對談記錄。

全書以海耶克的生涯爲經，以各階段的著作爲緯，將海耶克的心路歷程，以及各本重要著作的產生背景和主要意涵，用輕鬆筆調委婉道出。

對海耶克這位直言不諱，一生堅持市場經濟立場的智者有興趣，或想對其思想鑽研者，實在應先由此書建立起與海耶克的心靈感應。


ISBN 957-32-3755-5 (558)
00360
9789573237556
L7615 NT$360

遠流出版公司

海耶克論海耶克

對話式自傳

F. A. Hayek／著
Stephen Kresge & Leif Wenar／編
李華夏・黃美齡／譯

自由主義名著譯叢 15

海耶克論海耶克：對話式自傳

作　　者／F. A. Hayek
編　　者／Stephen Kresge & Leif Wenar
譯　　者／李華夏・黃美齡
校 訂 者／吳惠林
責任編輯／黃訓慶
原出版處／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發 行 人／王榮文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汀州路 3 段 184 號 7 樓之 5
郵撥／0189456-1
電話／(02)2365-1212　傳真／(02)2365-7979
香港發行／遠流(香港)出版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310 號雲華大廈 4 樓 505 室
電話／2508-9048　傳真／2503-3258
香港售價／港幣 120 元
著作權顧問／蕭雄淋律師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董安丹律師
□1997 年 1 月 1 日　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 360 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ISBN 957-32-3755-5 (原版精裝 0-226-32062-6)

YLib 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tw　　E-mail: ylib@yuanliou.ylib.com.tw

1　選自海耶克家族相本：「1899年5月8日佛里茨・海耶克在這個房間誕生，這是座落在蘭德街(Landstrasse)與賀德街(Hauptstrasse)交界的祖宅。」譯自其母手寫的註記。



2. 約瑟夫・馮・海耶克1789年39歲時獲頒爵位，得在姓之前冠上「馮」。

3. 海耶克的曾祖父，海恩里希・馮・海耶克(Heinrich von Hayek)，他是約瑟夫之子。





4 海恩里希・馮・海耶克的妻子法蘭西斯卡・馮・海耶克(Franziska von Hayek)(娘家姓茲維爾齊納〔Zwierzina〕)，和她的兒子加斯塔夫，約攝於185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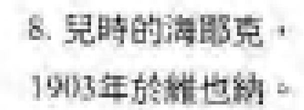
5. 海耶克的外祖父，佛朗茲・馮・尤拉薛克。

6. 佛朗茲・馮・尤拉薛克的第一位妻子，約翰娜・斯塔娜(Johanna Stallner)。





7. 海耶克的父親，
奧古斯特·艾德勒·馮·海耶克(1871-1928)。



8. 兒時的海耶克，
1903年於維也納。





9. 海耶克和弟弟埃里希(Erich)在德拉薛帕克(Draschepark)的陽台，1904年。

10. 海耶克和他的弟弟海因茨盛裝打扮，準備去上舞蹈課，1911年。



11 海耶克家族習慣在星期天聚在一起，1909年2月25日的聚會是因為海耶克的外祖父佛朗茲・馮・尤拉薛克過六十大壽。由左至右，站立者為海耶克的母親費里希塔斯(娘家姓馮・尤拉薛克)，伊達(娘家姓波克尼〔Porkorny〕)・馮・尤拉薛克(佛朗茲的第二任妻子)，及該聚會的主角。坐者為奧古斯特・馮・海耶克(海耶克之父)，埃里希・馮・海耶克(海耶克之弟)，海耶克本人，佛朗茲・馮・尤拉薛克(其舅舅)，格特魯德・馮・尤拉薛克(Gertrud von Juraschek)(其姨母)，海因茨・馮・海耶克(海耶克之弟)，以及葛麗塔・馮・尤拉薛克(Greta von Juraschek)(其姨母)。



12 約1911年，海耶克家三兄弟(埃里希、海因茨和佛里茨)。他的母親註記著：「我們的大塊頭佛里茨最後一次穿水手裝。」



13. 例行的鄉村度暑，這次地點靠近史拉明(Schladming)。三個男孩(佛里茨、海因茨和埃里希)跟母親在一起。往後海耶克一生中大部分的夏天是在奧地利的泰羅(Tyrol)度過。





14. 1916年暑假照片兩款。海耶克快要成年了。「雖然有戰爭，我們還是度了一個愉快的夏天。」他的母親在照片下這麼寫著。左：埃里希、海因茨、佛里茨和母親。右：泳後小憩。



15. 1918年，海耶克在派瓦河的義大利前線擔任砲兵觀測員，時年19歲。



16. 1918年，海耶克時任奧國軍隊的軍官。

17. 1918年於維也納，海耶克身配奧軍勳章的戎裝照片。



18. 攝於1921年其父五十大壽當天，
這時海耶克已經獲維也納大學授予博士學位。

19. 1924年第一次自費到紐約研究之後海耶克(坐著)搭乘郵輪返回維也納。請注意他的鬍鬚。





20. 1932年和他第一個孩子克麗絲汀(Christine)攝於嘉斯舊(Gaschur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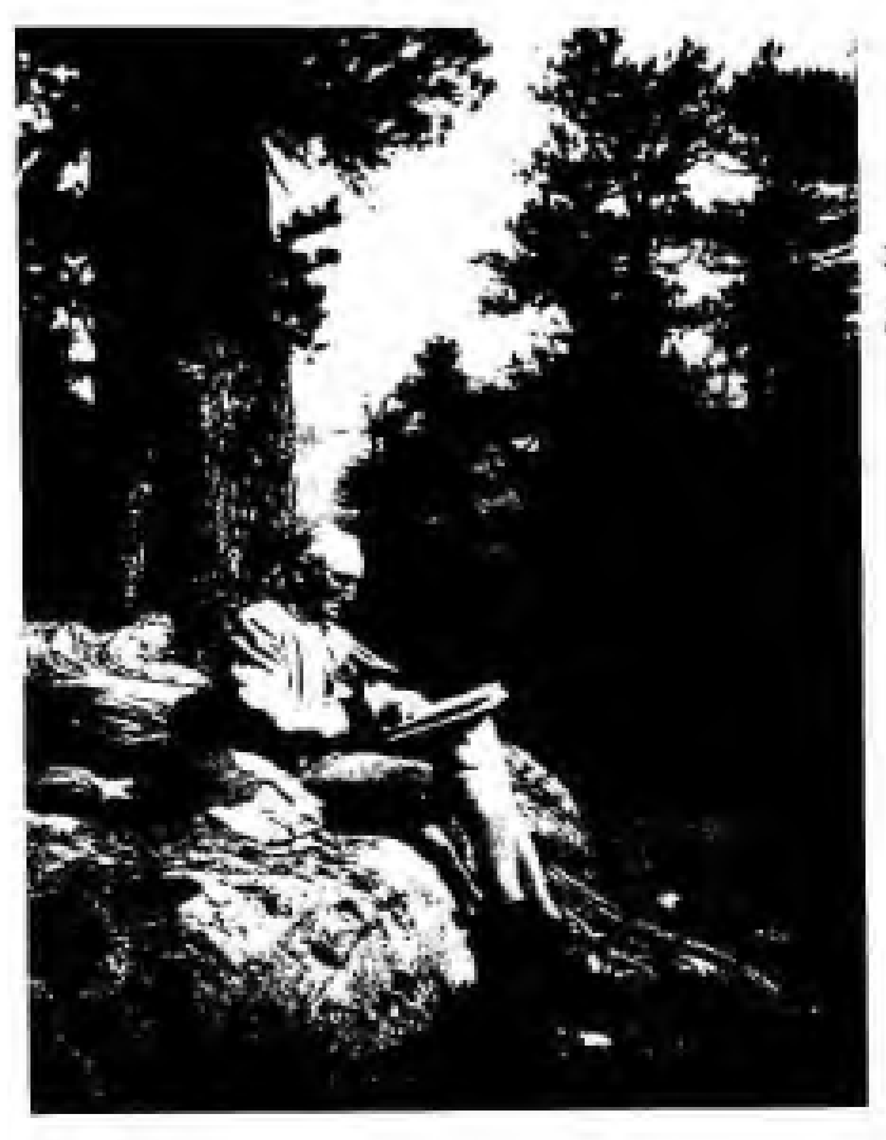


21. 羅賓斯，海耶克在漢普史特(Hampstead)的芳鄰，同時也是倫敦經濟學院的同事，攝於1949年。



22. 海耶克和經濟學家馬哈祿普於比萊特學院(Beloit College)，時約1960年。

23. 1956年3月7日海耶克、米塞斯和馬哈祿普應米塞斯之邀共進晚宴，攝於紐約。



24. 海耶克1958年在阿爾卑斯山上完成《自由的經緯》。



25. 1960年海耶克在芝加哥大學時期(1950-62)攝於書房。



26. 維也納籍物理學家施羅丁格(1887-1961)。

27. 1961年羅賓斯和海耶克攝於海耶克之子勞倫茲的婚禮上。經過芝加哥幾年的不通音訊，兩人又重修舊好。



28. 類比研討會(Analogy Symposium)，1966年4月17至24日於義大利貝拉吉奧(Bellagio)的塞貝隆尼別墅(Villa Serbelloni)。里歐尼(Bruno Leoni)，阿迪(Ardry)，梅森(Matson)，海耶克，瓦金斯(John Watkins)，容克(R. Jung)，海頓(Hyden)，費耶阿本(Paul Feyeraben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 A. HAYEK

Published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dford University

Anglo American and De Beers Chairman's Fund, Johannesburg

Cato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The Centre for Independent Studies, Sydney

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Taipei

Engenharia Comércio e Indústria S/A, Rio de Janeiro

Escuela Superior de Economia y Administración de Empresas (ESEADE),
Buenos Aires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The Institute for Humane Studies,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Instituto Liberal, Rio de Janeiro

Charles G. Koch Charitable Foundation, Wichita

The Carl Menger Institute, Vienna

The Morris Foundation, Little Rock

Verband der Österreichischen Banken und Bankiers, Vienna

The Wincott Foundation, London

The Bartley Institute, Oakland

校訂者的話
——一個偉大思想家的心路歷程

吳惠林

【校訂者簡介】

1949年生於台灣省台南縣。台灣大學經濟研究所博士，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研究。曾任經建會專員，輔仁大學、台灣大學兼任教授。現任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長庚大學兼任教授。

主要專書有：《台灣工資結構與經濟發展之關係》、《經濟學的天空》、《冷眼旁觀經濟風雲》、《台灣經濟何處去》、《自由經濟的坎坷路》、《到經濟地獄之路》、《台灣地區勞力短缺與外勞問題》、《掀開經濟學的蓋頭》、《公共政策停看聽》、《台灣經濟的奇蹟、危機與轉機》、《人生經濟學》、《自由經濟大師神髓錄》、《民主、自由、市場》、《生活經濟世界凝視》、《自由經濟的本質》、《當代財經傑出經典人物》、《市場與亂象的批判》、《閒話東西經濟學》、《台灣經濟演義》、《台灣政經思維》、《放權讓利》。另有學術文章專論七十多種，時事評論散見各大報章雜誌。

1992年2月23日去世的海耶克(F. A. von Hayek)，在過世當時，中外媒體都出現一些對其蓋棺論定的文章。

雖然大家一致肯定海耶克的偉大，但因其貢獻層面極廣，搜盡枯腸也難找出一個適當的「封號」，只見有人以「知識貴族」、有人以「經濟哲學家」、有人以「純正自由主義者」、也有人以「一代大儒」稱之。

正如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e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主任坎貝爾(W. G. Campbell)所言：

「說海耶克是經濟學家，和說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是藝術家、牛頓(Isaac Newton)是科學家一樣，是不足以說明他們在其他領域的成就的。」的確，海耶克對經濟學、經濟思想史、政治哲學、社會科學方法論、法學以及理論心理學都有傑出造詣和貢獻。

海耶克生於1899年5月8日奧地利維也納的一個貴族書香家庭，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大學教授，父親是醫學博士，但醉心於研究工作，並在維也納大學教植物學。海耶克的兩位弟弟也都是大學教授，而赫赫有名的偉大哲學家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則是海耶克的表兄。

在此環境長大的海耶克，分別於1921和1923年得到維也納的法學博士和政治學博士，在校時接受了孟格(Carl Menger)、威澤(Friedrich von Wieser)、龐巴衛克(Eugen von Böhm-Bawerk)以及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等奧國經濟學派大師們的薰陶，成爲該學派的第四代掌門人。

海耶克的學術和知識生涯不曾有冷卻期，早期是以經濟方面的研究爲主，即1931至1949年旅居英國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那段期間。1949年赴美，迄1962年屆齡六十二歲退休轉赴西德，這段期間則致力於非經濟學的重要著作。

無論在哪一階段，海耶克都不斷有作品出現，前一時期正逢歷史上最令人心悸的世界經濟大恐慌，也是凱因斯革命出現的時候，而海耶克堅決反對政府干預，並對通貨膨脹政策大力抨擊，與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針鋒相對，不幸居於劣勢，直到1970年代早期「停滯性膨脹」出現才得到平反，而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授更得到證明。

1944年海耶克寫了《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這本膾炙人口的書，剖示任何形式的政治經濟計畫，都會危害到社會中個人的

經濟自由，計畫經濟無可避免會帶來貧困和專制政府。

在當時濃烈的社會主義氣氛下，這本書被視為「毒草」，海耶克也被英國知識份子視為「異端」，這也是海耶克避走美國的原因之一。

自《到奴役之路》之後，海耶克就致力於非經濟領域，全心與社會主義搏鬥，想盡方法揭穿社會主義的弊端和毒害，以免自由社會受到荼毒。

目前的台灣，雖在「亞太營運中心」跨世紀計畫下走開放、鬆綁之路，但骨子裡仍有計畫經濟的影子，何況近期又如火如荼推展各項社會福利方案，由全民健保打頭陣，這種情況正是一步步走向海耶克所說的文明傾褪之路，或奴役之路。之所以會有此種趨勢，觀念不清是關鍵，而海耶克的著作正是解惑良方。

以上所述只能輕描淡寫海耶克這位偉大人物的一點皮毛，想對這位「路遙知馬力」的先知有更詳細的了解，還是得由其「傳記」下手最方便、省力，而傳記若能由他自己道來，就更為理想。

這本《海耶克論海耶克》(*Hayek on Hayek: An Autobiographical Dialogue*)正合乎此種要求，這是一本半自傳式的著作，主要的來源有兩種，一為海耶克自1945年開始親自撰寫的「自傳筆記」；一為專家學者們與海耶克的對談記錄。

全書以海耶克的生涯為經，以各階段的著作為緯，將海耶克的心路歷程，以及各本重要著作的產生背景和主要意涵，用輕鬆筆調委婉道出。

除了透過與專家對談，指出一般人對海耶克作品的疑惑，由海耶克親自作答之外，海耶克也希望其後代由此本自傳知悉其一切作為的來龍去脈，就像海耶克由其祖先所獲得的一樣。

這本書在無意中凸顯出一位知識份子的傲骨，也處處見到君子和而不同的典範，讓人吃驚的是，被海耶克痛批爲不是經濟學家的凱因斯，竟然是其好友，且有恩於海耶克。海耶克也不留情的指出：經濟學家一旦踏入宦海，一定會被腐化的血淋淋事實，甚至於連令人尊敬的羅賓斯勳爵(Lord Lionel Robbins)也都難免。這點值得世人深思。

對海耶克這位直言不諱，一生堅持市場經濟立場的智者有興趣，或想對其思想鑽研者，實在應先由此書建立起與海耶克的心靈感應。

1998年10月最後定稿

編輯前言

《海耶克論海耶克》這本書的編印靈感來自海耶克本人的話語。在他的話語中能找出透露其心智，一種獨特觀點的特殊表達方式並不多見。藉著他本人話語的指引以了解他的思維發展，並回溯上世紀其思想的回應及所由出的大事和經驗，豈不得益匪淺？

本書主要的參考資料有兩種，第一種是海耶克從1945年開始寫的自傳筆記。作為導讀，他觀察到：

> 最近我當選不列顛研究院(British Academy)的院士，未來必然有人會想對我的一生作一素描，但屆時人們對於我來到英國之前的生活所知甚少，因此，我傾向試著隨時記下一些我的背景及發展中比較重要的特徵。我所寫的東西，其目的並不旨在出版，僅是對那些勉為其難必須為一個表面上相當風光的人生找出耐人尋味事件的人提供一些素材。但也許我的子孫往後會對其中某些事件感到興趣。就像我祖先的遭遇曾使我著迷一樣。

海耶克後來同意出版他的筆記。於是他把筆記交給曾經寫過海耶克傳記的巴特利三世(W. W. Bartley III)。巴特利認為筆記必須以原貌問世。海耶克同意了之後，他略帶羞怯地提議：也許可以把筆記放在一個比較大的傳記框架中，可能的話用不同的字體來加以區分。於是我們遵循這項建議。

讀過許多對海耶克的訪談後，我們發現他早已理出其心路歷程的

綱要。當然，這在他和巴特利的許多對談中表現的很清楚。這些談話再加上其他的訪問，特別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口述歷史計畫」(Oral History Program)所策畫的訪問，就是《海耶克論海耶克》第二種素材。

既然海耶克被問到的問題有相當多的重複之處，他的回答也就免不了有重複。我們的工作是選出海耶克對自己思想的發展及平生重要事件的最佳陳述。這些陳述是以海耶克自傳筆記所提供的年表來呈現。我們希望能夠盡量保存海耶克本人的真正語氣，因此對材料的編輯盡可能降至最少。我們沒有使用任何常用的學術工具來侵害文義。《海耶克論海耶克》是一種對話，而我們所讀到的海耶克可能是鮮活且平易近人的。

這個集子也輯錄了海耶克在1945年一次廣播節目中和兩位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的教授所進行生動的意見交流。完整的文稿重印在第三部分。

編輯群以人名索引所包含的、經過篩選之傳記和書目的形式提供佐證的材料。〈導讀〉簡要略述海耶克畢生工作的歷史背景和心智內涵。我們特地準備一份在書中被引述過的出版和信件之清單，以嘉惠想對材料作更深入探討的讀者。所摘錄的訪談則以個別訪問者的代碼來標示。

問者1： 「口述歷史計畫」，賓州西北公共廣播電台(Public Broadcastin of Northwestern Pennsylvania)總裁，齊迪斯特(Robert Chitester)

問者2： 「口述歷史計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系，海賀(Jack High)

問者3：《理性》(*Reason*)雜誌(1992年7月)，黑茲利特(Thomas W. Hazlett)

問者4：「口述歷史計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系，克雷佛(Earlene Craver)

問者5：「口述歷史計畫」，維吉尼亞理工學院(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公共選擇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Public Choice)，布坎南(James Buchanan)

問者6：巴特利三世有聲檔案室(audiotape archive)，1984-88

問者7：「口述歷史計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系，李昂哈佛(Axe Leijonhufvud)

問者8：「口述歷史計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系，黑茲利特

編輯群非常感謝《海耶克選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F. A. Hayek*)的助理編輯奧普頓(Gene Opton)女士一絲不苟地監督本書的每個製作過程，尤其是辨識海耶克手稿的超凡能力。我們也要感謝我們的研究助理卡普蘭(Bryan Caplan)，感謝格雷夫斯(Leslie Graves)細心地閱讀文稿，以及勞倫斯•海耶克女士(Dr. and Mrs. Laurence Hayek)和克莉斯汀•海耶克小姐(Miss Christine Hayek)善意的幫忙，處理這麼多文稿，並克服無數的困難。我們也要感謝考德威爾(Bruce J. Caldwell)、莫爾多夫斯基(Naomi Moldofsky)、佩陀尼(Angelo Petroni)和雷德尼茲基(Gerard Radnitzky)提供額外的資料、看法和批評。

因爲《海耶克論海耶克》是以《海耶克選集》的附件問世的，我們特別要對該計畫贊助者連續的支持表達感謝之意。編輯們特別要感謝莫里斯基金會(Morris Foundation)的莫里斯(Walter Morris)之鼓勵和慷

慨，現任經濟事務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所長的布倫德爾(John Blundell)，以及藍博基金會(Claude R. Lambe Foundation)。

克雷斯吉(Stephen Kresge)

威納(Leif Wenar)

目　錄

導　讀

海耶克於1899年5月8日生於當時奧匈帝國(Austro-Hungarian empire)的首都維也納(Vienna)，全名是佛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992年3月23日，海耶克在德國的佛萊堡(Freiburg)去世。那時的德國隨著「柏林圍牆」(Berlin Wall)倒塌和蘇聯結束對東歐的統治剛統一不久。

社會主義的崩潰印證海耶克畢生的志業。《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是他最有名的一本著作，該書在重建政經理念上起了關鍵性作用，而這個理念使共黨政權的解體成爲可能。雖然在解體的過程中黃蜂飛彈(Stinger missile)、搖滾樂和藍色牛仔褲擔任了更爲耀眼的角色，但是並不會使海耶克感到沮喪。他最能使我們注意到價值是沿著不可預測的路徑來傳遞的。

如果說海耶克將近百年的生命歷程，被某些人冠以「美國之世紀」(American century)的話，其實也可以當作是奧國的世紀來看，因爲大部分是來自維也納和中歐的智識和文化爆發力迫使世界上其他的國家要有所回應。1914年6月28日，費迪南德大公(Archduke Ferdinand)和他的夫人在薩拉耶佛(Sarajevo)遇刺，開啓了歷史上以暴易暴的進程。

歐洲人於1914年挑起了戰端，原以爲只會持續幾個月，但是其結果不僅摧毀了那一代人的期望，也摧毀了一種文明所賴以維繫的基礎，各個帝國自我毀滅後留下的真空，充斥著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甚至

人類的基本本質都遭到質疑。伍爾芙(Virginia Woolf)在〈貝內特先生和布朗太太〉(Mr. Bennett and Mrs. Brown)這篇文章中，寫下了「人類的性格在1910年12月左右產生了改變」。但是這種性格的改變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結果。

海耶克沒有讀完大學預科學校(Gymnasium)便在1917年3月加入野戰砲兵團。對他而言，戰爭只持續一年多。後來他從充滿饑餓、疾病和混亂的義大利前線復員，於1918年11月進維也納大學(University of Vienna)就讀。

由於戰時服役於多國部隊，使海耶克的興趣由自然科學轉到社會科學。稍後他回憶說：「這經驗就使當時的我多少看出了大帝國會因民族問題而崩潰。我參加過一次戰役，其中所使用的語言居然有十一種之多。這使你不得不注意到政治組織的問題。」(見本書頁53)

如果說帝國的合法統治權現在遭受攻擊，心智的統治權更是不保。相對論(relativity)、量子力學(quantum mechanics)、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和後印象派主義者(post-Impressionist)全面地改變了我們對物質存在的概念，以及我們對此的認知。「我放下茶杯，檢視自己的心靈。心靈是用來發現真理的。但是要怎麼去發現？當心靈感到某些思維已經踰越了原有的範疇，會產生多大的不確定性啊！但當追尋者身陷必須追尋的黑暗區，而所有的工具都幫不上忙。要怎麼尋求？不只要尋找，更要去創造。這是面對到目前為止並不存在的東西，但唯有如此才能產生真實和實質，唯有如此才能帶進白日光明。」於是敘述人展開了普魯斯特憶往中的冗長回憶。

多年後，海耶克在1952年出版的《感官秩序》(*The Sensory Order*)這本書中完成了類似的探討。「我們所稱的『心智』是發生於某種有

機組織中一組事件的特定秩序，而且在某方面，是與環境中的現實秩序有關但不等同。」(《感官秩序》，頁16)「我們對世界所有的認識是屬理論的本質，而所有『經驗』能做的便是改變這些理論。」(《感官秩序》，頁143)

教　育

海耶克解甲歸來學會了義大利文，也染上了嚴重的瘧疾。他在維也納大學修了好幾個學門的課程，而且也充分參與當時的社交和文化生活，但是每隔一天的晚上，他會因發燒而臥病在床。1919至1920年的冬季，維也納大學因為缺乏暖氣的燃料而關閉，於是海耶克前往蘇黎士(Zurich)，並在腦部解剖學者馮・莫納科(Constantin von Monakow)的實驗室中第一次看到組成人腦的纖維束，而且也首次品嚐到一個「正常」的社會應是什麼樣子，而當時維也納還處在通貨膨脹和半饑餓的苦難中。1920年的夏天，他前往挪威，終於甩掉了瘧疾，而且也學得了相當的斯堪地那維亞語言的知識足以翻譯一本卡塞爾(Gustav Cassel)論通貨膨脹的書(這本書，因為奧地利的通貨膨脹，一直沒有出版)。

海耶克在大學生涯的早年建立了沿襲終生的治學態度。「在大學裡，決定性的一點不過是不要把自己劃地自限於自己的科目裡」(見本書頁57)。同樣的，一個人也不要自限於大學之內。知識份子許多爭議性的討論在咖啡店進行著。大學講課所用的語言是標準德語，而當時城市的街坊使用的是變化多端的俚語。

和許多促成維也納神話性格的人比較起來，海耶克對這時期的觀點有些不同，但卻更為精確。海耶克出生於要負起維繫奧匈帝國絕大

部分責任的階級，但是這個階級隨著帝國的崩潰而消散。已經不再是貴族和商人階級，但卻是屬於公務員和專業人士的一級，他們不僅注意提昇自己，且仍維持全歐洲同一階層立身處世之標準。

海耶克的父親是一位醫生和植物學者，他曾經希望在大學裡獲得一席植物學的專任教職。佛里德里希・奧古斯特(Friedrich August)——他的母親稱他佛里茨(Fritz)，他強忍著接受這稱呼，也不很在意——從他父親那裡了解到生物學和心理學的奇妙和複雜，並且相信大學教席是所有職位中最值得爭取的。

海耶克一進大學所走的路線是出於現實的考量。不像他表兄弟維根斯坦有家產可恃，因此能夠滿足他的氣質和才華的事業，上上之選似乎是藉著對法律和語言的研習而晉身外交公職，也許往後可以獲致學術或政治地位。隨著帝國的崩潰，領事學院(Konsularakademie)消失了，而外交生涯的野心也一併消逝了。

海耶克在大學時依然在心理學和經濟學之間搖擺不定。但是戰後沒有人留下來教心理學，因此要在這個學門獲得學位是不可能的。經濟學還是併在法律之內，而法律的研習是為律師執業或是公職作準備。1921年，海耶克以三年而非一般的四年獲得法學博士學位。然後他又註冊研讀第二個學位，並很快地在1923年獲得政治學的博士學位(doctor rerum politicarum)。

當時對知性生活的主要影響者是馬赫(Ernst Mach)。現在我們大部分人對馬赫這個名字的認知，不過是超音速飛機速度的一個測量單位。粗略地來說，馬赫的科學哲學是凡不能測量者便不真實，馬赫的彎刀(machete)(比奧坎〔William of Ockham〕純粹的刮鬍刀〔razor〕更大又更

利)劈開了對科學發展有窒息威脅的形而上叢林(metaphysical thicket)。

馬赫曾經是維也納大學第一位歸納科學(inductive sciences)的教授。這個爲他而設的教席接著由博爾茨曼(Ludwig Boltzmann)繼承，之後是史托爾(Adolf Stöhr)，而後是1922年的施利克(Moritz Schlick)。海耶克是在訪問蘇黎士時第一次聽說施利克的。施利克是馬赫會社(Ernst Mach Verein)——維也納集團(the Vienna circle)——的創始人，這個組織藉著聯合驗證學派的經驗主義(verificationist empiricism)攻訐邏輯的基礎，成功地把哲學家的注意力導向區別有意義和無意義陳述的不幸嘗試。這稱爲「邏輯實證哲學」(logical positivism)，延續了維根斯坦的學術生命——其後來的著作否定了先前所言——而且成了波柏(Karl Popper)的解毒劑。海耶克雖然從未成爲維也納集團的一份子，但是透過一位同時也是海耶克所屬、自稱爲智者圈(Geistkreis)的成員，很快地得知維也納集團的想法。

海耶克早期對自然科學的接觸使他樂於接受馬赫認爲我們所能知道的一切是知覺(sensations)的論點。但是他在1920年冬天看過腦纖維束的印象一直留在心裡。他寫了一篇論文，但是一直沒有完成，在這篇文章中他嘗試把知覺的發展(神經脈衝)追溯至腦部，知覺是在腦部接受了認知的型態和感覺。文章寫到後頭，他發覺馬赫是錯的。純粹的知覺無法察知。某些內在連繫必須在腦部形成，而且必然發生某種可以將過去經驗和現在的經驗聯繫在一起的分類活動。海耶克開始摸索一個以前沒有被人想過的問題之解答：秩序如何自我創造？答案聽起來有點像康德(Immanuel Kant)，有點像達爾文(Charles Darwin)，甚至有點像普魯斯特的看法。但最後是純粹海耶克式的看法。

海耶克寫道(見本書頁157-8)：「我曾經有過的原創想法，其實並

不是由按部就班的推理過程所產生的。有人主張所有的思考都是由文字，或一般說來由語言產生，我一直認爲自己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反例。我非常確定每當我有了問題的答案，我常發現早在我能以文字表達之前，就經常『看見』答案在我面前。其實一種符號抽象型態而非重現圖像的視覺想像，可能比文字在我心智過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也說了大致相同的話。

型態認知是海耶克所有著作的中心。這可能是一種智力的攀登，而攀越顛峰卻是他與生俱來的能力。

「早年我心裡所想的純粹是實際的問題，希望找出自己的道路，還沒有完全了解到這麼做是需要理論的。我在找尋理論，但是還不知道理論到底是什麼。」

1921年10月，海耶克將一封他在大學時的老師威澤(Friedrich von Wieser)所寫的推薦信呈給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當時是商務部(Chamber of Commerce)(官方組織，和同名的美國組織不同)財務顧問的米塞斯爲海耶克在會計署(Abrechnungsamt; Office of Accounts)這個臨時機構找到一個職位，米塞斯本人即爲會計署的董事之一。這個部門負責清理因戰爭遭延宕的債務。海耶克的法文、義大利文，加上後來英文的知識，以及他的法律和經濟學的知識，使得他足以勝任這份當時薪水相當不錯的工作，但是主要吸引他的地方是能和米塞斯發展關係。

米塞斯因其1912年出版有關貨幣理論的著作而受尊崇爲經濟學家。海耶克曾經宣稱大戰之後奧地利和德國之高通膨對海耶克所由出之階級的摧毀甚於戰爭本身，而米塞斯可能是德語世界唯一了解事情發生緣由的人。

1922年米塞斯出版了有關社會主義的巨著，這本書為反社會主義計畫提供了理論基礎，米塞斯論述的焦點集中於自由調整的價格在競爭市場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價格調節反映了相對稀少性的變化，使決策者可以藉此訊號改變資源分配。如果沒有自由調整的價格，便無法進行有效的資源分配。米塞斯的論點終於說服海耶克放棄在此之前所採取的親費邊(Fabian)傾向。

海耶克對經濟學最初的熱情是源自於他讀了孟格(Carl Menger)的《經濟學原理》(*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Principles of Economics*)，這本書出版於1871年，對往後幾代的奧地利經濟學者產生了主要的影響。孟格(與傑逢斯〔William Jevons〕，和華爾拉斯〔Marie Esprit Léon Walras〕)被歸功為最早將邊際效用(marginal utility)引入經濟學的學者之一。然而，更重要的則是，孟格的效用概念是立基於價值觀念之分析，這和古典經濟學中的價值理論是有所不同的。對孟格而言，價值並非一種內在的實體或是任何商品或努力的實質。土地、勞務或黃金並沒有內在的價值，這些生產要素只有使用的價值，而這種價值只能取決於與其他可能用途的關係。這種關係又因情況和個人而有所差別。唯有個人才能知道為了獲得某種物品的使用——也就是價值——願意放棄什麼或以何者來替代。

價值根植於一組可轉變或替代的關係，這個要求是被稱為「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基本主張。在奧地利資本理論中，生產體系的時間長度或複雜性是因著價格或利率的變動而改變。因此，價格和利率作為引導投資的角色是很關鍵的。

傾向實證的經濟學者不習慣沒有固定測量的基準，不太能接受價值這種因主觀性而具不確定性的本質。而美國的經濟學者當時正在證

明可以測量的極限尚未達到。海耶克利用爭取紐約一個研究助理缺的機會前往美國。到了1923年3月，他存夠了路費前往美國。

紐約和景氣循環

海耶克在晚年回顧時，覺得自己是非常幸運的，因爲一次次的發現或機會總是會引發另外的發現或機會。唯有他在1923年前往紐約的驚人決定是出乎尋常的，幾乎是與個性不符，連他都無法對此真正作解釋。爲了這次的旅行，他甚至留了鬍子，很明顯地，他那次旅行所帶回來的和他所預期的發現並不完全一樣。

他在紐約的大部分時間是花在公共圖書館，而他最先感到震撼的是，讀了美國對大戰的記載。美國報紙對戰爭描述是精確的，呈現的方式也是奧地利式的記載所未曾有過的。奧地利人民不了解戰爭期間大部分的真實情況。我們可以由這點溯源海耶克對政府行動和動機的懷疑。

他在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正式註冊，並開始寫一篇博士論文(一直沒有完成)，題目是：「貨幣功能是否與購買力的人爲穩定性一致？」(Is the function of money consistent with an artificial stabilization of purchasing power?)他上了一次維布倫(Thorstein Veblen)的課，但除了都曾罹患過瘧疾之外，他和維布倫似乎無任何共通之處。引起他注意的是，對經濟時間序列進行統計分析而新發展出來的技巧，以及當時人們談論有關經濟之價格水準可由中央銀行的貨幣控制來加以穩定這個問題。後者導致他對聯邦儲備(Federal Reserve)體系和美國貨幣政策的研究；前者則開啓他返回維也納後的新生涯。

當時美國正在發展的統計方法，領導人是米契爾(Wesley Clair Mitchell)，由於其以複雜的數學技巧，和缺乏任何理論支持著稱，而不為當時歐洲經濟學所知。米契爾對任何具抽象性的分析都抱持敵意，他所採取的實用制度學派方法，部分可溯源至備受孟格批評的德國歷史學派。

美國對經濟問題的方法是找出事實。美國的經濟曾飽受景氣與不景氣循環的折磨，這類循環無法預防和／或解釋，但是許多事實呈現在眼前。當時正處於後來證實為這類循環中最具災難性的景氣期。米契爾已在1913年出版了有關景氣循環的巨著，並在紐約成立了國民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海耶克在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上了他的課。

美國人努力比較不同時段類似的經濟變動，比方說，穀物或棉花價格的變動，是基於經濟因果中有其歷史性規律的假設(也就是假定此為事實，而仍待證明)。實用方法試著跳開有關經濟變動原因的理論或假設在認識論上的必然性，少了這個假設，事實的重要性就無由認知。簡而言之，屆時也就因果難分。

海耶克對這種方法的回應，並非駁斥美國的統計調查所顯現的規律性是否可能，而是發展出一套能夠對此規律予以解釋的理論。他回到奧地利之後，寫了兩篇重要的論文：〈貨幣價值中跨時段的價格平衡和變動〉(Das intertemporale Gleichgewichtssystem der Preise und die Bewegungen des 'Geldwertes'; Intertemporal Price Equilibrium and Movements in the Value of Money, 1928)和《貨幣理論與貿易循環》(*Geldtheorie und Konjunkturtheorie*; *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 1933)。後者的寫作，是為了要說服德語系的經濟學者多考慮產業變動

的貨幣原因，而不是他們所信的一定可以在事物底部某處發現的「真實」原因。

但是美國方式的實用主義(pragamatism)並沒有隱藏其統計研究的真正目的，也就是要找到一種方法來控制調查中的經濟事件。一直要到很後來海耶克才了解全部的影響，他第一次聽到這個論點中危險的假設是在米契爾的一次講課中。海耶克後來將之稱爲「營造主義」(constructivism)，信條是這樣的：既然人本身創造了社會和文明的制度，也必然能夠隨意加以改變以滿足其欲望和願望。

海耶克曾獲得第一批洛克菲勒(Rockefeller)獎助，這項獎助可以延長他在美國的停留時間，但是很幸運的是，通知遲至1924年春天才到達，這時他已啓航返回維也納了。他回到會計署的工作職位，參與米塞斯的私人研討會(Privatseminar)，並和米塞斯討論他在美國所學的經濟研究方法。米塞斯著手籌集資金，成立以景氣循環研究爲宗旨的研究所，到了1927年1月，他們終於成立了以海耶克爲所長的奧地利經濟調查研究所(Österreichische Konjunkturforchungsinstitut)，他同時也是唯一的僱員。最初幾年，研究所大部分的報告都是出於他個人之手。

這項工作並沒有妨礙他別方面的寫作，但確實使得他寫作的時間減少。而且他還開始對貨幣理論的歷史作詳細的研究(這份研究由於後來的局勢一直沒有出版，直到1991年才在《海耶克選集》中第三冊以譯文本出現)。這項研究有一項未曾預見的好處，是使海耶克掌握英國的貨幣理論和實際方面詳盡的知識，進而幫他獲得倫敦的教授之職。

涉入美國思想還有一項更重要的影響，當時在美國廣爲人知的佛斯特(William Trufant Foster)和卡欽斯(Waddill Catchings)提案被海耶克形容成景氣循環「消費不足」(underconsumption)理論的變形。海耶克

在維也納以靠校講師(Privatdozent)開課的演講便反對這些理論。他發表一篇論文"Gibt es einen Widersinn des Sparens?"(1929)(後來譯成英文爲〈儲蓄的弔詭〉〔The Paradox of Saving〕)引起羅賓斯(Lionel Robbins，後來封爵)的注意，並受邀前往倫敦經濟學院發表一系列的演講。由於演講是如此成功，加上與羅賓斯往後的合作關係，使海耶克留在英國並成爲倫敦經濟學院的圖克(Tooke)講座教授。他對這二十年的學術生活曾經寫過動人的回憶錄：〈從維也納看1920年代的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the 1920s as Seen from Vienna)(刊於《海耶克選集》第四冊)和〈從倫敦看1930年代的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the 1930s as Seen from London)(刊於第九冊)。

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和凱因斯

海耶克在回憶中寫道：1930年代早期，「對我而言似乎是本世紀中經濟理論發展最令人興奮的時期……。我在1931年前往倫敦，在這一年和比方說1936或1937年這幾年間，對我而言似乎代表了一個高點，是經濟理論史上一個時期的結束，而且是一個非常不同的新時期之開始。」1936年，海耶克在倫敦經濟俱樂部(London Economic Club)發表他的候選人演說。該講稿於次年以〈經濟學與知識〉(Eco-nomics and Knowledge)論文的形式刊行。1936年，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譯者按：以下簡稱《一般理論》〕。

如果撇開當時政治和文化的動盪，便無法了解經濟理論變動的衝擊。但是即使對這時期歷史作一簡單的敘述也超出本導讀的範圍。如

果說我們很難理解本世紀世界有多大的變化，那些經歷大變動的人更難了解其中的意義。

十九世紀的歷史主要是大英帝國的歷史，這段世界上空前的大帝國的歷史，現在除了在英國的編年史上有所記載外，已經被全然忘卻了。這時英國在政治、軍事和經濟力量上都居主導地位。大致說來，古典經濟理論便是大英帝國的經濟學。

大戰嚴重弱化帝國的財政基礎。用來支付戰爭所需的資金巨幅移轉和貨幣儲備流失，是無法以任何經濟理論所闡述的交易關係之詞目而能涵蓋的。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並不是經濟學者的辭彙。

海耶克注意到凱因斯因為寫了《和平的經濟後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而在歐陸成為英雄。凱因斯的論證是戰敗的德國(而德國人認為他們自己與其說是戰敗，不如說是被一懲罰性的停戰協定所出賣)，不得不以其他列強所無法忍受的輸出水準來支付法國所要求的賠償。無論凱因斯用來支持其論點的數據有多大的準確性，但困境是實實在在的。而各國政府的說法則是，德國和奧地利是敗於饑餓和超級通貨膨脹。

英國政府採取了兩種立場，後來證明不僅互不相容，而且以毀滅告終。英國政府不願意放棄任何求償的要求，除非美國放棄對英國的要求。而英國則在激烈的辯論之後，以戰前的英鎊比價，回復金本位。倫敦市很快就發現無法平衡內外對英鎊的要求，英國再也無法維持半個世界最終的金主地位。

凱因斯以他的小冊子〈邱吉爾先生的經濟後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Churchill)，參與這次激辯並扮演凶事預言家的角色。但是他未能辯勝。

有了海耶克在倫敦，羅賓斯著手推行一個大計畫：建立將經濟理論定於一尊的傳統，放棄所有個別的「學派」。海耶克首次的演講稿，在經過修改後，以《價格與生產》(*Prices and Production*)爲題出版，還有他對凱因斯《論貨幣》(*Treatise on Money*)的評論都屬這個運動的佼佼之作。凱因斯以攻擊《價格與生產》來答辯。彼此已經壁壘分明。

理論問題的辯論抵不過事件的現實。產業界陷入不景氣，愈來愈深愈棘手，超乎任何經濟學家所能想像。對於那些面臨馬克思主義者攻訐，而開始質疑其信念之存活力的經濟學家而言，《一般理論》所推出的策略可成了戰術上的贏家。凱因斯指出，儲蓄和投資之間似乎有一不完美的關聯(海耶克認爲是消費不足理論的複雜版)，乃爲政府開啓了干預貨幣和財政措施之門，而依然保留一般均衡理論所運用的思想工具和理由。

但是，這個世界的任何事件已經不再倚賴任何種類的經濟理論。往後二十年及更長的經濟運作，是由德國的沙赫特(Hjalmar Schacht)所塑造。他設計了一套控制貨幣和導引投資的制度，而從那時起成爲所有走投無路的政府最先和最後的訴求。

這時候海耶克有關經濟循環的觀點似乎完全失去戰鬥力。他作了一次英雄式的嘗試(《純粹資本理論》〔*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試圖將他對奧地利資本論的重塑和新古典理論的發展，也就是凱因斯理論最弱的一點，加以整合，但是當時二次世界大戰已在進行中，因此沒人予以理會。

多年以後，事實清楚地證明，任何凱因斯方案的成功都有賴政治決策的機敏，而這一點卻很不容易出現，也不是凱因斯著作裡的一個

理論命題，這些決策最好的情況是和稀泥，最糟的情況則是相互矛盾，海耶克說他最大的遺憾之一就是沒有對凱因斯的觀念發動有效的批評。回想起來，任何的批評能否占上風實在值得懷疑，因爲輿論倒向凱因斯和凱因斯最後的勝利是受文化和政治的變動，而非論證的說服性所推動，而且由於二次大戰的爆發，這樣的結果從來無法予以實證。戰爭開始時，海耶克和凱因斯發現，他們對戰費的支付上只要能控制通貨膨脹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所累積的投機性剩餘就沒問題，有一致的看法。他們的計畫有賴在戰爭快結束時實施的強迫儲蓄。在這一點上，凱因斯不再堅持自己的論調。

凱因斯心態的快速轉變是海耶克沒有攻擊《一般理論》的主要原因之一。凱因斯的這個習性幾乎眾所皆知。據說當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和美國商議戰後金融體制時曾給凱因斯一張紙條：「快要接近你的看法」，但其得到的回答居然是：「遺憾得知，惟我已經開始改變心意了。」

經濟學與知識

海耶克在作回顧時，認爲他的論文〈經濟學與知識〉以及往後針對相同題材所寫的論文，是他對經濟學最原創的貢獻，這也是對凱因斯的回應。海耶克的論點，隱含著推翻實證論者的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和任何創導「總體經濟學」之企圖這三者所作的邏輯和經驗假設。這是一個籠統的說法，可還海耶克一個公道，但這一點我在此不加以辯述。

海耶克對市場的立場實爲對社會組織問題有見地的陳述。他在這

篇發人省思的論文裡如此寫道：

> 存在於不同心智的知識其片段之結合如何有所結果？如果這個結果是有意要讓其發生的，就需要左右心智的知識，但是卻沒有人擁有這種知識。為了證明憑著所有個人意志的自發行動，在可控制的情況之下所造成資源的分配，就像根據某個計畫而做的分配一樣，其實卻沒有人曾如此計畫過。對我而言，這似乎是有時被比喻描述成「社會心智」這個問題的答案。(《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頁54)

海耶克在這些句子中所涉及的問題，即秩序如何自我創造，在他早期的心理學論文探討感覺轉化為知覺時即有所涉獵，當時這個問題出現在人類生理學和心理學的情境中。在此，這個問題則出現在人類社會組織的場境中，在社會組織中個人知識的有限性就被打破。

兩種思路使他對新的方法有信心。其一，有夠巧的，是來自他在經濟學最初的啓蒙者，孟格。1934年，海耶克欣然接受重新編輯孟格論著的工作，這項計畫是由倫敦經濟學院所贊助的。在做這件工作時，海耶克可能是首次認真地研究孟格有關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著作。從那，海耶克後來這樣寫著：「由體制自發產生的概念，比任何我所知道的書表達得更為美好。」海耶克的另一項體會是波柏在1934年出版的《科學發現的邏輯》(*Logik der Forschung*;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雖然同為維也納人，但波柏和海耶克從未謀面。他們以大致相容的方式回應馬赫、邏輯實證論者、馬克思(Karl Marx)和佛洛伊德等人的智力激盪。波柏反對歸納法的邏輯基礎提供海耶克一種經驗主義的方法，海耶克發現這可用來攻擊實證經濟學的假設。

到了1938年，海耶克成了大不列顛的子民，拿著英國護照旅行，並在大戰爆發之前找了個機會再次回到奧地利。海耶克心靈深處從未離開過維也納。正是維也納本身的改變一發不可收拾，曾以無比力量塑造這個世紀的創造和智識能量，隨著德奧之合併，散播到全世界。大部分能逃走的人都到了美國。波柏最初是到紐西蘭，直到海耶克在戰後把他帶到倫敦。

從應對到習性，海耶克在英國完全有賓至如歸之感。或者應該這麼說，他對依然保存許多十九世紀風格的英國完全感到如歸故里。他與較早的人物諸如桑頓(Henry Thornton)、斯蒂芬爵士(Sir Leslie Stephen)，更明顯的是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有著氣味相投的感覺，或許正因爲如此，海耶克意識到爲了文明的演進，風俗和道德、法律和語言是社會體制所必需的。他後來把自己說成柏克式維新黨人(Burkean Whig)。

他和斯蒂芬爵士都喜歡登山運動，使他很欣賞爵士的風格。海耶克在身爲改革俱樂部(Reform Club)榮譽會員時認識了桑頓的後代，福斯特(E. M. Forster)。當倫敦經濟學院搬到劍橋(Cambridge)以逃避倫敦大轟炸，凱因斯曾爲海耶克提供住處。海耶克在劍橋得以和克拉彭爵士(Sir John Clapham)分享對貨幣史的興趣。但是當戰爭開始之後，他被悄然且絕然地排除在外。他忠實的朋友和盟友羅賓斯隨凱因斯一起進入政府任公職，大部分獨領風騷的經濟學家都被徵召處理戰爭計畫，凱因斯本身是如此地竭盡心力幾乎無法活到戰爭結束。

戰爭與到奴役之路

到了1940年，世界上各處凡是有思想的人，都無不懷疑到底是哪裡出了差錯。爲什麼十八世紀啓蒙主義(enlightenment)的希望，十九世紀倫理和物質的進步，竟然導致二十世紀的野蠻暴力？海耶克從三方面來看待這個問題：經濟理論，心理學和生物學理論，以及對哲學和政治思想的歷史探源。

海耶克以很多文章(後來被輯錄成《科學的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和《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沈痛地指出，社會科學最基本的題材，事實的特性，如何爲了要借用物理科學的方法而遭到誤解和誤用。主要的謬誤在於，以爲將某種現象的例子分離出來，就足以確定出造成該現象的一般法則來。海耶克並沒有直接攻擊歸納法的謬誤，而是把他的批評集中在所謂社會科學事實之主觀(因此是不確定)的特性上。這種研究對象之主觀本質，或許就意味著其行爲受制於一般法則的那些人，對其行爲的結果所抱持的想法是不可預測的。這些想法無法簡約成物理意義的「事實」。由於誤解有關物理法則和該法則之任何結果之間的邏輯關係，然後將之再用到歷史研究中，以這種方式來尋求人類行爲的一般法則，其動機是起自有控制社會體制的野心。海耶克把將物理科學的方法誤用到社會科學的情形稱爲「科學迷」(scientism)，而以此方式作爲控制社會的合理化依據則稱爲「營造主義」。這種誤用是對理性的濫用，海耶克將之追溯到笛卡兒(René Descartes)，特別是孔德(Auguste Comte)。

人類可以控制環境這種幻覺是由兩項偉大的發明所助長的，即：

蒸汽引擎和人工染料。首先，運作的原理——氣體在一定量的運作——擴大了機械式的均衡概念，進而支配了經濟理論。同時，製造人工染料程序的發現，使人相信物質結構可加以改變和形塑俾符合人類的設計。我找到了(Eureka)：鍊金術已成化學。[中文版編者按："Eureka"，希臘語，源自阿基米德(Archimedes)發現測量黃金純度之方法時的驚呼。]如同亞當斯(Henry Adams)所說的：渦輪機的力量已取代了聖母瑪利亞的力量，驅動人們的視野：要建立的是摩天大樓而不是大教堂。

抽象的區分，自然產品和設計產品的分野——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二分法——逐漸變得不明顯。爲人類社會設計更爲「理性」體制的可能性，被用來當成是弱化現存體制合法性的槓桿、敲門磚。海耶克反對理性設計社會和經濟組織的論點，立基於所闡述過的有關此類設計所需之個別事件的知識，是不可得的，因爲事件是複雜的；即使這種知識是可得的，社會活動所產生不可預見的後果也會摧毀產生這些後果的設計。

海耶克是在一種「懷著對落彈濫炸感到無力卻不得不高度關注的心態下」完成他研究理性濫用的頭兩篇論文。雖然他在劍橋很安全，但是絲毫不能減輕他對這個世界所發生的事情之沮喪感。在自由尙存的世界裡，經濟學者和哲學家心中所產生的變化，比炸彈更令人戰慄，甚至更令人警惕。這是有點類似科幻故事的經驗，像是肉體掠奪者的入侵。從外表看起來，人們似乎和以前一樣。但是內在卻爲異靈所虜獲。諷刺的是，海耶克被當成是一個局外人，愈來愈孤單，但是他卻對爲反軸心國而戰的自由保持了一顆奉獻之心。

虜獲英美知識份子的異靈，認爲社會主義是必不可免的信仰。那

此向自己同胞推銷這種想法的人誤解了，也許是故意誤解德國和俄國集權侵略的起源，揚言彼此是互爲反動，也就是說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事實上並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超級資本主義對共產主義的一種回應。

海耶克在《到奴役之路》的導論中曾提及，他自己對事件詮釋的根源：「因此，一個人由一個國家遷移到另一個國家，有時候可以重複見證智識發展的類似階段。這種感覺變得特別尖銳。某種意見或方法在二十或二十五年前已表達或鼓吹過的，當這些意見或方法再次被提起有了新意，預示會成爲明確的趨勢。這代表智識發展如果不是必然，至少是可能採取相同的路線。」

海耶克在《到奴役之路》中沈痛地申明，他並非作歷史論斷，也不是在宣示邏輯的必然性。他認爲，如果在經濟和社會實施中央計畫過程中所附著的極權傾向無法制衡的話，俄國和德國的命運將會是英國的命運。以現代的白話來說：他是在喚醒大家。

對於特別傾心於社會主義的知識份子而言，海耶克的警告聽起來像是無禮的噪音。出色的邏輯實證哲學家卡納普(Rudolf Carnap)就是這麼一個例子，他當時安居美國，寫信指責波柏讚美《到奴役之路》：「這本書，當然[卡納普說他]沒讀過。」凱因斯寫信給海耶克稱讚這本書，說自己完全同意該書的說法，但卻以所有世上獲得權力的知識份子遲早會陷入的極度自信口吻爲他的舉措辯白：

> 因此，在我看來，我們所需求的，並非改變我們經濟計畫，因為循著你的哲學推論實際上只能帶來失望，或許反而是擴大經濟計畫。在你面前最大的危險[在此，凶事預言家凱因斯又出現了]是如在美國實踐你的哲學可能會招致相當極端的挫敗。我們需要的不是這個，我們需要的是，恢復正確的道德思維——重回適於我們社會

哲學的道德價值。只要你能把你的改革運動轉到那個方向，你就不會看起來或感覺起來那麼像唐•吉訶德(Don Quixote)。我得責備你或許有一點混淆了道德和物質的議題。危險的行為在一個思想和感覺都正確的社區中可以做得很安全，但是如果被那些思想和感覺錯誤的人所執行，可能會是通往地獄之路。

隨著時間的消逝，英美兩國沒有成爲極權的事實被引來質疑海耶克的警告。批評海耶克的人不了解戰爭的經驗使人們習於喪失自由；他們的論點似乎是，只要計畫在勞動營之外實行，便沒有危險。

計畫者的敵意，和他們的混淆思維，在本書的圓桌(round table)討論中會一覽無遺，以彰顯其對海耶克個人的憤怒和缺乏理解力。【中文版編者按：見本書頁126起。】如同其中一位當事人挑戰海耶克說：「我未曾發現我們的計畫有導致奴役狀態，反而是向自由和解放邁進，並邁向人格的更高境界」(見本書頁129)。昧於這種對人格更高境界「特別的洞見」，那些想爲世界作設計的人看不見他們可能造成的危險：他們看不見他們的計畫**即使成功了**，也將產生非有意的、不可預見的結果，而這會爲那些寡廉鮮恥的機會主義者開啓方便之門，而向其餘計畫者捐輸創意的我們，只剩下無助。也許這是人性天生的弔詭：不管計畫者是多麼地善意、無私，總是會有一個自私的機會主義者的才能，使我們必須面對不可預期之事，並去適應永遠超出我們所能控制的力量。

海耶克清楚地了解到，我們也許可以完全地計畫小規模的事(短期)，但是無法計畫大規模的事(長期)。凱因斯批評海耶克未能在這兩種可能之間劃清界線。但凱因斯未能理解此界線會落在何處的不可預測性，對設計精良的計畫而言是凶兆，採用市場的機制就沒這問題。(凱

因斯寫給海耶克的信中提到：「你在論點中所持的立場是基於計畫不是更有效，這樣可疑的假設。而從純經濟的觀點來看，計畫很可能是有效的。」)因爲長期供需策劃的複雜性，需要自由市場所提供的自發回應體系。

海耶克在自己的一生中一直碰到工作的困難。正如他所寫的：「我相信我比大部分其他的人更能將思想完全朝向未來，我時常清晰地認識這點。我似乎很早就喪失安享眼下的能力，而生活之所以吸引我，是我對未來的規畫，滿足主要是實現了我的規畫，而難過主要是因爲無法履行規畫」(見本書頁161)。也許，把凱因斯的說法加以改寫就是，長期而言我們都將抑鬱以終。

海耶克的品德還有另一項異於常人之處，便是這個偉大的政治哲學家似乎曾是一個可怕的政客。他感覺出他在《到奴役之路》所闡述的主張無法被專業的經濟學家和公職人員、學院派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傾聽，而他們正是這本書真正要針對的對象：各黨派的社會主義份子。[中文版編者按：該書正文之前有「致各黨派的社會主義份子」之題詞。]他把他的論據直接訴諸廣大的群眾，非常努力使《到奴役之路》的筆風盡可能地具有可讀性。而他的成功遠超過他的預期。

對具有政治本能的哲學家而言，真理是爲某一特定目標服務，反之則不然，沒有任何一位具有政治本能的哲學家，能夠像海耶克在《到奴役之路》(頁165)中寫得這麼透徹：

> 擁有不同知識和不同觀點的個人，進行互動構成了思想的生命，理性的成長是一種允許差異存在的社會進程。正是社會進程之結果無法預測的本質，所以我們無法知道哪些觀點會有助於成長，而哪

> 些觀點不是。簡而言之，這種成長若既不能被我們現在所擁有的任何觀點所支配，也很難不同時限制它。「計畫」或「動員」心靈的成長，或統而稱之進步，在用語上就是一個矛盾。人類的心靈應該「有意識地」控制自身的發展這種想法混淆了個人理性，唯有理性以其成長所賴的人際過程能夠「有意識地控制」事物。我們嘗試控制發展，結果只會為其設限，而且遲早必然會產生思想的停滯和理性的衰微。

在英國防禦增強開始時，工會和工黨發現他們重新獲得1920年代大罷工(General Strike)之後所喪失的政治槓桿。他們利用這種政治力量來否決海耶克和凱因斯合力提出的非常財政需求以支付軍備生產。凱因斯和海耶克的計畫要靠強制儲蓄(於戰後恢復)來減少市民需求，如此可以讓市場以最有效的方式來反映政府的需求。勞工懷疑所有犧牲都出自他們，而且還得不到什麼成果。結果是對生活的各個層面愈來愈多的控制：幾乎所有商品都進行分配；工資、價格和租金控制；外匯和資本控制。所有這些控制在戰爭結束很久之後還存在著。

社會主義份子學到，而凱因斯學派沒有學到的政治教訓是，如果政府以其直接的支出來保障勞工的需求，政府便會失去所有反制勞工需求的方法。凱因斯學派在政治上的自信是，認爲他們可以駕馭那隻老虎。但是笑不笑是在老虎的臉上。

海耶克還有一項提議可以牽制政府日益高漲的權力。他建議以新的貨幣本位制，來替代以恆定的、參與國際交易的商品籃爲基礎而曾中止使用之金本位制。這項建議曾上呈1944年在布列頓森林(Bretton Woods)所舉行的國際貨幣會議。凱因斯理所當然地率領英國的代表團，並對所達成的協議負很大責任。羅賓斯和他一道去。但海耶克並沒有

受邀，他的提案沒被考慮。

《到奴役之路》發表於1944年，在英國獲得廣大的讀者群。這本書在美國也引起相當的震撼，1946年，海耶克應邀前往美國作巡迴演說。他獲得在場十五分鐘的歡呼。

前戰俘讀了登載在《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上的節錄版，而將這本書的內容傳到德國。占領的列強禁止《到奴役之路》在德國出版，官方的說法是，可能會破壞和蘇聯的友好關係。儘管有此禁令，該書的摘要以打字稿的形式在德國流傳。後來海耶克讀了部分這類打字稿，很驚訝地發現，有時候打字員會自己增加段落。

《到奴役之路》這本書原來是針對學院派經濟學家和社會科學家而寫的，但卻被視為「通俗」讀物，而未引起他們的注意。海耶克被隔離了。

放　逐

海耶克即將學得一項教訓，那就是：不像政治家、運動家和演員，學術界的學習是很慢的。而把握時機重於一切。海耶克經濟理論的作品有許多地方都談到把時間因素引進均衡過程的困難。但是，在大部分的經濟理論裡，時間在人類關係中的關鍵因素——如事情發生的時間，因果之間可能需多少時間才能傳遞——都沒有被搬上舞台，或是不在正文之列，只是不經意地在預期、風險和後果中帶過。包括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ith)和尼克森(Richard Nixon)在內，這些戰時勤奮的計畫者，把他們所能想到的東西都予以分配、徵用和凍結。當時，

也許現在還是沒有準備承認，要不是雷達和密碼破解的及時發現，以及德國未能在東邊前線適時找到羊毛和石油的代用品，他們所有的努力都是徒然。比方說讀一讀高伯瑞在《我們那時代的一生》(*A Life in Our Times*)中，機智的自我慶幸(或批判)之敘述，不難相信如果這麼敏銳的心靈都不能成功地運作經濟，那麼發育自不受限制的、未經琢磨的行爲之自由市場，又如何能夠做得更好呢？

答案在於那些擁有互利的人尋求彼此溝通的手段。即使是最遲鈍的人也會對自己的情況有所了解，而這種知識對其他人可能是有價值的。社會組織手段的進化——屬於人類行動而非設計的結果——是對於這類協調數以百萬計分散各地的參與者之需求和規畫的經濟問題，在實際上和理論上的解答。海耶克將這種思維的起源追溯到史密斯(Adam Smith)、休謨(David Hume)、佛格森(Adam Ferguson)以及曼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群眾中最壞的也會做出符合公益的事。」

我們這些不屬於高伯瑞之流的人需要簡單的行爲規則來遵循，也需要簡單的方法來追求更美好。這種需求隨著時間衍生出語言、法律、風俗和道德的規則。公開市場上貨幣的使用、財貨及勞務的交換，似乎像鴿子聚集在散落的玉米粒一樣簡單地發展起來。

在人類交往的這些層面或體制中，風俗常常被忽略。但是諸如說話的表現形式、服飾的風俗、隱私權以及財產的界線等，這些後天的習慣，可能是使人共處共事中最重要的。海耶克以自己爲什麼在英國感到如此地賓至如歸給了我們一個絕佳的例子：「比方說中斷對話的方式。你不用說：『喔，對不起，我在趕時間。』而是變得有點心不在焉，顯然在想著別的事；你一個字都不用說。」(見本書頁116)風俗和語言(包括動作和語調等)是不可分的，幾乎不露痕跡地和道德混合

在一起，然後再一併以易見的方式混合成法律。

海耶克在專業生涯中的時機是很幸運的。但是在他的個人生活方面就沒有這麼幸運。他在還相當年輕的時候曾經愛上一位表妹，但由於對他的想法有些誤解，她與別人結婚。海耶克也成了家，搬到英國，也當了父親。戰後他造訪奧地利探望留下的家族成員(他在火車上碰到也因類似出差性質而返鄉的表兄弟維根斯坦)，並得知他的初戀情人覺得已是自由身可以嫁給他了。他決定無論會帶給自己和家人多麼直接的痛苦，他毫無選擇地必須離婚。

想想海耶克當時在倫敦的處境，和從某些他最親近的夥伴處所受到的委屈，他從來沒有寫到道德傳統的另一個面相實在很不可思議：道德傳統具有排斥和孤立的力量。出版《到奴役之路》使他和大部分專業的經濟學家斷絕關係，而離婚的醜聞又切斷了大部分以前的社會關係。

他作了和在他之前的被驅逐者同樣的決定。他前往美國並寫下一部自由的經緯。

「很可能他們就在這時候開始注意到有人說他們的是非。學會小心翼翼、而且幾乎完全與世隔絕……。雙方的處境及天性從一開始就結合，使女性的地位和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成爲共同關心的主要議題之一。」這些話出自海耶克，寫的是米爾(John Stuart Mill)和泰勒(Harriet Taylor)(《米爾和泰勒》〔*John Stuart Mill and Harriet Taylor*〕，頁110)。海耶克研究米爾源於他對濫用理性的歷史研究。他所編輯的米爾和泰勒的書信集，副標題爲：「他們的友誼和往後的婚姻」，從好幾個方面來看都相當引人入勝。這是海耶克主張英國偏向社會主義始於泰勒和

米爾的很重要的文獻。但是由此也可以證明海耶克在收留國英國是如何的悠然自得，加上其在歷史觀、博學多聞和古物研究的天分(他是個偉大的圖書收集者)，而整理出一份透視英國文化核心關係的記錄。這本書信集另一引人入勝之處在於，海耶克寫的是人類關係中落實到人性的根源，這是推動經濟和政治發展的某些主觀價值的內涵。而這些複雜的事實不可以用實證方法簡化爲共同法則。

1954年海耶克獲得古根罕基金會(Guggenheim Foundation)的補助，使他和他的妻子得以花七個月的時間沿著整整一百年前米爾在義大利和希臘的旅程重走一遍。他們走了一趟米爾所沒有的行程：前往埃及。海耶克在那發表了有關「法治之政治理想」(The Political Ideal of the Rule of Law)的演說。1955年秋天，在返回芝加哥時，《自由的經緯》(*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譯者按：又譯「自由的憲章」]的寫作計畫已經成竹在胸了。

> 所有理性學派以外崇尚自由的偉大信徒，一直不厭其煩地強調，沒有根深柢固的道德信念，自由是行不通的，而且只有預期個人大致會自願遵守既定的原則，才能將高壓政治減至最少，這可一點不假。遵守這些非高壓所制定的規則之好處，不僅因為類似的高壓政治之惡，而事實上這些規則在大部分情況下都被遵守，而個人也可逾越這些規則，即使會因此而遭致批評也在所不惜時，這是比較符合人性的。社會壓力及確保規則被遵守的習俗，其力度為一變數，這一點也很重要。正是這種自律的彈性，使得道德層次上有可能逐漸進化和自發成長，如此才會累積更多的經驗引向修正和改善。

海耶克在《自由的經緯》(頁62-63)這麼寫道。這本書出版於1960年2月9日。

感官秩序

海耶克獲芝加哥大學的敦聘。聶夫(John Nef)回憶當時的情形(《尋求意義》〔*Search for Meaning*〕，頁37)：

> 我到英國訪問時，在倫敦會晤了艾略特(T. S. Eliot)和海耶克，使我得以替社會思潮委員會(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佈達兩項重要的任命。海耶克接受了一席歷時約十五年的終身教職。經濟系歡迎他加入社會思潮，雖然四年前經濟學者們曾反對經濟系任用他，主要是因為他們認為《到奴役之路》太過通俗，不是令人尊重的學者所應寫的作品。只要不把他和經濟學者扯在一起，讓他在芝加哥大學是沒有問題的。

海耶克在1950年10月以社會和道德科學教授加入教職員的陣容。他並非空手而來。他帶了題爲「何謂心靈？」(What Is Mind?)的手寫初稿來應聘。

稍後他曾如此解釋：「出版《到奴役之路》後，我覺得自己在專業上大大地自取其辱，所以我不想再冒眾犯。我希望能被科學界所接受。我希望能作一些純科學且不受我經濟觀點影響的研究」(見本書頁178)。這在智力史上是個尷尬的時刻。海耶克最後終於準備揭露他對亞里斯多德、洛克(John Locke)和休謨的心得，卻發現處身在沈溺於自我滿足的「新世界」(New World)中，這個世界對於認識論的難題毫無耐心。

海耶克回到三十年前他在馬赫的《感覺分析》(*Analysis of Sensations*)所首次碰到的問題。海耶克讓自己專注在沿神經脈衝至大腦的感

覺如何在腦部成為與「實際情況」似乎相對應的知覺上。到了第三次草稿，「何謂心靈？」的手稿成了《感官秩序》。他在「二十五年後的感官秩序」(頁289)描述了他的觀念發展：

> 我一開始便無法掌握的是概念作用——感覺纖維所能攜帶，或是神經細胞所能貯存的，凡屬我們所知曉的心理現象其擁有的明顯特質——不僅是由自我反省，而同樣地也從觀察別人好行為而得知。我早期的研究結果已對以下的事實有一清晰的體認，即這些心理特性可依脈衝之位置而定。這些脈衝循著神經單位組成了一個彼此關聯的系統，這使我將中樞神經系統詮釋為多層分類的工具，或者，更好的說法是連續和即時分類的過程以及許多層次(處理任一時刻輸入的脈衝群)持續不斷的再分類，最初是應用在所有的感官知覺，但原則上可應用於我們在心靈宇宙所發現的諸如情緒、概念、意象、驅動力等各種心理實體。

海耶克所攻擊的概念作用：「經驗始於感覺資料的感受，其擁有的不變特質，若非反映屬於被感知的外在物體相對之特性，就是與物理世界各種元素的特質有獨特的關聯」(《感官秩序》，頁165)，實始於亞里斯多德對我們學習事物的「本質」(essence)之堅持，然後藉著洛克的經驗主義準則：「凡心靈之所有無一不是感覺之所置」(Nihil est intellectu quod non antea fuerit in sensu; nothing is in the mind which is not placed there by the senses)而傳給我們。海耶克所選擇的攻擊路線和康德的路線平行，有時候似乎還交會在一起。

我們可以發現，在馬赫之前海耶克的生命以蘭花為主軸，而這「之前」正是感官秩序之鑰，如同海耶克告訴我們的，他追隨身為植物學者的父親之興趣，「也開闢起自己的植物標本室，甚至著手撰寫有關

紅花屬(Orchis condigera)的專題論文……。有系統的植物學並在定義明確的綱目上進行拼圖工作，對我成了實用性強的教育。但是我的興趣逐漸由植物學轉到古生物學和演化理論……那時父親非常具有洞察力，看出我的思維比較傾向於理論而不是分類學」(見本書頁48)。

有意將未曾區分的感覺予以分類之思維源自先前的經驗。「每一種感覺，即使是『最純粹』的感覺也必須被視爲個人或種族依據過去之經驗對某一事件之詮釋。」使用事先分類法來決定感覺之「意義」(sense)有別於康德所使用的先驗範疇，海耶克的分類形式在知覺過程內就自我顯現出來，且並非維持固定。這些分類與原則或原理不同。因此裡面就有著與自發秩序發展相連之處，或照他的說法有其「連繫性」。

「思維循此所進行的再分類，頗似我們學習語言的過程是要大聲讀出，而非單純發音拼字而已。我們學會根據既定的符號和其他不同符號所進行的組合而給予該符號不同的價值，而且也學會甚至不用注意個別的符號就可辨識出具有同值的不同符號群」(《感官秩序》，頁169)。

這本書是不是一部失敗的作品？因爲自出版後似乎鮮有人閱讀；即使是研究海耶克的學者們了解這本書的重要性，也還是只盡一盡閱讀的義務而比不讀來得好而已。剛開始的時候有些正面的評論，但即使在評價最高的評論中，也點出橫亙在這部作品的困境。如同多年後海耶克所承認的：「就心理學而言，我真的是從十九世紀冒出來的鬼魂。」

專業化的現代趨向已愈演愈烈，在美國的大學特別如是。海耶克在《感官秩序》中的論點給當時主導學院派心理學的行爲主義予致命

的一擊。海耶克被後來證明的、在認識論和心理學上無論就風格和內容都不入流的學院著作所忽略。(在大學之外，大眾對心理現象的探索像往常地以同樣隨便的直覺方式進行著。假使海耶克寫的是「超感官」〔extra-sensory〕而非「前感官」〔pre-sensory〕原素，那麼他很可能受邀作另一次的巡迴演說。)

「像海耶克這樣一位專家，不管在社會–經濟學的領域上是如何的知名，當他寫了有關知覺的論文，這種偏離本行的作法自然會面對許多橫眉豎眼」，有一位評論家這麼寫，在語氣和態度之間反映了其中的關聯。即使是博林(Edwin G. Boring)在《科學月刊》(*Scientific Monthly*)上最正面的評論，也指責海耶克犯了明顯的失敗：

> 即使當他是對的(而我應該說大部分時候是如此)，你也希望他在連接自己和前人的思想方面，能有恰如其分的表現。思維與意識的物理理論及其相關理論都不是新的東西，而我們所希望看到的不只是海耶克思維的內容，而是以科學思想史的觀點來看待他在這方面的理論。但是，容我再提醒一下，雖然海耶克的觀點並非前無古人，但是我很確定，在這項特殊的工作上，以前從來沒有人做得這麼好。

1956年，海耶克在芝加哥大學慶祝社會科學研究大樓開館25週年時，發表了一篇題為「專業化的兩難」(The Dilemma of Specialization)之演說。他毫無選擇只能為自己情況辯護。「我們對於願意冒著無視於專業化界線的大風險，而勇於從事也許沒有人能有十足把握的工作之成熟學者，當然只有稱羨的份了」(《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譯者按：以下簡稱《研究》]，頁127)。

《感官秩序》與海耶克的經濟和政治理論核心的重要關聯在往後的論文中更加明顯，特別是他為擴充《感官秩序》哲學含意而寫的〈複雜現象理論〉(The Theory of Complex Phenomena)和〈規則、知覺和理解〉(Rules, Perception and Intelligibility)。

對社會主義所必由的中央計畫之成效持正反論點者，不是基於就是陷入對行動後果預測能力在認識論上的辨證。正如海耶克在他的論文〈解釋的程度〉(Degrees of Explanation)中清楚地指出：「當能精確預測但卻不能控制已很明顯時，我們所能控制的發展應該不能超出我們對行動結果所能作的預測，因此預測上的限制也隱含了對控制的限制，但並非反之亦然」(《研究》，頁18)。

海耶克為了解釋人類行動預測能力上的限制，發展出一套複雜現象理論——承認**類型**(patterns)預測的可能性(所謂的類型，是對在有限成因下效果循環出現的聯想)但不是在這些類型之內對個別事件的預測。儘管有預測上的限制，個人和群體之得以運作實賴知覺規則的進化，這些規則容許不可預測之行動存在。文法規則就是一例，人們可依文法規則構造各種陳述，但每一個陳述意義都是不可預測的。

1960年海耶克寫信給波柏，說到他快問世的研究：「雖然我不是想把主要重心放在方法論上，但我目前正在進行的經濟理論新觀(The New Look at Economic Theory)可能以此為名出書，開始嘗試重述我對經濟理論本質的觀點，以及琢磨多時，且成果之豐碩似乎遠超過經濟學領域的概念——即循上述觀念所形成的較高層次規則性的概念。」事實上，在1952年寫給波柏的信上，他曾提到已開始這項研究。波柏反對《感官秩序》的重點在其所揭櫫的思維因果理論，波柏認為這是不可能的。而海耶克的回答則是：

> 你是否認為我所稱的「唯有原則的解釋」(explanation of the principle only)是一種因果解釋？如果你的論點用意只是在證明為什麼在特定的時刻會產生某種感覺或心理過程等等，我很能同意。另一方面，如果你想要否認這可以解釋生理過程如何藉著普遍性的秩序來安排，而這種秩序正是心理現象的特徵時，那麼，可得要大費周章才能說服我。當然，我對特定問題的分析會引起有深遠影響的哲學問題，好幾個月來我都想不透一個現在對我來說是最普通不過的問題，而在此刻我為自己描述成我們可稱之為「在系統之內」(within a system)和「有關系統」(about a system)之間的差異。我確實認為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因為自從我清楚地了解這個問題之後，我常常在各種不同的關係上碰到這個問題。雖然我有了一點小小的進展，這實在是我所處理過最困難、最棘手的問題之一。

海耶克的兩種說法都對。我們稱之爲系統之內和有關系統的問題是最重要的，也是困難而棘手的。他以著手撰寫論述「系統之內的系統」(systems within systems)的文章大膽地嘗試處理這個問題。當他發現沒有人知道他在討論什麼時，便放棄了。這是海耶克一生中第二次放棄對人類了解之本質的研究，而轉向法律的研習。

海耶克在芝加哥一直未能有賓至如歸的感覺。他有一部車一直放在巴黎的車庫中，一有可能便會和妻子回到他所鍾愛的阿爾卑斯山區(Alps)。他的聽力每下愈況跡近於聾，致使他無法與人交談。他已經完全不去劇院了。更糟的是從1960年開始，他的憂鬱症不時發作。

爲了恢復隨戰爭而消逝但他又如此思念的那種智性生活，他非常努力地在維也納重建一個中心，或被稱爲高等人類研究所(Institute of

Advanced Human Studies)，這個研究所的中心人物將會是他自己、波柏以及岡布里奇爵士(Sir Ernst Gombrich)。但是維也納大學的反對使得潛在的贊助者褁足不前，特別是已建立本身的中心以從事本身社會科學研究的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不用說，這個研究所並沒有再創失去的維也納。

1961至1962年冬，海耶克接受了位於德國貝雷斯高(Breisgau)佛萊堡大學(University of Freiburg)的教授之職。這項教職對他最後的退休有相當好的規劃，因此他接受了。除了從1969至1977年在薩爾茲堡(Salzburg)有一段不快樂的插曲外，往後日子他一直留在佛萊堡，夏天則在歐伯格耳魯(Obergurgl)山麓度過。

凱因斯在布列頓森林說服美國人有需要用之以拯救戰後世界免於另一次災難——但實際上是替英國設計來避免陷於金融破產——的國際金融工具，在1973年崩潰。英鎊的價值已隨著帝國沒落而江河日下，而現在美元與金本位制的最後形式脫鉤後亦將步其後塵。雖然凱因斯型的妙方在面對通膨和失業並存局面，很快就聲譽掃地，但是社會主義的魅力絲毫未減，特別是在大學裡面。

1974年，海耶克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許多關心此事的群眾最先的反應是驚訝他居然還活著，然後想起當時他曾經反對凱因斯的理論，有些群眾開始對他以前說過什麼感興趣。他給了這些人有力的辯詞：自由市場乃是自由社會的必要基礎。他也提供了他們貨幣無國籍化的論點，並建議利用自由市場來維持貨幣的價值。因爲各國政府已經自我證明無法勝任這項工作，因此海耶克的提議當然不失爲有值得考慮之處。但是銀行家長久以來就是政府管制的產物，已經忘了什麼是市場。

不管有多少暗路要走，市場終將勝出。海耶克對市場的看法不需要合理化或強制推行，因爲市場是社會體系的自發秩序。它本來就是生活的方式。我們需要的只是等待。圍牆通常都會塌的。

回　顧

並非所有分隔我們的界線都像柏林圍牆一樣地殘酷和醜陋。有些只是簡單地好比以吋而不是公分來量度，或是喜歡巴哈(Johann Sebastian Bach)而不嗜搖滾。但凡事都會改變。海耶克清楚地說出，經濟理論的工作是真正地解釋我們是如何對不可知之事產生適應。他說，我們應該「把一些經濟學的概念描述成河流而不是一股均衡的力量，說得明白點，我們應該以在不規則河床上水流之決定因素來思考」(見本書頁172)。

海耶克的成就乃證明了經濟學理論，就像社會行爲的任何理論一樣，是一種演化的理論。正因這種作爲，他已使得社會行爲研究回到原來的道路上(比方說瓊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對語言演進的看法，和史密斯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這種方式啓發了達爾文探索出以物競天擇作爲進化改變的可能方法，來解釋物種的分化。人們有時候會忘記，達爾文曾認爲在植物稀疏的荒地上杜鵑科叢之多樣性所展現出來的適應性，可反駁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對人口繁衍將超過糧食供應的悲慘預言。馬爾薩斯長期思考愛爾蘭的命運，總結出他對繁衍力無可避免地將超過生產力的悲慘預言。李嘉圖(David Ricardo)追隨馬爾薩斯，以此作爲他們討論經濟理論的內涵。觀念上認爲經濟非常像個孤島，在這

個孤島中唯有收入的劃分可以任意被決定。

這種把經濟理論的主題當作酷似孤島來處理的傳統歷久不衰，而且假設封閉系統的存在，就可以輕易地採用借自力學、甚至範圍更廣的物理學之平衡假設。而目標就是要獲得這種系統的可預測性。

經濟理論忽略達爾文對馬爾薩斯的反應而追隨李嘉圖對馬爾薩斯的的反應，實屬遺憾。要過了非常多年之後，人們看得出來在愛爾蘭的愛裔其不安狀態是因爲他們的島嶼不幸位於大英帝國之內。他們族群的數目在美國也受到注意，但是要使新世界人口過剩則需要更多種族比愛爾蘭人強的生育力。如果一個社會或是一個制度的界限改變了，這個社會的行爲也會改變。這些界限可以是任何次元(dimensions)的：時間和空間當然包括在內，但是知識的次元是沒有界限的；我們對系統內外任何因素之知識的改變，都需要整個系統的重新調整。

二十世紀的悲劇是廣大人口的不安於室，這些人成了後來海耶克所謂社會主義不要命的自負(fatal conceit of socialism)——嘗試設計和控制社會的命運——的受害者。這種設計在蘇聯和其他共產社會的失敗，無可避免地導致愈來愈多的控制，意即以封閉社會來控制知識。愛爾蘭的命運並沒有像吉朋(Edward Gibbon)所寫的：悲悼要比描述來得容易，遭受這種命運的是古巴。沒有人是孤島，島嶼也不可能孤立。

世上所發生的事件已經證實了海耶克的論點。他以批判控制之可能性在知識論上的論據，來攻擊營造主義者對控制社會的理想；他指出，就經濟和社會體制改變作出反應的預測是不可能的。諸如自由市場此類自發秩序的演進，是使在變動的環境中衍生各種適應力成爲可能的方式。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海耶克的論點鮮爲人所聞。世界各地的社會科學教員，講授馬克思要比講海耶克來得熱心。而在美國，經

濟學已成了依附數學的可憐學科。

海耶克的結論現在幾乎不容否認。但是反對預測的論調——也就是反對以**確定的**態度就任何社會或經濟情況改變的反應進行預測——同時也不能證明計畫或控制任何過程的嘗試將導致失敗。計畫的成功也可能純粹是出於偶然。我們無法預測計畫是否會成功。因此營造主義者在邏輯上是有漏洞的。休謨長存。

知識圈一直嘗試以初始原則或前題的先驗有效性來彌補這個漏洞。在不確定的大海中，唱誘人之歌的不是賽西(Circe)，而是確定。海耶克卻危險地航向這些岩石。

展　望

海耶克的著作大部分是一種劃定界限的過程。他有效地證明了我們絕大多數的社會體制，比方說語言和貨幣，既不是人類精心發明的產物，也不是像風和重力般這些自然環境的要素。在《感官秩序》中，他闡述了社會秩序的根源是一種演進過程：從觀察得來的規律之分類到法則的形成，所形成的法則允許一個系統的元素(次元)在愈複雜的分類中進行互動。演進的過程是漫無止境的，而任何特定時刻的影響都是不確定和不可預測的。

海耶克是在DNA結構被發現之前寫下《感官秩序》的。現在比較容易檢視他這觀念的原創性，理解起來也容易多了。生物生命的基礎乃由基因複製演化而成，與海耶克的原則相適，個別基因所控制的蛋白質製造其運作的「法則」有如語言的「法則」。固定數目胺基酸各種可能的組合，可以產生無數的蛋白質。這些蛋白質又以更為複雜的

秩序進行互動以形成有機物，而有機物又根據相吸和互斥的「法則」來進行互動。我們也許可以在這種過程中的某一點劃上一條界線，區分自然「法則」和產生自發社會秩序的演進規則。問題是我們要在什麼地方來劃這條線。

海耶克有兩點主要的看法不同於達爾文理論。他認爲自發秩序的形成是出於群體選擇(並非經由個體突變)，因此後天的特徵必然是可傳遞的。這兩個論點都需要重大的解釋，而且也都無法避免演化理論的主要破綻，也就是他們同義反覆的特性。存活是成功適應的唯一衡量標準，但是存活並不能對任何的適應提供成功的標準。沒有一種成功像存活那樣，今天還倖存，明天就不知去向。證諸恐龍就知道了。

然而，海耶克的理論認爲存活下來的是法則，不見得是根據這些法則所形成的群體。我應該說這個假設可以從海耶克的提示中推論出來，他並沒有明白地這麼說。但是如果我們採用這種衡量標準來辨識自發秩序(而非自然的或設計的秩序)，很多困難都得以避免。

海耶克在晚期的作品中，悄然利用法則來爲某些(不特定的)群體會比其他群體更適合存活下來的道德傳統作證。這種論調的危險在凱因斯對《到奴役之路》的反應中有所披露。凱因斯認爲適切的道德正當性會讓原本無法被接受的經濟和政治措施得以使用。任何要爲某一道德命題辯護的嘗試，都得面對一個自打嘴巴的爭論，一句你也是(tu quoque)的回話，使人無法反駁以下的論證：所有此類的先驗原則，例如道德原則，是無法以理性來看待的。從另一方來看，海耶克認爲思維無法自我了解的主張使得他在自辯時必須放棄理性，即使他否認這樣一來正合了他對手的意。

如果我們回到存活下來的是法則，不見得是採用這些法則的群體

或個體這樣的假設，那麼問題便可用不同的詞句來思索。於是進化的過程——相等於物種的天擇——就變成一種自我選擇。這意指當適應力令數目較大的個體得以彼此溝通，並較能解決他們環境中的問題，這樣的適應力便是成功的。我們用群體來估量被採用法則的成功與否，其人數並不固定。譬如說，說英語的群體會因用法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組成，而且從來就沒有等同於哪一組人群，像指英格蘭的居民。採用自我選擇的理論必須花很長的時間來除去某些新興的社會衝突，例如，層出不窮的在體制中去除多重文化差異的需求，還有，更糟的是，世界上某些特定動盪地區的「種族淨化」。社會組織的形成如果是以自我選擇爲基礎，任何人不用犧牲其自我認同便可參與任何數目的自發秩序，如語言、家庭、市場和宗教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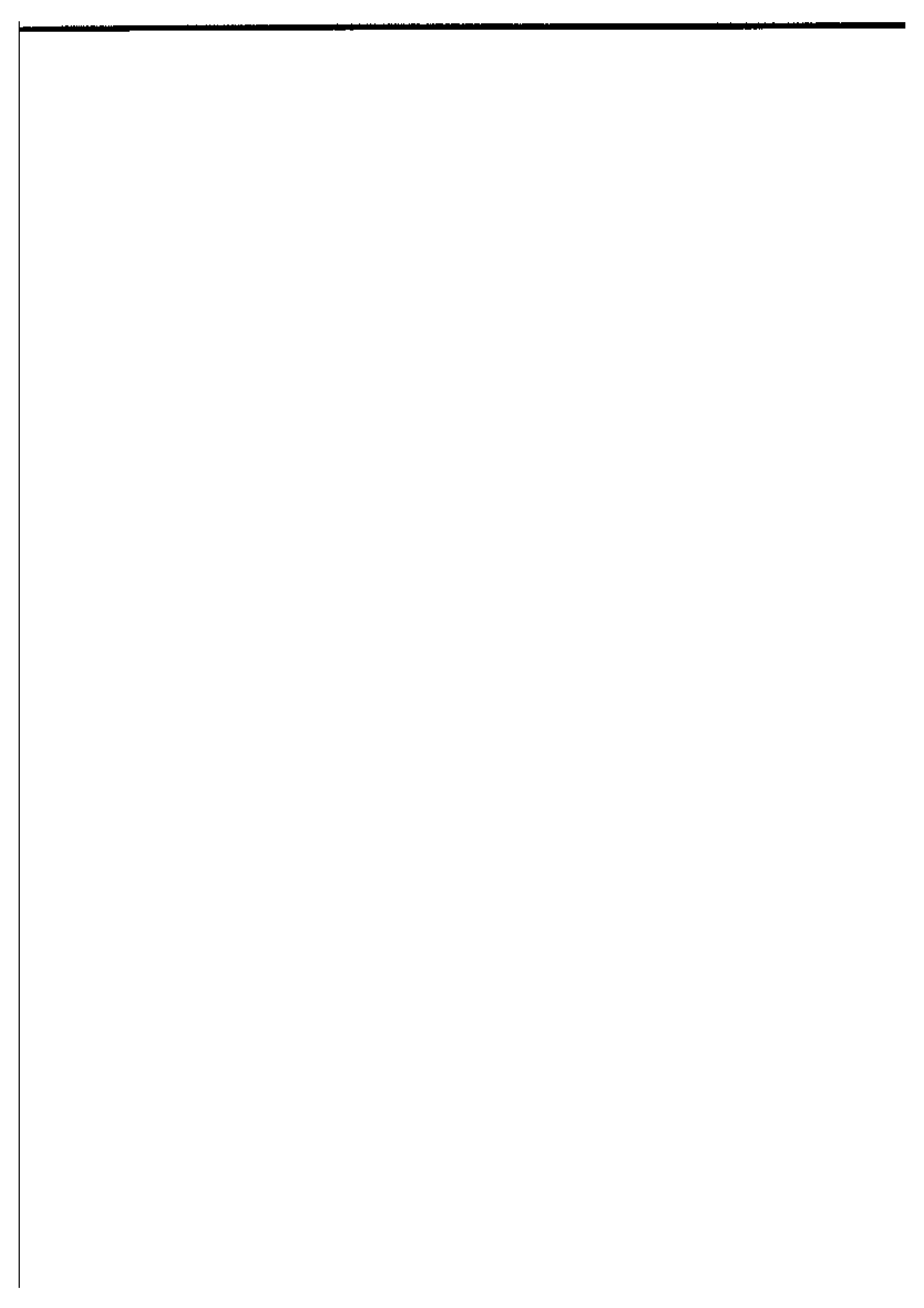
也許在海耶克的一生和作品中最幸運的諷刺是，因爲有了他，我們較沒有理由對理性感到絕望。他主張思維無法自我了解是出自《感官秩序》內一項主要的結論：「我們要嘗試建立的命題是，任何分類的工具應該比所要分類的物體擁有複雜程度更高的結構」(頁185)。

但是他也了解，除了人類思維是可能的例外，複雜性愈來愈大的結構其演化是沒有止境的。在〈規則、知覺和理解〉這篇文章中，他了解到這個問題本質上和某些其他落入弔詭的哲學性問題是一樣的，而且和他寫給波柏的信中所提的從系統之內來說系統這樣的問題是一樣的。雖然海耶克本人放棄了這方面的研究，但是他開啓了一扇門，爲下一波解讀更高複雜層次提供了相關的文脈。塔斯基(Alfred Tarski)後設語言的論著，和巴特利論理性的著作已經爲這個新領域勾勒了部分藍圖。

要讓教訓深植人心，可能要經歷更多的政治和經濟災難，但是我們似乎已經慢慢地領悟到，思維(理性)無法將本身所產生的類型加諸世界，但是可以發現和了解生命所顯示出來的類型。複雜系統理論，這門日益興起的學科，其思想家，甚至在稱為人工生命(可以證明這不是矛盾修飾辭)這門分支的思想家，發現自己所思考的自發秩序，非常具有海耶克的特色。即使就電腦而言，不可預測的複雜形式，也是從一組一組簡單的規則演化來的。

因此這些研究者即將要了解的生命，不管是人工的也好，自然的也好，是存在於混亂的邊緣。海耶克不朽。

克雷斯吉(Stephen Kresge)



第一部

維也納–紐約–維也納

我父系中不僅是知道名字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我的高祖父，約瑟夫・海耶克(Josef Hayek, 1975-1830)，他在1789年獲授小小的貴族頭銜(即「馮」〔von〕)，我們家族自此即冠上這個頭銜。高祖的父親勞倫茲・海耶克(Laurenz Hayek)曾經在莫拉維亞(Moravia)一位貴族大地主靠近布爾諾(Brünn; Brno)的地產任過職，但是在他的兒子約瑟夫不到五歲的時候便過世了。約瑟夫・海耶克被任命爲政府高級官員後，以祕書的身分隨著那位地主到維也納，接著再與地主一起回到莫拉維亞，成爲該地產的總管。約瑟夫・海耶克藉此在莫拉維亞和奧地利下城區(Lower Austria)開發出兩間新的紡織工廠，工廠的設立形成了兩處新村莊。後來他也成了這些工廠的合夥人，而且獲利頗豐。這在1789年的奧地利是項重大的成就，如此他才能在三十九歲的英年受凱撒・約瑟夫二世(Kaiser Josef II)的冊封。約瑟夫・馮・海耶克(Josef von Hayek)的父親和祖父都曾參加過塞里西亞(Silesian)戰役，他把這一點也列入其晉身貴族的條件之一。除此之外，很遺憾的，我對這些較早的先人一無所知。

約瑟夫的兒子海恩里希(Heinrich)利用繼承得來的可觀財產研習法律，而後娶了一位很有天分的歌唱家茲維爾齊納(Franziska Zwierzina)，

並出任維也納某個部會的公職，他在這個職位上大概只需要每天早上工作兩三個小時，他很長壽，過了一輩子有尊嚴舒服的士紳生活。他的兒子，也就是我的祖父加斯塔夫・馮・海耶克(Gustav von Hayek)，生於布爾諾，最先受教於家庭教師，後來上了維也納一所高貴時髦的學校特禮士安藍(the Theresianum)，當時只有貴族子弟才能上這所學校。但是在他即將要參加進入大學所需的高中畢業會考的前幾個月，他提早輟學。他成了海軍軍官，實際上，似乎有點像是年輕的海軍花少。從現存最早的照片中看出，他是威尼斯的海軍軍校生。威尼斯當時是奧地利艦隊的基地。

加斯塔夫命運多舛，他以海軍為志業的期望難圓。他的父親海恩里希不知何故，在晚年，也就是當加斯塔夫在海軍服役時，散盡了他們家庭優渥生活所倚賴的財富。這次災難的細節我並不清楚，但是大部分的錢財似乎在1860年代就已經流失，比奧地利許多中等階級喪失財富的1873年危機來得早，而且往後的處境對當兒子的顯得更糟(在他已經結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庭之後)，因為他居然未能繼承原先所期望的部分財產，這些財產全由未婚姑媽們瓜分了。因此，我的祖父不管只是對海軍生活單純的不滿，或是為了婚姻之故(低階海軍軍官的微薄薪水是不容易維持家計的)，或者還有其他別的理由，在已經接近三十之年，決定離開海軍。我之所以說「或者還有其他別的理由」，是因為他在海軍裡似乎過著相當奢華的生活，要是沒有一筆財富，持續過這樣的生活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因為我稍微記得有這麼個故事，說這個年輕的軍校生曾經穿著配有非常規裝飾品的制服出現在遊行的隊伍上，後來負責指揮的上將第二天現身時，制服上也做了同樣的修飾，才使他免於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懲罰。

由於提前離開大學預科學校後經歷了不少波折，加斯塔夫於是重拾課業，他研習了自然史和生物，最後當了老師，一名大學預科學校的教授。他在生物學上一些系統性的論著還相當知名。他以鳥類學家的身分引起了魯道夫王儲(Crown Prince Rudolf)的興趣，並被王儲賦予籌劃1881年在威尼斯舉行的國際鳥類展，很快地他又對未來懷抱著較高的希望。但是當1889年王儲自殺後，這些希望又落空了。這種對生物學的興趣爲我的父親奧古斯特·艾德勒·馮·海耶克(August Edler von Hayek)，和我的兩個弟弟(一位是解剖學者，一位是化學家)所繼承，而且也重現在我的女兒身上(昆蟲學者)。

無論對自己的貴青身分和出身門第如何自豪，如果說我的祖父母是生活有節，而我的外祖父母，馮·尤拉薛克家族(von Juraschecks)——雖然來自一個「新興」的家族，晚了一代之後才受封——則無疑是上層的中產階級，而且富有得多。我的外祖父佛朗茲·馮·尤拉薛克(Franz von Juraschek)曾經當過大學教授，隨後任高階政府官員，他不僅有學者的背景，還是享譽國際的統計學家。他憑藉他妻子那一定是爲數可觀的財產，而能維持相當不錯的生活水準。

馮·尤拉薛克家族住在位於凱爾納街(Kärtnerstrasse)55號一座有十個房間的華麗、甚至可說是奢華公寓的頂樓，而且至少僱用三位佣人。毫無疑問地，這是維也納最美麗的公寓之一，從劇院跨過凱爾納街，面對著圓環街(Ringstrasse)，這棟建築在我外祖父過世後，於1914年被拆建成新的布里斯托爾大飯店(Hotel Bristol)。外祖父母的公寓是我的第二個家，除了至少每兩個星期有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像類似我的父母偶爾出外旅行，或是1912年秋左右我父親患重病之後，我也在那兒

度過較長的時間。我外祖父再婚所生最小的孩子，也就是我的舅舅佛朗茲不過比我大四、五歲，因此周日聚會時家族成員眾多，而包括的年齡層則從我的外祖父母一直到我最小的表兄弟姐妹都有。我的父母非常相配，而他們的婚姻生活似乎(不僅對我而言)永遠是晴空萬里充滿快樂。雖然早年的時候錢一定不多(我父親剛被任命爲義診師〔Armenarzt，爲窮人服務的市級醫生，是健療局〔Medical Office of Health〕最低的職位〕，其微薄的薪水大概等於我母親小額財產的所得，兩個人的收入加起來，在1898年時，我想差不多是2,000美元)，但是他們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都過得相當舒適。

後來多賺些外快已經不再是那麼迫切的事，父親似乎就放棄建立私人診所的任何認真嘗試，而且滿足於在衛生部的層級中慢慢爬升，另外把閒暇的時間投注於心愛的植物學。家父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完全放下醫學，而在大學裡面獲得植物學的教席，但是這一天一直沒有來臨，而「教授」不過是給予任職多年的靠校講師的尊稱。雖然這項未了的心願對他是個遺憾(而且很可能使我認爲大學教席是我所有可能獲得的職位中最想要的)，他的科學研究成果則相當豐碩，而且在他專門的領域——植物地理學(plant geography，現在稱爲生態學)，他受到同行頗高的尊敬。他驚人的記憶力使他能對植物有非常深入的認識，而且他自己也常很感慨地說，他自己多少可能是最後一位植物學家認爲以觀察辨識大部分植物是應盡的職責。

家父在他最後的歲月裡已成爲維也納植物學界的社交核心，他們定期在我們的公寓聚會。他死得有點早，享年五十七歲因血液中毒引起腎衰竭(那是在奧斯提爾市〔Oststeiermarkt〕進行植物考察造成腳泡的結果)，要不他至少可多活十五年。家母費里希塔斯(Felicitas)以九十

三高齡在1967年才去世。

我的父母雖然沒有正式脫離先輩的羅馬天主教教會，其實是沒有宗教信仰的。縱然他們已經不再強烈地反宗教(我懷疑我祖父和他那一代的許多科學家一樣，是反宗教的)，但是所有絕對的教條對他們而言都是過去的迷信。他們從來沒有帶我上過教堂。雖然在我開始以閱讀爲樂後，作爲常識教育的一部分，我曾擁有一本兒童聖經，但是當我對此著迷時，這本聖經卻神秘地消失了。

學校當然有宗教教育，而且在大學預科學校，參加星期日的彌撒是半強迫性的。這股強迫壓力的合法性一直受到質疑，因此每當周日有郊遊(春夏兩季每逢好天氣，家裡常常這麼做)，我們這些男孩子就不參加彌撒，因而經常和校方產生摩擦。我只有在預科學校前兩年，也就是差不多十歲或十一歲時這麼一小段時間，在一位非常有說服力的老師影響之下，我才有強烈的宗教感。而且我清楚地記得，在告解和翌晨第一次靈交之間，因相信原罪而帶來的苦悶，但是這個階段只維持很短的時間。到了十五歲的時候，我已說服自己沒有人可以對「上帝」這個字提出合理的解釋，因此肯定一種信仰，和聲明不信上帝是一樣沒有意義的。

雖然大致說來，我自此都一直抱持這樣的立場，但是只要我沒有受到挑戰，我一直避免表現出或甚至說出自己沒有信仰，以避免對其他有宗教信仰的人不必要的冒犯。另一方面，面對不同基督教派，我的立場就有點複雜。我認爲如果有人真的需要宗教，那最好固守在我看來是「貨真價實」的，也就是羅馬天主教義(Roman Catholicism)。新教(Protestantism)的教義一直給我的印象是，從迷信中解放出來之過

程的一步——一旦走了這一步，必然導致完全的不信。但是新教教義表面上的合理性，也許會使無法接受全部天主教教義的人奉守基督教教化。易言之，我覺得只有這兩種極端的情況是可以忍受的穩定立場；既然我已經在這兩種極端的立場中，擇其一端，因此也沒有特別好憂慮的。雖然**在智性上**，我是比較同情新教教義，但是卻承認，如果人們必須有宗教，天主教教義似乎較具一致性，所以別人看我似乎常常前後不一致。

問者1：您以道德結構，即「正義行為」(just conduct)的概念來思考，是不是得之於宗教某些最基本的認知？

海耶克：我想這確實會回到到底是哪些人會以宗教來求解的問題。在周遭的世界，有許多井然有序的現象是我們無法了解，但卻不得不接受的。最近我發現，佛教這種多神教，要比西方的一神教對我更具某種吸引力。如果人們像一些佛教徒一樣，認清自己的局限，對世上其他有秩序結構的存在抱著無上的崇敬，而且也承認無法完全了解和詮釋這些結構，我認為這是一種值得讚賞的態度。

我確實對宗教不持好感，不過我所反對的是那些一神論的宗教，因為它們不具包容特性，實在是很可怕。所有的一神宗教都沒有包容性，而且嘗試要把它們特殊的教義加諸別人身上。我剛剛對日本的情形有一點研究，在日本你甚至不見得只屬於一個宗教。幾乎每一位日本人一方面是神道教教徒(Shintoist)，而另一方面又是佛教徒，這種情形被認為是和諧。每一位日本人的出生、結婚和喪禮都是採神道教的儀式，但是所有的信仰都是屬於佛教的。我想這是一件值得讚賞的事。

我唸過好多所學校，因為搬家換了一次小學(Volkschule; elementary school)，由於和老師們相處不來，換了兩次大學預科學校，老師們是被我時而能幹時而懶惰，有時又想表現出一付興趣缺缺的樣子所激怒。學校裡除了生物學以外，很少有令我感興趣的科目，還有我常常不想做家庭作業，靠的是上課聽的那些勉強及格，每到學期末，有問題的學生可以參加一種稱為升級資格試(Forsetzungsprüfung)的重要測驗，通常，我臨時抱佛腳的結果都會過關。但是四年級時有一次，我三科主科，拉丁文、希臘文和數學全部被當，連參加升級資格試的機會都沒有，只好留級。留級的一個好處是我讀懂荷馬(Homer)，學會並喜愛上荷馬式的希臘文，因為那一年希臘文上課讀的是荷馬。1916年，我要升級時，碰上的導師又是1913年和我起衝突的那一位，於是我再一次地換到另一所大學預科學校，但是我在這所學校待了不到五個多月便從軍去了。

我最初對科學的興趣，和父親一樣是在植物學上。父親各式各樣的自然標本——礦物、昆蟲和花卉，很早就引起我的興趣，另外在他所擁有的一間相當大的植物標本室裡，以及在他擔任好多年"flora Exicata"〔稀有品種乾燥植物有組織的供應和交換〕的主編時，我幫他的機會可多了，開始時幫他蒐集標本，後來幫他攝影，這項嗜好是我在十三歲到十六歲期間培養起來的，它占用了我大部分的空閒時間。我也開闢起自己的植物標本室，甚至著手撰寫有關紅花屬的專題論文，但在這項努力上由於我一直未能找到這個稀有品種的活標本(或是，可能的話，變種也好)，乃致豪氣頓失。有系統的植物學並在定義明確的綱目上進行拼圖工作，對我成了實用性強的教育。但是我的興趣逐漸

由植物學轉到古生物學和演化理論。當我開始覺得人是比較有趣時，已經差不多十六歲了，甚至有一段時間還想過要當精神病醫師。公職生活和社團組織中的某些層面——如教育團體、新聞媒體和政黨，也開始引起我的興趣，不過還不到要作有系統研究的地步，而是出於一種理解我所居住之世界的渴望。

我的父親看出我對生物學分類方面無法滿足我知性上的需求，及我對理論方面的渴望，因此交給我厚厚兩冊韋斯曼(August Weismann)的《進化論研究》(*Vorträge über Deszendenztheorie*)，有時候我會遺憾當時我還太年輕。這些書完全超出我理解和持續研習的能力。我想要是再晚些幾年(當時外在的環境使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現象)我重讀這些書，也許我會成爲生物學家。我對生物學的狂熱從未消退，研究這類課題可以滿足我耐心追尋重要事實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在經濟理論中因爲受到學科本質上的限制是無法得到滿足的，因此必須偶爾略事涉獵傳記、宗譜和類似的活動作爲消遣。

問者6：您在生物學上的訓練主要是得自大學預科學校？

海耶克：不是，不是從學校學到的，而是在家學的。大部分的影響是來自我的父親，和我們家無所不收集的傳統。我開始有自己的植物標本室並首次嘗試進行科學研究，是對一種假設品種的蘭花進行研究。要解決的問題是，這種蘭花是某特定的品種還是變種。於是我就鑽入分類學，那時父親非常具有洞察力，看出我的思維比較傾向於理論而不是分類學。他給了我兩本進化理論的書，不過早了一年。如果他一年後才把韋斯曼和德・佛里斯(Hugo De Vries)交給我，也許我會守著

生物學。但是我對分類性工作沒有興趣，於是逐漸退出。

戰爭的大動亂使我對經濟學較感興趣。我在唸大學時，還在經濟學和心理學之間游移不定。法學和經濟學有工作的機會。而且在史托爾過世之後，甚至連教心理學的人都沒有了。我所知道的心理學，都是自己從書本上學來的。其實也沒有學習其他科目的選擇。

雖然我在學校常被認為是聰明但懶惰，而在閱讀方面是貪得無厭，我認為自己那時並不屬於「智慧」型，而且我的野心比較是希望能夠有效處理生活中的實際細節，而不是什麼學識。不管是照相或滑雪；書籍的使用或各種收集，我把自己的聰明才智大都用在獲得技巧，或是掌握實際事務的理論基礎，而不是日後占據我大半生的知性問題。我有一種強烈的欲望要使自己能夠處理生活的實際事務，學會如何組織事物，特別是我自己的事情，簡而言之，就是要有效率。有一段時間消防隊裡面身上套著行頭的那匹馬是我的標竿——守在隊中隨時在不浪費絲毫的時間下一接獲通知就出動，並盡可能把例行工作簡化和機械化。

在我十六、七歲左右，對戲劇發生很大的興趣，這是我花了一段時間有系統地追求，而且真正主動的第一項興趣。我不僅成為維也納國家劇院(Wiener Burgtheater)的常客，讀了很多相關的歷史，而且開始廣泛地閱讀，包括十七、十八世紀大部分西班牙和法國劇作家作品的翻譯，以及古希臘戲劇。(德國的「古典作品」和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主要劇作的德文版我早就知道了，有一部分是來自父親在晚上時對我們的大聲朗讀)。約在1916年前後，我對戲劇文獻已經有

了相當廣泛的知識，包括易卜生(Henrik Ibsen)和比約恩森(Bjornstjerne Björnson)這些相當現代的作家，和赫布爾(Friedrich Hebbel)這種較不為人知的人物(最近出版的赫布爾全集是我最早的主要藏書之一)。我甚至開始動手寫悲劇，寫的是相當暴力、多少有點性愛(erotic)的歷史主題(如安德魯瑪姬〔Andromache〕、羅剎蠻〔Rosamund〕等)，不過我從來沒有完成過一個劇本，雖然通常我都能寫到想像中效果相當不錯的最後幾個景。

問者6：您還記得其中任何情節嗎？

海耶克：有一個情節好長一段時間一直占據著我心頭。這是有關安德魯瑪姬的一個劇本。這個劇本中有各種含意，非常模糊，而有一半可以讓人看懂。但是結尾的那一景很棒，實在是非常具有戲劇性效果。安德魯瑪姬是阿契里斯(Achilles)兒子的奴隸，她從城堡精神恍惚地往海中走去，走上一塊伸向大海的岩石時，太陽剛好升起，於是她奔向太陽，喊道：「是你，是你，我的赫克托(Hector)」。然後，飛墜入海。

1917年3月，我在維也納加入野戰砲兵團，受了七個多月的訓後，以士官長候補軍官(sergeant-major-officer-cadet，我還可以翻譯出更長的頭銜)的身分派到義大利前線服了一年多的兵役。我在伊宣宙河(Isonzo)畔的哥里茲亞(Gorizia)附近錯過了我的中隊，當時在卡波雷托(Caporetto)戰役之後，我的那個中隊才剛離開哥里茲亞去追義大利人，幾天後我終於趕上這個中隊，之後幾乎一整年時間都駐紮在派瓦河(Piave River)左岸。最刺激的時刻是，1918年6月一次失敗的攻擊行動，1918年10月

奧匈部隊的崩潰，和兩波的撤退行動。這段時期的後半，大部分的時間，我們對饑餓、疾病和捷克人兵變的謠傳，要比對真正的戰鬥來得關心。我和大多數的同袍一樣染上了瘧疾，就在撤退時才發作，因此當我在接近1918年11月中旬返回維也納時，是處於一種虛弱不堪的狀態(我的羸弱部分原因是稍早前在夏天得了重感冒)。

我是在軍隊的士官學校第一次真正地向自己證明(這點看來我似乎從來沒有認真懷疑過)，只要我真正的想要，我便有本事，而且不用費太多功夫，就可做得和同儕間最好的一樣好。即使是在純技術性細節方面，比方說，榴彈砲的可變後座力機械裝置，我雖然永遠無法像較有機械頭腦的同輩那樣得心應手，而且儘管我沒有任何特別的天生才能，甚至還有些笨拙，使我無法做得像某些同僚那樣可達馬術師或製圖員的水準；但在七、八十位軍校生中，我還是名列前五、六名，當時，這給了我相當的樂趣。

當然，就某方面而言，當時我是比較學術傾向，對日常世界較不熟悉(特別是對女性)，而且比起大部分的同輩而言，比較接近書本。但是這一點(除了我對一些非常世俗事物的無知外)，比起那個圈子裡一、兩個真正智性和相當有內涵的人，我還差得遠啦！至於和這些成熟得多的年輕士兵比較起來，當時和往後幾年的我，仍是個孩子。

問者2：我似乎記得您曾經對我說過一則故事。您曾負責某些部隊的撤退。您是位中尉，並遇到相當有趣的……

海耶克：事情並不是那麼有趣。從派瓦河撤退時，我們先是被義大利

軍隊追趕。因為我是團裡面的連絡官，也就是說在當時的情況下，我認識所有少數幾個唯一可信賴、會講德語的人，因此我被賦予為砲兵團帶領一小支分遣隊，先是擔任後衛抵擋追我們的義大利部隊，然後在穿越南斯拉夫時充當前鋒，當地有非正規的南斯拉夫軍官想要攔截我們並搶奪我們的槍隻。參了一年的戰，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事，但是在那情況下，我只好向開火的機關槍攻擊。那個晚上，當我靠近機關槍時，他們已經走了。但這是一次不愉快的經驗。

當我還是個小男孩時，對歷史和公共事務全然不感興趣，後來的興趣主要是因爲接觸一位年紀稍大的朋友而被喚起的。這位朋友的名字叫作瑪格(Walter Magg)，他是我童年唯一的好朋友。他比我大兩歲，特別有天分，非常愛好音樂(我則不然)，而且有廣博的文學教養，並且擁有的寫作才能遠非當年的我可以比擬。就他那個年紀而言，他很成熟，這使得有一段時間我們關係疏遠；不過我趕了上來，並在1915到1917年之間，他對我興趣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他從軍的時間比我早些，1917年10月在萊百克(Laibach; Ljubliana)認真執勤時染病身亡，幾天之後我才路經此地去和我的中隊會合，因此而緣慳一面。

我能清楚追溯對經濟學產生濃厚的興趣是始自1916年底，在大學預科學校七年級時的一堂邏輯課，當時老師對我們解說倫理學，依亞里斯多德的分法可三分爲道德、政治和經濟學，這似乎完全涵蓋了我所感興趣的範疇。當我突然宣佈有意鑽研「倫理學」時，父親感到相當震驚，幾天之後，爲了讓我相信倫理學都是些一派胡言，給了我四本他在舊書店挑出屬哲學家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作品。我必

須承認我覺得這位哲學家不過是位無聊的人，只有到很後來才接觸到嚴肅的哲學。其實那時候我也還不是真正了解經濟學，我那時所讀的主要是政治方面時論性的小冊子，大部分都屬社會主義或半社會主義性質，作者則涵蓋倫納(Karl Renner)到拉瑟諾(Walter Rathenau)，而我最初經濟學的想法則是衍生自拉瑟諾。(1917年秋天，我暫時離開軍隊以取得我的高中畢業會考成績，在預科學校裡確實遭到麻煩，原因是我在上神學課時，閱讀一本社會主義的小冊子。)一直要到約莫1917或1918年在派瓦戰場上一段平靜的時期，我隊上有個年紀比我大一點的軍官，給了我第一組有關經濟學方面有系統的著作，我到現在還想不透這些書居然沒有讓我永遠討厭這個科目。我反而是很認真地勉強把這兩冊書(作者分別爲葛倫茲爾〔Josef Gruntzl〕和詹特許〔Karl Jentsch〕)啃完，而這些經濟學的著作說有多差就有多差。

問者2：既然您來自一個有自然科學背景的家庭，怎麼會對社會科學感興趣呢？

海耶克：我想決定性的影響應該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特別是在一支屬多國部隊的奧匈軍服役的經驗。這經驗就使當時的我多少看出了大帝國會因民族問題而崩潰，我參加過一次戰役，其中所使用的語言居然有十一種之多。這使你不得不注意到政治組織的問題。

我約莫是在義大利服勤時決定鑽研經濟學。但我是在看了孟格的《經濟學原理》這本有趣且令人滿意的書，才真正被套牢的。而即使那樣，你們知道的，我除役回來還是去唸法律，以便能夠鑽研經濟學，但是我對經濟學和心理學幾乎是同等喜愛。最後，我必須在我所感興

趣的學科中作個選擇。經濟學至少有正式的學位，而修心理學卻什麼也拿不到，也沒有工作的機會，於是我就決定攻經濟學。

部分由於立即實用的原因，我原來的生涯規劃是同時在大學唸法律和在領事學院(Konsularakademie，訓練未來外交官的專門學校)研修語言和國際問題，畢業後先服務於外交界，藉著這個資歷，也許往後可以在學界或政界謀得一個職位。但隨著奧匈帝國的崩潰，領事學院也消失了，這項規劃中有關外交生涯的那部分便沒什麼吸引力，法律依然是我主修的科目，結合經濟學，一方面可以為律師執業作準備，或是我覺得比較可能的情況，為擔任公職作準備。

我在1918年11月回到校園，學期已經開始很久了，而且我又感染了嚴重瘧疾，我馬上一頭鑽進好幾門學科的研習，並且至少在第二年的春天就展開非常活躍的社交生活，以現在的我來看，當時似乎精力驚人。曾經連續好幾個禮拜我白天用功學習，而晚上大都去跳舞，雖然那年冬天煤源短缺並實施燈光管制，以防夜生活拖得過長。

緊接著大戰之後的那幾年，維也納大學學生之間談論的兩個主題是馬克思主義和心理分析。就像後來它們在西方所引起的情況那樣。我很認真地研習這兩種學說，但是愈讀愈感到不滿意。他們的學說在當時的我看來，似乎完全不科學，因為他們定義名詞的方式使得他們的陳述必然為真，而且無法辯駁，因此對這個世界等於什麼也沒說，以後事實果然如此。我便是在與這些觀點對抗時，發展出類似波柏經由類似經驗所形成的科學觀，當然架構沒有他的清楚。遠在我們認識前幾年，他在1935年出版的《科學發現的邏輯》(*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我很自然的就了解他的觀點。

問者6：在我看來，從1880年或1890年起，可能一直要到1930年代，維也納幾乎是知識的發酵中心。現在您回想起來是不是那樣？

海耶克：你可以追溯到更確實的日期。大改革是在1867年，在此之前維也納大學完全默默無聞，一無是處。從1867年它開始成長，到了十九世紀末達到頂點。最高峰是從1890年代一直到1914年。戰後又復甦了一次，持續到1920年代，幾乎打從1930年代初就一蹶不振，不僅是在經濟學，所有學科都是如此。

※　※　※

問者4：我在觀察這個時期時，發現戰前有許多人常常把自己說成是實證主義者或是反實證主義者，而戰後的許多年輕人也是如此，我實在不清楚當時實證主義真正的意思是什麼。

海耶克：這幾乎全是受物理學家馬赫和他信徒們的影響。他是在哲學上最具影響力的人物。當時，除了我在戰前所讀的，我認為我對哲學的入門是經由馬赫式的哲學——現在幾乎猶豫是不是能稱此為哲學，我想比較好的描述是科學方法。馬赫的學說對一般的科學史處理得非常好，而且支配了維也納的討論。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完全傾向馬赫。當我還在大學時，一位很有趣的人物施利克擔任哲學教授。這便是維也納圈子的濫觴，我從來不是其成員，但是這個圈子的成員和我們有密切的接觸。其中有一個人[考夫曼(Felix Kaufmann)]應該是我們這個稱為智者圈的成員，同時也屬於施利克的圈子，亦即是維也納圈子本身，因此我們能隨時知道彼此的圈子發生什麼事。

令我卻步的是在諾伊拉特(Otto Neurath)傳統意義下位列科學專家

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對經濟學的理解是這麼極端，這麼天真；實際上就是因為他們，我才察覺到實證主義不過是在誤導社會科學。多虧是諾伊拉特的極端論點，我才認清這個理論行不通。但是要從這種傳統中解放出來，確實花了我好長一段時間。一直到我離開維也納以後，我在倫敦才開始有系統地思考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問題，而且開始認清這領域的實證主義確實是誤導。

有一次我從倫敦到維也納訪問，和我的朋友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討論時，曾向他闡明，我已經得出這種馬赫式的實證主義對我們之目的是有害的結論。然後，他反駁說：「噢，維也納實證主義圈子有一位叫波柏的人出了一本有關科學研究邏輯非常好的新書。」因此，我成了這本書最早的讀者之一，離出版才幾個星期。我發現哈伯勒似乎誤解了這本書所由出的背景。雖然形式上是出自那個圈子，實際上是在攻擊那個體系。我對這本書感到非常滿意，因為這證實了我源於與波柏非常類似的經驗而原本就已經形成的觀點。波柏比我小四、五歲，所以我們不屬於同一學術世代，但是形成我們觀點的環境卻非常相似。這個環境大致是籠罩在要嘛就與馬克思主義者討論，要不就與佛洛伊德學派討論的氛圍。

這兩個團體都有一點令人氣結的特色：他們堅稱他們的理論原則上是不可辯駁的。我特別記得有一次當我在和佛洛伊德派的人辯論時，他們竟解釋說：「噢，這個嘛，是因為死亡的本能。」而我說：「但是這不可能是因為死亡的本能。」「噢，那麼這是因為生命的本能。」就這樣，我突然察覺這個學說是多麼地荒謬。如果你有兩種不同說法來解釋某些事情，自然就沒有辦法檢驗該理論是否為真。而這已經使我了解到波柏的主要系統論點：實證科學的檢視是要能接受辯駁，而

任何宣稱不可辯駁的學說，從定義上來看就是不科學的。我並不是一位訓練有素的哲學家，所以對這一點就不多發揮。我能體認這一點就已經足夠了，不過，我發現波柏對這件事剖析清楚並且言之成理，正因為它說出了我心中存在已久的感覺，我就欣然接受了波柏的哲學。

此後，我一直和波柏保持連絡，雖然在維也納時我們彼此並不相識，不過最後終於成為很好的朋友。雖然我並不常唯其馬首是瞻，不過大致上我和他總是所見略同。波柏有他自己有趣的闡述，大致說來，在哲學層面，我對他的認同勝過任何其他人。

※ ※ ※

問者6：維也納思想中自由的感覺有多濃？您可不可以把思想的自由，和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和華格納(Richard Wagner)等等這些人的音樂藉著維也納而發揚光大之間加以比較？是不是可以作這樣的比較呢？

海耶克：我並不特別認為有自由的感覺。我可以說，在大學裡，決定性的一點不過是不要把自己劃地自限於自己的科目裡。我和其他人聆聽其他領域演講的時間，和我花在經濟學上的時間大概是一樣多。名義上我是在學法律，不過還是有時間，或是我自己找時間。從早晨到傍晚我都待在大學裡，但是研習的科目則不一定，並且隨時準備去聽藝術史，或是古希臘戲劇，或是其他的演講。奇怪的是，在戰時，心理學竟然有人亡聲息之嘆。曾經有兩位卓越的心理學家因參戰而死，當時還有一位史托爾正痛苦地與死神掙扎，卻仍每天授課，你可以看得出這位原本是才華出眾的人，現在為說出一個字而用盡氣力。但他是那麼的有意思足以吸引我，且其對別人也如是。

之所以有上述的際遇，實因有一段時間大學裡擠滿了從戰場解甲的退伍軍人。學生人數大概是平常的三倍，其中十有九人都想儘快拿到學位。但是其中有些人就像我一樣，在同樣短的時間內，不僅拿到法學的一流學位，而且還學了五、六門其他科目。大學歡迎這種作法，從來也不用考試。

我也參加了無數無權出席的演講。我在大學裡四處遨翔，試著考驗別人。我會去找比方像有名的卡默勒(Paul Kammerer)——也許你記得這個名字，科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曾經寫過一本有關他的書。正是這位先生相信他能證明後天的特徵可以遺傳，因此名噪一時。也有一些非常原創性的人物。同時在大學時，除了專業的教職員外，有一群得到演講許可的靠校講師，他們有自己的想法，完全不屬於體制內的課程，為了說服學生接受他們的想法而進入校園。因此，1920年代，我們在維也納大學所擁有的多樣性是無限的。

問者6：聽起來很像是馬克思時代的柏林大學(University of Berlin)。相同的咖啡屋氣氛，有才華的年輕人懷著各自的信仰進進出出。當然，我猜他們的情況是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擁有無與倫比的影響力，就像你們那時候的馬赫一樣。

海耶克：也許是吧！另一個話題我要說的是，我原本所熟悉的和現在維也納大學的對比是這麼強烈，使我避免前往維也納。維也納在其他各方面都已經回復了原本的美麗。經濟上能夠繁榮也是很好的。但我記憶中的維也納是窮得可以，而那種對知識追求的狂熱則令人神往。當時主講者絕對是第一流人才。每一位授課老師幾乎都是有智慧的，

而且可能都對自己的領域有所貢獻。其實，為了要有學生，他們也不得不如此。如果有誰不夠格，就不會有學生了。

問者6：中世紀前這種情形確實存在，之後我沒聽說過有這樣的大學。你要表達的是說，課堂上的講課內容真的言之有物。學生們去聽課真的是因為講得好。我想到像你這樣四處遊走的人，是不是很常見？

海耶克：我們有一小群人這麼做，非常少的一群人。但我絕對不是孑然一身。我有些朋友曾嘗試聽點別的，會和我討論，就會告訴我去聽這和聽那是值得的，因為他們體驗過了，就和我做的方式一樣。

問者6：讓我回到原來的問題。當時維也納所發生的事和整個開放的大環境——如果說是開放的話，不過我猜想一定有過——和大學裡面新生事物有沒有關係，因為聽起來大學像是另一個在思潮分享上有同樣重要地位的實驗場所？

海耶克：大學本身自成一個世界。大學裡面，至少在法律系的教職員中常常與有組織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展開非常激烈的政治辯論。實際上，就連我，在1918至1921年間，當我還是一名學生時，也和朋友組織一個德國民主黨(German Democratic party)，以求在天主教和社會主義份子及共產主義份子之間能有個中間團體。而自此以後我就再不隸屬於任一政黨。

儘管如此，我確實比正式修業年限提早一年完成了法學課程，因為我有退伍軍人學分，也就是說我可以用較短的時間來完成學業，而我用心做到了。即使有併發症——那是我在戰場感染相當嚴重的瘧疾——

致使我的健康情況不是頂好。但是，每隔一天的晚上，因為高燒必須留在家裡並沒有影響到其餘的時間。

這個時期我所聽過有關經濟學課程和閱讀過的書籍，我有相當詳細的資料。在我到維也納大學唸書的時候，法學方面的教職員非常卓越，但在經濟學方面當時幾乎沒有什麼代表人物。在執業律師中也有些了不起的學者，如烏拉薩克(Moriz Wlassak)精於羅馬法；而史圖斯(Karl Stooss)則專於刑法；還有一些卓越的講師，像伯納齊克(Bernatzik)(我上大學的第一年修了他政治學旁徵博引的導論，卻在課上了一半時他竟然過世)；還有非常特別的老師像是皮斯科(Oskar Pisko)(商事法)和萊夫勒(Alexander Loeffler)(刑法)。

過了幾個月，曾經當過奧地利帝國最後一任商業部長的威澤再度被任命爲經濟學講座教授，不過我和他較密切的接觸是在大學的最後一年，和我得到學位之後的那一年。那時候，有一位叫史潘(Othmar Spann)較爲年輕的人，大約在同時被指派爲政治經濟學的第二講座教授。因爲他的熱情、不同凡俗，和對學生個別活動的興趣，一下子成功地吸引了學生，他發揮強烈卻短暫的影響。

我想我並沒有從史潘那裡學到多少東西，肯定不是在我第一次選修的討論課。這門討論課是有關方法論，其中大部分是我無法了解的，而且我想其他選修的人也聽不懂。不過，他確實讓我讀了一些好書，特別是孟格的著作，當時他並沒有像後來那樣強烈反對孟格的看法，而且從他的《政治經濟學之基礎》(*Fundament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我也得到少許有關經濟學手段–目的架構(means-ends structure)邏

輯之重要性的啓發。我們在一起的時間並不久，曾經有一小段時間，我被認爲是他的得意門生之一，後來他說我時常吹毛求疵的批評會混淆比較年輕的學員，所以實際上我是被踢出他的討論課。

問者6：我第一個問題是有關孟格的，他不想出書，但是在思想上卻有巨大的影響。到底孟格作為一位教師或一個人，有什麼特色使得他即使甚少撰述，也能使思想遠播？

海耶克：這個問題我也常拿來問自己。我不太認識孟格，我只見過他一次，那時候他已經接近八十高齡，早就退休了，正在參加一次學術遊行，這故事有趣的部分是，後來我寫了一篇有關他的傳記論文，編輯了他的作品，其中只有一句是根據我自己的經驗，而這也是唯一的錯誤。因為他是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所以我把他描述成一位高大的人，但是後來每一個人都告訴我說錯了。他其實只有中等身材，他給我的印象是如此的深刻，居然在看過他之後還把他寫成是個高大的人！

他下課後，有一小群非常聰明的人，這些成員都是他以前的學生而且已經位居要津，定期在一間咖啡屋聚會：所謂「孟格圈」(Menger circle)。這般力量支配了十九世紀最後的三十年。孟格於1903年退休，因此在二十世紀開始時，影響力就所剩無幾了。一次大戰時，他的學生中最有力的人物龐巴衛克(Eugen von Böhm-Bawerk)，和偉大的教科書講解者菲力波維奇(Eugen von Philippsberg Philippovich)也都過世了。實際上還有第三號人物，即後來成為我老師的威澤也暫時離開大學。因此，我在1918年從戰場回來後，三位偉大的教師都已經沒有在教書

了。事實上經濟系暫時當家的是，後來創立有名的馬克思–佛洛伊德派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Frankfurt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屬於社會主義份子的經濟史學者——夠滑稽的了。不過，後來威澤回來了。

問者6：那人是誰？

海耶克：他名叫格倫伯格(Karl Grünberg)。往後法蘭克福研究所的人都是十九世紀馬克思–佛洛伊德傳統的代表性人物。格倫伯格本人是位經濟史學者，他傾向於以學者從政方式來處理事情。於是該研究所就成為一個非常政治性的研究所。但這點完全打動不了我們。接下來就是威澤，他重返校園並成了我的老師。

問者6：學生們會不會和資深教授在喝咖啡時聚會？

海耶克：有一種情況是我很清楚的，如果學生有問題要問教授的話，那麼早晨的課會來。學校對街的咖啡店雖然實在，但對學生而言，去那裡似乎太奢侈了，因為在維也納的咖啡屋，你只要付一杯咖啡的錢就可以消磨一整天，這對消費層次比一般學生稍微高一點的知識份子而言極具吸引力，而大學裡的學生咖啡仍比這便宜。但是教授在講完課後，會喝著自己的咖啡，接待其他人。

我在想，不過不確定，孟格和我認識那些較年輕的一輩一樣，也在蘭曼咖啡店(Kaffee Landmann)和人們聚會，不過就孟格的情形來說，重要的是，來聚會的不是現在教的學生，而是以前的學生，他們定期聚會形成一個討論政治的圈子。雖然孟格在當代的奧國政治圈並不活躍，但對奧國政治的幕後和十九世紀自由派人士的智識內心之影響，

卻是非常重要的。而他在1870年代所教的學生中，已擔任政府高階公職的人士，在1890年代和二十世紀初，每星期一次定期地來和孟格聊一聊。

問者6：龐巴衛克的討論課怎麼樣？我們來談一談吧。

海耶克：這完全是兩碼子事。那是學術發展的中心。從這點你就可以看龐巴衛克和威澤是全然不同的人物。妙得很，他們兩個完完全全是同時代的人，同時唸書，同時在大學裡面教書，有連襟的關係，研究題目也相同，而且也一起上日耳曼大學，但是卻有著完全不同的科學態度。我曾經寫過一篇論文題目為〈兩種心靈〉(Two Types of Mind)，部分靈感即是來自這種對比。龐巴衛克在自己的學科上是絕對的大師，他知道一切事情的答案，所有以前曾討論過的事情，他都了然於胸。

問者6：而威澤則令人難以捉摸。

海耶克：為了避免某些麻煩，他有以簡馭繁的傾向。威澤是位慢條斯理、深思熟慮的人。對他而言，沒有什麼事情是簡單的，事情都是困難得不得了，而且他討厭就任何事情討論不休，因為他馬上就要有答案。他喜歡想些別的事情。

問者6：我們很少聽說有什麼威澤的學生，但是常常聽到龐巴衛克的學生。有什麼原因嗎？

海耶克：是的。他們討論課的風格全然不同，龐巴衛克的討論課令人興致非常高昂。除了他自己那個學派主要的原創性思想家外，他還跟

那時候許多社會主義份子，比方說鮑爾(Otto Bauer)展開激烈的討論。龐巴衛克討論課上所討論的，正是整個大學所討論的主題。威澤的討論課則相當平和安靜，只討論一個定義清楚的理論問題，有一份精心準備的論文，並逐點討論，其內容和任何時事話題都不相干。龐巴衛克的討論課在第一次大戰之前就結束了，他在1914或1915年過世。我只知道威澤的討論課，從理論的觀點來看是很有趣的，但是沒有什麼令人興奮之處。

問者6：這兩位的討論課您都上過？

海耶克：龐巴衛克過世時我才十六歲。我認識龐巴衛克是一種機緣，因為他是我外祖父的朋友，在1880年代同在茵斯布魯克(Innsbruck)教書。實際上，也許你會感到很有趣的是，他們常一起去爬山，在1880年代還可能一起攀爬一些沒人去過的高峰。在外祖父過世之前，我常到龐巴衛克家中看他，那時候我還不知道「經濟學」這個字是什麼意思。他只是我父母和祖父母的一位好朋友。後來我常去看他的遺孀，她是我母親的朋友，母親叫她「阿姨」，因為她們在薩爾茲堡曾共處多年。

※　※　※

問者5：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給您的最大影響是什麼？

海耶克：我直接受業於威澤，因此他最初對我有最大的影響。我在拿到學位之後才認識米塞斯。當時我還不了解，不過現在我意識到決定性的影響就是讀了孟格的《經濟學原理》。也許使我收穫更多的不只是《經濟學原理》，還有《方法論叢書》(*Methodenbuch*)，倒不是

因爲這本書中有關方法論的論點，而是有關一般社會學的討論。其中對體系之自發性創造這個概念的闡述，遠比我所知道的其他著作要好。

差不多是我剛開始上大學的時候，我接觸了一群同儕，他們是屬於維也納猶太知識份子中的精英，而且在閱讀素養(literary education)和一般的成熟度方面都超越我許多，他們對我的影響真是再怎麼高估也不爲過。我第一次興起了一種野心，想要與他們的成就相競爭，而這種想法開始對我的學習產生了一些影響，而且因爲當時我的興趣要比他們的來得廣泛，因此我極力做比他們更多的研習，同時在法學和經濟學的研習上，也不落在他們之後，並且在幾個不同的討論課上被公認爲前五、六名傑出成員之一。最後我不僅彌補了失學的那一年，甚至比我最親近的同伴早幾個星期拿到博士學位，這次小小的勝利讓我對只要自己認真想做就一定做得到增添信心。

比起我實際在大學那幾年所學的，也許畢業後那段時期，我從以下這群人受益要來得更多，當時，在其中一位的建議下，我們持續性的每兩個禮拜聚在一起討論，這個人就是菲爾特(J. Herbert von Fürth)，我和他的交往要比和任何其他人來得密切。其他的成員差不多全是律師，對哲學、歷史和文學有著強烈的興趣，而現在他們幾乎全在美國。閔茲(Max Mintz)、佛格林(Erik Vögelin)、舒茨(Alfred Schutz)、佛羅利希(Walter Fröhlich)、考夫曼，還有後來加入的哈伯勒、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馬哈祿普(Fritz Machlup)和恩格爾─雅諾西(Friedrich Engel-Janosi)。當我第一次獲准加入這個圈子時，同一批人我相信早就參加米塞斯的私人研討會，而這是另一項重要的激勵來源。

那時期我從這些猶太血統或部分猶太血統的朋友得到的好處尚不止此，他們比我自己的圈子更具有國際性，至少他們對發生在英法知識界的事物，了解得與發生在德語系世界的事情一樣透。和他們的交往中，我聽到許多對我而言是相當新的名字，像是羅素(Bertrand Russell)，或是偉爾斯(H. G. Wells)，普魯斯特或是克羅思(Benedetto Croce)。要想參與一般的對話，必須熟悉這些人名和其思維。我的朋友當然大部分屬進步的知識份子，他們傾向社會主義，但都有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的背景。他們既富企圖心又有能力，毫不例外的都從大學預科學校那裡儲備了較我爲多的一般知識，而且還掌握了外語能力，並且對於藝術和文學至少有概略的認識，而這些我只有嫉妒的份。我從他們那裡學到最多的可能是認清一個事實：對精神事物的真誠投入，並不表示對生活上的謀生技能一竅不通；在某一方面有特殊天賦，不能作爲不需學習以善加利用此天賦的藉口；而忽視機遇的結果猶如另一型的懶惰；還有，對某些必要工作的存心輕視，猶如另一種無能以造就自己成爲有用之人。雖然大致說來這些人出身的家庭背景要比我家富裕，而且無疑地，爲了應付他們所遭遇的偏見，他們緊密結合在一起。甚至在這樣的偏見下，他們必須比與其能力相當、且出身良好的基督教徒，要克服更多的障礙。因爲基督徒在維也納處處有機會。

問者6：是不是因為反猶太情結，使米塞斯無法獲得教授的職位？

海耶克：這一點請務必要非常小心，因為會引起非常敏感的問題，但是一般認為，而且米塞斯自己也承認，他終身沒有謀得教授職位，是因為反猶太情結。其實，我懷疑事情沒有這麼簡單，因為法律系的教

職員有一半是猶太人，為什麼米塞斯沒有獲得教授職位，是個很特別的問題，這個問題的答案我以前從來沒有說過，不過我現在告訴你，猶太人要獲得教授職位必須有猶太同胞的支持。任何其他有足夠聲望的猶太人也必須如此，因為只有被點名的猶太人才能得到教授職位。但是，那時候在教書的猶太人都是社會主義份子，而米塞斯是反社會主義的，因此沒有辦法得到他自己同胞的支持。因此，他沒有得到教授職位的原因倒不是反猶太情結，而是因為他那些猶太同事們不喜歡他。這真是個很滑稽的事情，我原本不太想說出來，因為這種事你沒辦法證明，不過我相當確定事情是這樣沒錯。

但是不了解猶太人的問題，就無法了解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維也納。這不單純是基督徒和猶太人之間的問題，而是該兩個群體間人數龐大的一個中介團體所面對的問題。這個中介團體有一部分是受洗的猶太人，另一部分是和猶太人交朋友的基督徒，純基督徒團體和混合團體之間有密切的接觸，混合團體和猶太團體之間也有密切的接觸，但兩個極端團體則不盡然。我是最近在被問及當時的維也納我所認識的偉大人物有哪些時，才察覺到這點的。譬如說，施羅丁格(Erwin Schrödinger)，是的，沒錯；維根斯坦，是的，沒錯等等。然後，他提到佛洛伊德，而我幾乎不可能認識佛洛伊德。為什麼？因為他屬於真正的猶太團體，而這是超出我交往的範圍。在混合團體中，我有很多知交，我也定期參加這種團體的聚會，但不可能與純粹猶太團體的人會面，因此有人說因為我是維也納人，我理應認識佛洛伊德，我覺得很荒謬。

問者6：佛洛伊德本身不是當了好多年的靠校講師嗎？他有沒有在大學

裡擔任過教職？

海耶克：沒有。米塞斯和佛洛伊德都冠有「教授」的頭銜，不過，這純粹是個頭銜。他們是靠校講師，亦即有教書的許可，於是被稱為「教授」，但是從來沒有從大學領過一分錢。

問者6：可不可以和我們說說您和貴表弟維根斯坦的關係？

海耶克：我不能說我很了解，不過，當然我比現時［指1983年］任何其他還活著的人，認識他的時間要長得多。我第一個回憶可回溯到有一天從前線放假，在奧地利的巴德伊始(Bad Ischl)火車站，兩名穿著制服的砲兵少尉彼此打量，然後說：「你看起來很面善。」於是我們彼此互問：「你不是維根斯坦家的人嗎？」「你不是海耶克家的人嗎？」當時不知道，現在我可知道，那時他要返回前線時，背包裡一定裝了《邏輯哲學論》(*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的手稿。那一夜，從巴德伊始到茵斯布魯克這段路的相處，他對半醉返鄉年輕軍官的大事喧嘩頗為不屑，對這個世界也透露某種程度的輕蔑，已經顯露出其本人許多的心理特徵。

後來，我有好長一段時間沒有見過他，不過，有關他的事情倒聽了不少，因為他的大姐是我母親的知交。她們是遠房表親，她常常來我們家。有關這位狂妄年輕人的傳聞不斷，但她極力為維根斯坦辯護。那就是我如何聽到他的消息的途徑。

過了很久，我在劍橋(Cambridge)才比較認識他。戰前，我曾經在劍橋見過他，戰爭末期他回來時我們又見了面，但當時我們從來沒有真正談過哲學。我對他的人格印象非常深刻。我最後一次和他討論的

主題是有關政治的。我們兩個都從維也納回來，但是我在巴斯里(Basle)中斷旅程，在半夜踏進一輛有臥舖的火車，結果車廂裡的同伴是維根斯坦。一等到他看完偵探故事後，第二天早晨的前半段，我們先是談到維也納和在維也納的俄國人，由此引到哲學和倫理問題，他對於當時所見到的俄國人極感失望。正說到興頭，我們到了渡船口。雖然他說：「我們一定要再談下去」，不過顯然後悔自己這麼說，因為我在船上找不到他，而且從此再也沒有見過他。

維根斯坦有四分之三的猶太血統，但是，他們家族正如你所知道的一般情形那樣，在維也納社會已有穩定的基礎。維也納的猶太問題變得尖銳起來，是因為從波蘭移民的結果。維也納原有早已安家落戶的猶太族群，部分是當地土生土長的，部分是來自匈牙利或波希米(Bohemia)，且已被接受和認同的。強烈的反猶太情緒是在非常低層貧窮的波蘭猶太人移進來之後才爆發的，有些是在戰前就已移入，有些則是在戰時因逃避俄國人而流入。維也納到處充斥前所未見的另一型猶太人，他們戴著小帽、蓄著長鬚，這些形象我們以前連見都沒有見過。反猶太情緒就是針對他們而發展出來的。

問者6：這是不是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

海耶克：大戰期間當他們移入時還平靜無波，反猶太情緒是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才發展起來的，但移民始於第一次大戰期間。

問者6：所以您認為自己屬於這個混合團體……

海耶克：我們家可不屬，我們家是在純基督徒團體這一邊。而我是在

大學時進入混合團體。我必須坦承，我對猶太朋友有幾件事情很不滿。最糟的是我不准談猶太人的事情，他們總是不讓我說，「像他有猶太腔嗎？」這樣的主題也常拿來討論，如果我有所置喙，就會遭到他們厭惡。

我們家有沒有猶太血統，在維也納的猶太社區一直引起相當多的猜測。有一件事我感到很有趣：我的弟弟海因茨(Heinz)比我擁有一付怎麼看都不像猶太人的容顏，而且頭髮顏色很深，實際上是黑頭髮。有一年夏天，我到許瓦茲瓦爾特(Eugenie Schwarzwald)他們家的避暑山莊度假。當我弟弟到達時，我剛好聽到猶太圈裡有人在說他像猶太人。

我自己對這點的好奇心，使我花了很多時間在研究我的祖先。我擁有父母各房五代的詳細資料。而且因為他們剛好都是家裡的頭胎，更能確定他們是父母所出，因此，在我力所能及的追溯之下，實在找不出有猶太祖先的證據。

我本應主修法律，而經濟學只屬(博士課程)期末考三項主要考試的一科。我不僅以優異的成績通過了大部分的考試，而且也(沾了學校對退伍軍人特別優惠的光)成功地在三年之後(1921年11月)而非正常的四年取得學位，但我的興趣一直是同時放在心理學和經濟學上，後來才專攻經濟學。

但是，我要先說一點，我對生理心理學的問題那種短暫但強烈的關注，在1919和1920年間，這方面的興趣占據了我相當多的精力。這主要是由於我對馬赫著作的興趣所引起的。馬赫的學說在我父輩那一代風行一時。正是因爲讀了他的哲學著作，我在1920年想以一篇短文試著說明我的感想，但功虧一簣，後來過了三十二年才在《感官秩序》發表。

當時我必須自己摸索心理學上的知識，因爲教師中唯一一位對這類問題有全面興趣的人，哲學家史托爾(一位相當有意思的人)，已行將就木，而且很難見得到。他和德國哲學家里爾(Alois Riehl)——我對他的論述印象深刻，而且曾經把早期一篇論文稿寄給他——給了我足夠的鼓勵，使我能夠努力不懈。1920年9月，因爲我必須開始爲主要的法學考試作系統的研讀，於是擱下上述那篇論文的草稿，當時我想這只是暫時的，但是一直到1946年前後，我才又認真地思考這些問題。

嚴格說來，我只花了一個學年(1920-21)密集研讀現代法律，雖然這也在我腦中留了印象，但我現在還記得的法學知識，則要歸功於三個學期的法學史，特別是羅馬法，這要比那一年爲了考試而採塡鴨式的學習強得多，考試一通過，我又回到經濟學，在這方面我投注了專業領域之暇的精力，即使在期末考前也不例外。

我涉入經濟理論決定性的一步可能是有一次，在大學第一年間，有人把我引介進入提倡單一稅制的團體［土地改革者(Bodenreformers)］——喬治學派(Henry George school)的德國版，由一位名叫戴馬士卑〔Adolf Damaschke〕的人所領導——我被說服爲他們讀一篇討論李嘉圖地租理論的論文，這個機會使我了解到經濟學是怎麼一回事。我馬上被地租理論所吸引，但是對單一稅制的熱情卻很快就結束了。我記不得當時對單一稅看出什麼破綻，因爲即使時至今日依我看來，這還是所有社會主義提案中最經得起理論推敲的，之所以行不通，只是因爲要實際將土地的原始和永久產能，以及不同的改進方案區隔開來，是不可能的。

在我上大學的三年期間(除了在慕尼黑待過幾天外)，我有兩次到外國作客的機會：1919至1920年冬(維也納大學因爲缺乏供取暖用的燃料而關閉)到蘇黎士大約六至八星期，以及1920年8月底9月初住在挪威的一處莊園(在內陸，靠近米厚生〔Mjösen〕湖的哈馬〔Hamar〕)三或四星期。這兩次之所以能成行，是得自我父親在植物學界朋友之邀請，這是他們爲營養不良的德國和奧國孩子盡份心力的一部分工作，他們對故舊這個剛從戰場歸來，不僅需要一些養分茁壯成長，而且飽受瘧疾之苦的兒子，施以援手(事實上，挪威之旅似乎治癒了我的瘧疾)。

蘇黎士之行對我的智識增長相當重要。除了佛萊能(Fritz Fleiner)有關教會法的課程(我所聽過最棒的大學課程)，我在蘇黎士大學旁聽的課程中，對我影響最爲深遠的是，有一位年輕講師花了相當的時間在討論一本新書《知識論》(*Erkenntnislehre*)。這本書的作者因講師的瑞士發音使我以爲是「莫里史利克」(Moritschlick)，因此我找了一陣子都找不到他的著作。不過在我回到維也納之後，我很快就發現，這位作者其實就是新任命的哲學教授莫里茨・施利克。施利克是讓我相信哲學也能言之有物的第一人，以前我只有在馬赫的著作中隱約看出。我在腦部解剖學家馮・莫納科的實驗室工作了好幾個星期，從人腦不同的部位追蹤纖維管束。此外，1919至1920年的黎蘇士，還讓我首次體驗戰後的「正常」社會是個什麼樣子，當時的維也納正陷於通貨膨脹和半饑餓的苦難中。

我之所以趕著拿到學位，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希望在工作之前，再花一年的時間到一所德國大學作研究。我在義大利作戰那一年，韋伯(Max Weber)任教於維也納，第二年我回來之後，大學裡到處都在談論這位偉大的人物。事實上，父親本有條件應允我在維也納得到學位

之後，可以到慕尼黑去一年。然而，在這個時刻到來之前韋伯就過世了，而且奧地利的通貨膨脹到了後期，也使得我父親完全無法支付我在德國研究一年的費用。結果，過了長長一個暑假之後，我在1921年開始找工作，緊接著我通過期末考，並在學位授予之前，我在1921年10月底，就到威澤推薦的政府部門工作，米塞斯正是這個部門的負責人之一。這個部門是個臨時性的機構，旨在執行和平條約的特定財務條款，名為「會計署」。

進入會計署工作之後，我繼續在大學裡註冊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doctor rerum politicarum)，在1922年夏天，開始撰寫有關毀謗理論(theory of imputation)的論文，據此於1923年的2月或3月，也就在前往美國之前，獲得我的第二個學位。雖然我在進行價值的毀謗(Zurech-nung; imputation of value)之研究和撰寫論文中學得很多，而且問世後也頗受好評，我仍希望這份論文一本也沒有留下。(論文只有少許打字複本，維也納大學圖書館理應有一本可供民眾閱覽，不過我獲告知遍尋不著。)

我早期的美國行是從1923年3月到1924年5月，是遠在洛克斐勒及類似獎學金提供給中歐學生之前，我自冒風險前往的。我心裡想，對經濟學者而言，認識美國是不可或缺的，而這個機會在1922年春，我在維也納遇見紐約大學的詹克斯(Jeremiah W. Jenks)教授時出現。我把自己的希望告訴他之後，他表示正計畫在第二年寫一本有關中歐的書，如果我到紐約，他可以僱我當幾個月的研究助理。

就在1922年夏通貨膨脹已近尾聲和1923年初之間，我想盡辦法湊足到紐約的單程機票錢，而到達紐約時口袋裡剩下二十多塊美元。結

果卻發現詹克斯教授去度假了，而且留了話說不想被打擾。我把熊彼得(時任俾得曼銀行〔Biederman Bank〕的總裁，不久就卸任，我曾為求職之事找過他)給我的介紹信呈給幾位經濟學家，卻得不到任何一個機會，於是我開始帶著持續下跌的希望在找工作。

由於我會的英語很有限，而且當時的商業已明顯蕭條，前景頗不樂觀。兩個星期之後，我的盤纏幾乎用罄之際，我終於在第六街的一家餐廳找到一份洗碗的工作，不過我實際上並沒有開始上工，因為就在我要去上工的前一小時，一通電話打了進來說詹克斯教授回來了，而且準備僱用我。我大概為他工作了六個月，月薪是一百美元，六十元作生活開銷，這段時期省下來的錢讓我口袋裡有足夠回歐洲的旅費。之後，詹克斯為我在紐約大學找到一份微薄的補助金，大概只能支付學雜費，不過我靠了這筆錢卻又過了九個月(住在基督教青年會〔Y.M.C.A.〕)。

雖然我在紐約大學正式註冊，而且在馬吉(James D. Magee)的指導下開始寫一篇博士論文，我卻在哥倫比亞大學聽了好多霸王課，特別是米契爾經濟史的課，以及約翰・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所主持的最後一次討論課。我在這個討論課上讀了他最後的一篇論文。

我在紐約的前六個月，一邊在紐約市立圖書館(New York Public Library)為詹克斯工作，一邊利用餘暇把我在維也納所寫論價值的毀謗這篇論文改寫成威澤答應過我可以發表在《政治科學簡明字典》(*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的文章，不過，最後卻出現在康拉德(Conrad)的《年鑑》(*Jahrbücher*)。整體說來，我對前幾年在維也納時占據我大部分時間的課題感到有些厭倦，比方說主觀價值理論或社

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計算問題；而我正在尋找一個適於利用我赴美之便而進行的論述性課題。(在純理論方面，我發現美國大學有些令人失望，但在新發展出來的經濟時間序列〔economic time series〕之統計技巧方面，對我是全新的概念以致收穫良多。)我很快地開始蒐集資料，準備在我返回維也納之後寫一本有關聯邦儲備制度(Federal Reserve System)之發展的書，但是結果只寫出了一篇分成好幾部分論最近美國貨幣政策的文章，刊登在《經濟學期刊》(*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並作了一次有關聯邦儲備制度的演講，後來刊登於《奧匈經濟學人》(*Österreichische Volkswirt*)〔〈論1920年以來美國克服危機的貨幣政策〉(Die Währungspolitik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seit der Überwindung der Krise von 1920)和〈論1914年以來美國銀行本質之改革〉(Das amerikanische Bankwesen seit der Reform von 1914)〕。

在我結束詹克斯給我的工作和用完他替我在紐約大學所爭取到的獎學金之後，我爲索普(Willard Thorp)工作了一段時間，幫他的《商業年報》(*Business Annals*)，蒐集中歐(德國、奧地利和義大利)的資料，無論是在產業變動的史實，或是利用圖書館資源方面，這份工作都惠我良多。索普和貝克哈特(Benjamin H. Beckhart)(後者在紐約市立圖書館的經濟研究室與我共用一張桌子，寫他關於聯邦儲備制度貼現政策的書)成爲我最常往來的夥伴，或者說我見得比較多的少數幾個人，經由他倆，我和其他年輕的經濟學者有了些接觸。

我原本想借助洛克菲勒獎學金在美國多待一年，因爲威澤已推薦我成爲該獎學金在奧地利的第一位候選人。但是獲獎的通知在我開始返維也納之後幾小時才送達紐約，當時錢囊羞澀，已經不允許我再待下去。在我返達維也納之後，通知也到了。但是考慮我的工作，我當

時不願意，也無法立即接受這項獎學金，並心存希望晚幾年再去。但是再訪美國尚未成真之前，我就結了婚，換了另一份工作，把我困在維也納。結果，我一直要到1945年才又重訪美國。

問者6：你可不可以回憶一下使你與米塞斯共事的環境？

海耶克：1921年我畢業的時候，維也納有一個暫時性的新機構負責執行1918年和平條約的某些條款，說得明白點，是要處理戰前各國之間的私人債務。米塞斯代表商務部，是這個新辦公室的負責人之一。這個單位對新人很有吸引力，因為一個年輕人如果學過法律，而且會講兩種外國語，在這種情況下，可以得到一份薪水相當優渥的職位。我就是這群幸運者之一，帶著威澤的推薦信找米塞斯求職(這點不在檔案記錄裡，說出來好玩)。我還可以看到米塞斯如在眼前，讀著威澤的介紹信，看著我說：「威澤說你是個很有前途的年輕經濟學者，不過我從來沒有在我的課上見過你。」他終究還是給了我這份工作，而往後的五年，除了出訪美國曾經中斷外，我一直在他屬下工作，後來我從美國帶回了大預測的新觀念，這是1920年代哈佛經濟晴雨表(Harvard economic barometer)所發展出來的事物。米塞斯幫助我在同一棟大樓裡建立一個進行這類研究的研究所。

問者6：您現在說的是哪一年的事？

海耶克：是1920年代的後半段。1920年代的前半段，我和他在前述會計署工作，確切來說從1927至1931年，也就是我去倫敦之前，我一直是這個研究所的負責人。開始的時候只有我自己和祕書，後來才逐漸

擴增，並延攬了摩根斯坦作為協同主持人，後來他繼我之後接管了這個研究所。

這個會計署負責清理一些國與國間因戰爭爆發而延宕清償的私人債務，這些債務超過五年。因為幣值變動等等因素使情形變得非常複雜。那時候我已經從美國回來；我的法文原就說得相當好，而且還會說些義大利語，這是我在戰爭時學會的。這三種外國語，加上法學和經濟學，足以讓我取得這份薪水相當不錯的工作。所謂不錯指的是相對於公職而言，因為這只是個暫時的職務，我並不是正式的公務員，而是暫時的公務員，故所領的薪水比我應拿的高得多。因此，即使我的上司不是米塞斯，這也是個相當吸引人的職位。

在此我必須對我與米塞斯的奇妙關係說幾句話，我往後從他那裡學到的，可能要比從任何其他人學到的來得多，但是以傳統的意義來看，他從來沒有當過我的老師。我想在我是個全修生時，我只去聽過他一次課，不過相當不喜歡他。我所能清楚記得的只是1921年時爲了應徵一份政府機構職位，而去拜訪該單位負責人之一的米塞斯。我身上帶了威澤一封措辭婉轉的推薦信，信中把我說成是很有前途的年輕經濟學者，我對於要拜訪的這個人只有模糊的概念，米塞斯則在全然不知道這個他在大學裡從來沒有見過的人之情況下，以禮貌性的懷疑來接待(並接受)我。

一俟我在那個單位工作之後，很快地，我們的來往就很密切，往後的八年，米塞斯無疑是我所接觸的人中使我受益最多的，不僅是在智力上的刺激，而且還有他對我事業的直接幫助。他是個最不墨守成規的臨時公務員，他旋即委我以重要的新工作使我有發揮的空間，這

種工作通常是由比較資深的人來負責。過了一年半之後[1923]，我決定前往美國深造，他不僅爲我爭取到必要的休假，而且休假的支薪條件是優厚的，我的計畫才得以實現，他就是這樣爲我排除了困難。

我回來以後參加他晚上在辦公室舉行的私人研討會，我想在我赴美之前，這個聚會已經進行好一段時間了。這在1920年代中期是維也納最重要的經濟討論中心，而且也爲改組後的國家經濟學會(Nationalökonomisch Gesellschaft; National Economics Society)提供核心份子，該學會曾中斷了好幾年，稍後我將之再度推動了起來，部分的原因是，希望能爲米塞斯及其徒眾和大學裡邁爾(Hans Mayer)那一派人之間日益增大的鴻溝建立一道溝通的橋樑。

我之所以能夠創立奧地利景氣循環研究所(Austri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Cycle Research)，也要歸功於米塞斯。我認爲他之所以有這種構想，大部分的原因是在未能爲我在他商業部本職內(負責在該部成立一個由他監督的經濟研究單位)謀得科學助理的差事後，給我提供另一發揮的空間。這個機會來得正是時候，我在1926年夏季結婚。我和我的妻子任職於會計署，但是我這種臨時公務人員的身分，無論就所得或前途而言都無法真正令人滿意。這份工作甚至不讓我有太多空閒的時間，因此也就無法像以前那樣的速度在辦公之餘同時也進行自己的研究工作。

我和米塞斯談過幾次我在美國所看到的經濟研究，興起了建立研究所的構想，於是他讓我寫出各項籌備工作的備忘錄和組織的細節，正是他去說服好幾個政府機關和貿易組織來提供資金並委由我負責。從[研究所]成立起(1927年1月1日)，米塞斯不斷給我全部必要的幫助，但是在實務運作上，卻完全放手讓我去做。

問者6：您至少看過德國的大通貨膨脹，奧地利是不是也經歷同樣的問題？

海耶克：我們在此之前有過。奧地利的通貨膨脹幾乎是在戰後馬上開始的。1921年10月，我在米塞斯手下做第一份工作時月薪是5,000舊奧幣(old kronen)。到了下個月，我必須得到三倍的錢才能靠薪水過活。到了第二年的7月，薪水漲到一個月一百萬。因此我職業生涯的前十個月是處於當時被視為龐大通膨的時期，但是兩三年後，德國的通貨膨脹實在要厲害得多。當時的貨幣居然會貶到一百萬成為微不足道的單位。改革之後，是以萬為新單位。當時算是一次非常嚴重的通貨膨脹。

德國的通膨來臨時，我們都已經了解是怎麼回事。米塞斯這位偉大的貨幣專家，是唯一教過我們通貨膨脹機制的人——當時幾乎是獨一無二的能手。那時候他還沒有出版有關社會主義的書，只有第一篇討論估算(calculation)的論文問世。順便告訴你作參考，我剛好私下裡知道，米塞斯曾經一度在抽屜裡準備好足以讓他能隨時接掌財政部的文稿，以期一旦受徵召即可穩定貨幣。不過他一直沒有獲得徵召。這是他一生中的一大失望。認清接掌財政部在政治上已不可能，他終於在進駐維也納負責財政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委員會中大展身手。他向國聯委員會建議到什麼程度，我不知道，但我認為他雖然無法正式插上手，最終的穩定是靠他的建議而達成的。

問者6：靠米塞斯的建議？

海耶克：他是維也納唯一有能力做這建議的人。

問者6：有一個也許是杜撰出來的故事說，在這次通膨當中有人問米塞斯要怎麼來停止通膨，他回答說：「十二點的時候來這棟大樓見我」。結果半夜十二點他們在印刷室見到他，那時候他們正在印鈔票。他們又說：「我們如何能制止這次通貨膨脹？」他說：「聽見機器的噪音了嗎？關掉機器。」

※ ※ ※

問者6：可以和我們談談米塞斯的研討會嗎？

海耶克：那是在學年當中，每一個月兩次在米塞斯商務部的辦公室所舉行的所謂私人研討會。

問者6：然而，這很重要。您是說，米塞斯的教學是在大學體系之外，學生們上這種高級課程拿不到學分？

海耶克：拿不到，這純粹是個討論的俱樂部。

問者6：前來參加的人裡您記得的或是聽說過的，我們可能知道的，或對我們具有重要意義的人有哪些？

海耶克：首先，在米塞斯和我中間的那一代人，並且還是龐巴衛克研討會的成員，有一個名叫斯蒂格爾，理查‧[馮‧]斯蒂格爾(Richard [von] Strigl)的人，我們都期望他能當上教授，不過卻英年早逝，另外還有一位叫作沙姆斯(Ewald Schams)。再來就是我這一代，而我可算是這一代中年紀最大的，不過也有一個年紀和我相仿的，是位女士，叫作布朗(Martha Stefanie Browne)。現在她把自己的姓採英文拼法，我在奧地利認識她的時候用的是"Braun"。我想她是我這年齡層唯一還在的成員。再有一個

同年齡的女士，雷娜・利澤(Lena Lieser)，她是銀行家協會的祕書，但已經過世好多年了。下來是哈伯勒，只比我小一歲。然後，先說最知名的人物馬哈祿普，他比我小兩歲，以及在普林斯頓的摩根斯坦；可以這麼說吧，全部加起來有二十個人，其中差不多有十二位每個月兩次定期在商務部米塞斯的本職辦公室見面，這和大學沒有任何正式的關聯。所有都是大學的校友，所討論的主要是科學方法論的問題，而不是什麼特定的問題。即使一開始的時候談的是當時非常實際具體的問題，不久就落入不同經濟派別之間的爭吵。

後來，在1930年代初期，也就是他們聚會的最後四年，這個研討會對外國學生非常具有吸引力。不過那已經是我離開以後的事了，我沒有印象，但是我知道，在最後那幾年，法國、英國、美國的學生都會出席一學期，參與這些經濟學的討論。再者，奧地利學派在奧地利的最後幾年，這個討論會不僅是該學派本身的中心，而且還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加入討論。以上大部分是我聽來的，因為早在任何性質的移民開始之前，我絕對是第一個離開維也納的人。由於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是在移民。試想如果有人在你三十二歲時請你到倫敦大學當教授，你自會接受，我從來不認為這是從奧地利出走。這只是我學術生涯中決定性的第一步。此後，是世界的局勢使我無法再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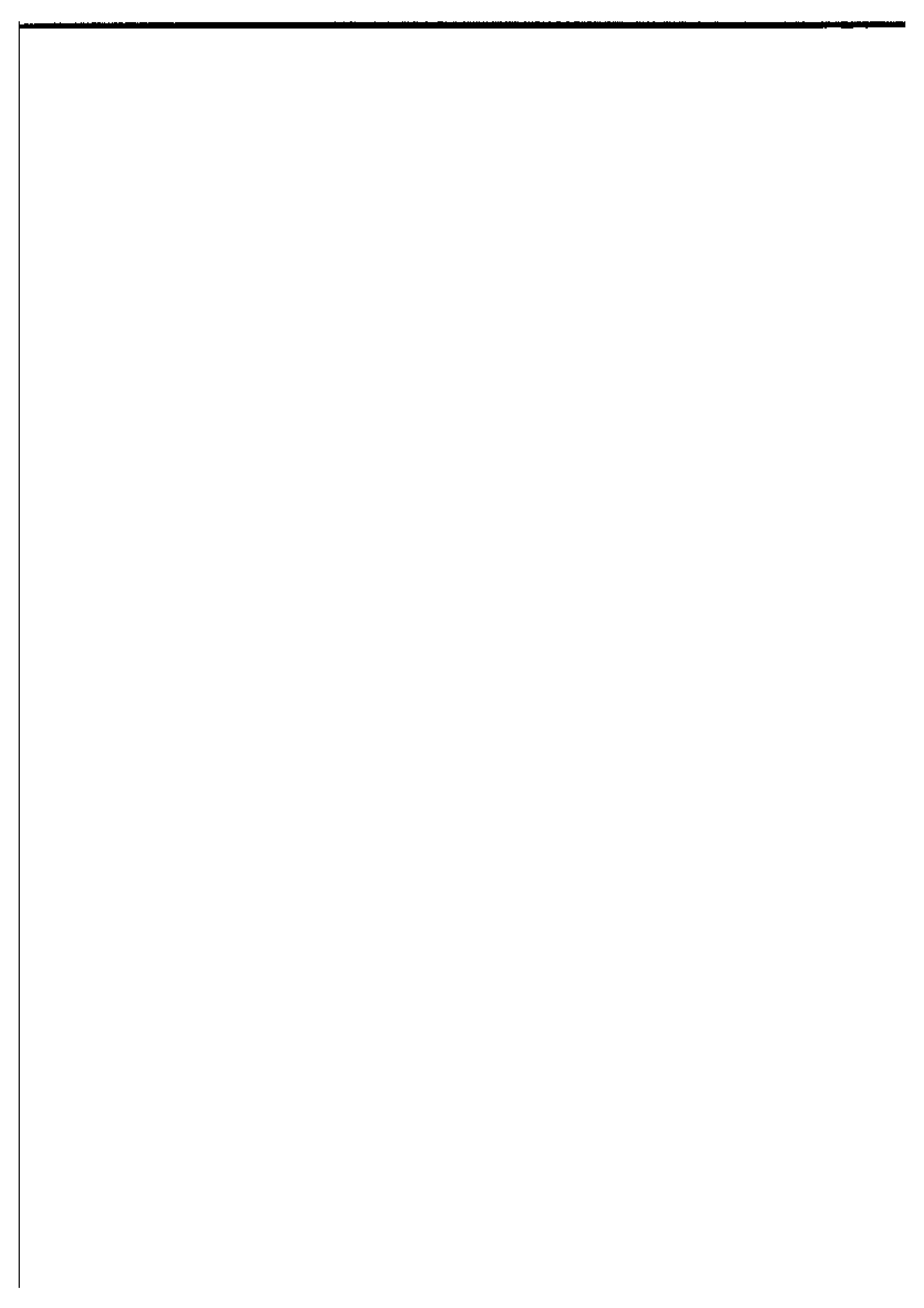
問者6：但是您對奧地利經濟學的詮釋和米塞斯的詮釋並不相同。

海耶克：讓我直接說關鍵的地方。我到現在才清楚地了解，我和米塞斯的問題出在哪裡，這是始於1937年，我有一篇論知識經濟學(economics of knowledge)的文章，該文旨在說服米塞斯其倡言市場理論是先驗的

主張是錯誤的，只有個人行動的邏輯才屬先驗，但是當你據此與許多人交流時，便進入實證的領域。說來也怪，米塞斯非常厭惡學生的任何批評，並且曾因馬哈祿普和哈伯勒批評他而暫時與他們不相往來，但是卻默默接受了我的批評，甚至還認同這篇文章，好像不曾察覺這是在批評他的觀點。這一點我無法解釋。但是我的觀點遠超過此。我想我現在甚至可以解釋為什麼，我認為米塞斯對社會主義的重點批評不是那麼中肯。因為米塞斯自己終究還是個理性功利主義者(rationalist-utilitarian)，理性功利主義和拒絕社會主義是不相容的。

資本主義假定，我們除了理性洞悉力之外，我們還擁有傳統的道德，這得經過演化的考驗，卻不是我們的智力所能設計的。我們從來沒有發明過私有財產，因爲我們了解這些結果。我們也從來沒有發明過家庭。它們之所以成爲傳統，基本上是宗教傳統，雖然我和米塞斯都屬不可知論者(agnostic)，但是我必須承認，那兩種決定性的傳統使我們得以建立能擴展我們視野的秩序。這絕非我們智力的成果，而必然是一種道德傳統的結果，現在我會說這是群體選擇而不是個人選擇的結果，這種結果是我們作事後詮釋的，但是米塞斯的主張——如果我們是完全理性的，並且決定所有的基本原則，我們就可看出社會主義是錯的——就不對。如果我們保持嚴格理性和功利的態度，則意味著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安排一切。因此，米塞斯一直未能跳出我們習以爲是的基本哲學，也就是一切事情，理性都可以比習慣做得更好。他自己一直未能從中鬆綁。由這點看來，雖然我幾乎全盤接受他對社會主義的批評，不過，現在我明白，這些批評爲何不是那麼有力，因爲以他的情形而言，批評還是建立在理性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基本錯誤上，這項錯誤就是：我們有智力理性地安排一切；而這個觀點和他的主張

有所衝突——他在一個地方說我們做不到，但是在別的地方卻又說，我們身為理性的人，所以必須嘗試去做。



第二部
倫　敦

在接獲倫敦邀聘擔任訪問教授之前不久，我曾經半開玩笑地對我的內人說，如果能規劃自己的生涯，我希望現在先以教授名義前往倫敦，幾年後再回到維也納，最初還是先當個教授，之後則希望能出任奧地利國家銀行(Nationalbank)的總裁；最後，在我作爲學者或是行政者的資歷完備之後，再以奧地利外交使節的身分重返倫敦。其中除了第一項是最不可能，但卻是唯一得以實現的願望外，其餘的計畫在當時的世局，絕對不是什麼不合理的奢望，而且會使我的生活優遊於純學術和公共事務之間，從我晚年來看，也許這會是我最感滿意的方式，雖然有時候我也曾嚮往更爲與世隔絕的純學術生活。因此，我被引入近乎純學者的生活，其實不完全是個人的性向，而且如果我一直留在奧地利的話，應該就不會有這樣的發展。但是轉到一個完全不同的環境之後，無可避免地我處世的知識遠不如我的同事，因此迫得我比在自願下更往純理論和以書爲伍的領域裡鑽。

我了解我之所以贏得原來的邀請，到倫敦經濟學院作四場經濟理論的演講，是得利於我那篇〈儲蓄的弔詭〉[1931]給羅賓斯帶來的印

象。羅賓斯當時剛被學院授予教授的職務，他和我的年紀相若，而且是我在倫敦那幾年最親近的朋友。說到接獲邀請的時機，實在是我時來運至。當時我正在構思一個有關產業變動的運行機制，遂能在首嘗興奮時刻一寫而就，但是同時也使用了一些縈繞我心頭多時對思想史(history of ideas)研究的成果。雖然我的英文尚不足以應付工作上的需要(《價格與生產》[1931]的問世得歸功於羅賓斯的大力修正)，但是演講，特別是我不照講稿說的時候，則是非常成功。演講的成功使我獲得1931-32年訪問教授的席次，緊接著我被正式任命為經濟科學與研究的圖克講座教授(Tooke Professorship of Economic Science and Studies)，從1932年起一直到1949年底，都由我擔綱。

問者6：我想要知道的是，你受邀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教授，但是為什麼米塞斯沒被邀請？他不會說英文嗎？

海耶克：1931年的時候，米塞斯還是一個相當次要且受限於特定領域的角色。這個人做了兩件事情：一是貨幣理論，一是對社會主義的批判。他那哲學論述的偉大著作，即使德文版也遲至1938年才出版，而美國版則還要等到1940年代才問世。這本書為他奠定了偉大社會哲學家的地位。但是在1930年代早期，如果說國際上有人知道米塞斯的話，也是非常有限。像羅賓斯這類人知道他對貨幣理論有卓越的貢獻，正在發展孟格的理論，而最見成效的部分則是其對社會主義的批評。

我曾經做一件別人都沒有做過的事。也就是在1923年洛克菲勒推出獎助金之前，曾自費冒險來到美國，在美國待了十五個月，結果使我可以說上一口流利的英文。這可是第一要件，卻不是全憑這一點。

不過，那倒是個先決條件。米塞斯根本不太可能花這種時間，其他的同仁顯然也沒有一位曾經這麼做。還有就是我在美國的時候，也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在批判佛斯特和卡欽斯對美國特有的消費不足之分析上，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這些名字，這種分析和後來凱因斯所提出來的非常類似。我已經花了相當多的時間，作了周全的準備來批評任何的消費不足理論。於是當凱因斯發表他的學說時，我就好整以暇地向他攻擊。

整個1920年代，我都在研究這類問題，當時我已經開始在寫一篇有關貨幣的巨著，可惜一直沒有完成，但我曾經擬以十章來探討有關貨幣理論和政策的歷史。其中，到了1920年代晚期，我已經寫了前面四章，論述1690至1900年間英國在這方面的發展。因此，當我來到倫敦的時候，我對英國貨幣理論的歷史，知道得比任何一位在地的英國教授都來得多，令大家印象非常深刻。

當我以靠校講師的身分在維也納開講時，就選擇當時在英國已引起激烈討論的消費不足理論作為主題。羅賓斯是懂德文的，居然有英國教授可以閱讀德文文獻，幾乎是個獨一無二的因素，也實在是好運氣，使他注意到我的主題：當時我們必須做的一件事——與凱因斯打筆戰。因此我就被徵召了，目的當然是要能提出有原創力的演講，能夠比別人提出更多有關英國理論歷史的知識。我受到這位被奧地利學派洗禮的羅賓斯惺惺相惜的接待，我們彼此心意相通，這一連串的事情湊在一起，使我得到倫敦的聘任，一言以蔽之就是幸運。

問者6：但令世人注意到奧地利的景氣循環理論可是《價格與生產》？

海耶克：是的，這也同樣是事出偶然。邀請函到我手上時，我才第一次對這種理論有一清楚的輪廓，但是還沒有深入到所有複雜的細節。如果我更深入擬妥周延的論文，我可能會碰到無數複雜的問題，結果寫出來的論文可能會非常難讀。收到邀請函的時候，我剛好可以很快地把我當時的見解概述一遍。

藉著我簡單的敘述，我可以把龐巴衛克的學說大幅簡化到在平均生產期(average period of production)的架構下給人一個主要的概念。平均生產期實在是一種很美妙的簡化，但是卻助益不大。後來我才注意到，單一平均生產期的問題是一個複雜的架構，如果我在1931年的時候知道這一點，我可能不會作出美妙的簡單敘述，而會讓所有人一頭霧水。因為我還沒有注意到事情的困難面，所以我的演講相當地成功，不過也不完全得力於演講本身說得好，而是這系列的專題剛好切合倫敦的情形。我從來沒有想到，倫敦的那四場演講竟會使我受聘。當然，剛開始時只是為期一年的訪問教授。但是我適應得非常好，羅賓斯和我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我們兩個合作無間，並在1931年到1940年之間，我們一直是在一起思考、在一起工作。後來恐怕他是受到凱因斯的影響了。

1931年我第一次應聘爲期一年教職，到達倫敦正好是英鎊貶值的翌日(我是在途經巴黎時得知的)，我們在漢普史特公園郊區(Hampstead Garden Suburb)(位於康斯特堡小徑〔Constable Close〕靠近羅賓斯家)租了一棟附傢俱的房子，後來也一直住在那附近，從1932年到1939年，租了一棟房子唐納小徑(Turner Close)15號；而從1939年起，則在附近8號買了一棟房子。當時有不少倫敦經濟學院的經濟學者住在公園郊區，

除了成爲我們摯友的羅賓斯家人外，還有普蘭特(Arnold Plant)，佩許(Frank Paish)，許瓦茨(George Schwarz)，和後來的米德(James Meade)。

除了偶爾有同事來訪，我們的生活非常平靜，少有社交活動。那時我們的家務還是靠打長工的女傭操作，通常僱用的是奧地利女孩，其中有一位跟我們住了好長一段時間，幾乎成了家中的一員。不過這大概就是一個教授當時的薪水(剛開始的時候是每年1,000英鎊，五年之後調爲1,250英鎊)所能維持的一切了。我們到了1936年才有車子，而我唯一放縱自己的是參加改革俱樂部，這對我非常重要，也是到目前爲止，唯一能夠歷四十年而關係維持不輟的「家」。

在倫敦的最初幾年，我的興趣主要還是集中在貨幣、資本和產業變動的理論。我主要的目標很快轉到重建資本理論的基礎，俾能將動態現象更周詳地考慮進去。我發現，如果不採納前輩用過的簡化方法，對資本理論的重建實在非常困難，於是繼續沿用，直到我覺得已了無新意，終於在1941年出版了其實只是計畫中的一小部分，此即《純粹資本理論》，所用的托辭是要不然戰爭可能會使著作的完成遙遙無期。但是我卻從來沒有真正地開始從事我原本想要進行的貨幣或動態之連續性的研究。雖然我非常努力想要對這個題目作更深入的探討，但是我的興趣又開始轉到別的課題上了。

1935年，正當我在編輯一些社會主義計畫的論文時，自己隨興所至對此問題寫了兩篇相當長的論文。但是我對於哲學思維和方法論的問題愈來愈感興趣，以致我愈來愈相信，某些當時政治上的歧見，終究應該回歸到這些問題上。我在這方面的思維發展中具決定性的一步，是我在1936年宣讀的〈經濟學與知識〉一文，這是一篇向倫敦經濟俱

樂部發表的候選演說。若加上一些後來一起重印於《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1948]內與此有關的論文，以回顧的角度來看，似乎是我對經濟理論最有原創力的貢獻了。

問者5：如果不介意的話，我希望轉回到你在政治理論——政治哲學——的基本立場。我希望以你自己的立場，在此問你一點知識史的東西。我們倆剛開始的時候多少都是屬於技術型經濟學者，後來才對政治哲學上的問題愈來愈感興趣。您可不可以為我們追溯一下您在這方面思想的演變？

海耶克：真要回溯可從我編輯了那本論集體主義經濟計畫的書開始，其實這原來也不過是因為我發現，有些在歐洲大陸已耳熟能詳的新觀點，竟未被英語世界知曉這個事實所引發的。主要是米塞斯和他的學派，但是也有一些巴龍(Enrico Barone)和其他人的討論，當時全然不為英語世界所知。因為我必須在這本集子中導論部分解釋歐陸在這方面的發展並作結論，這還包括翻譯。我的好奇心不僅驅使我進入政治哲學的領域，還使我進一步分析經濟學在方法論上的誤解。我認為正是這些誤解導致「總歸一句，我們在智能上可以做得比市場更好」這種天真的想法。此後我的思路大致繞著方法論來考量，這使我又回到我寫於1937年左右有關〈經濟學與知識〉那篇論文上，我想這是具決定性的事件。

問者5：那是篇很棒的論文。

海耶克：我想那是改變我前途很重要的一點。現在我會說，[這篇論

文闡述了]價格是行動指南的概念，而且必須從決定人們應該做什麼來理解——價格並非由人們過去的作為所決定的。

不過，當然，從心理層次來看，整個邊際效用分析模型的結果可能才是決定點，就像我現在對整件事情的看法：市場作為一個利用知識的系統——由於沒有任何人可以掌握全部的知識，只能透過市場情況的引導才能瞄準那些和自己素不相識者的需求——為那些沒有直接資訊的人提供設施；而這一切都濃縮在抽象的訊號裡，我們整個現代財富和生產之所以能夠興起，全得歸功於這種機制。我想這不僅是我經濟學的基礎，也是我主要的政治觀點。如果你認識到市場具某種意義的優越性，當權者所能做的工作就大為減少了，因為當權者所能使用的資訊量畢竟是非常有限，而市場所使用的資訊量遠非當權者所能比擬。

我們每年會在倫敦住上九個月或十個月，其間我主要活動的中心當然就是倫敦經濟學院。我大部分的科研工作都是早上在家中進行的，而主要的教學工作則於下午和晚上進行，通常我在上午十一點左右出家門，在學校用午餐，有時候會在俱樂部。當時學校的資深交誼廳是個相當有趣的聚會，而且一直保持某種規模，使得大部分的會員都有機會彼此熟識。在1930年代末期，這個地方總是充滿了活潑的討論，主要的內容是有關世界變動中的政治發展。雖然左派份子居多，他們和(舊有定義的)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經濟學家及律師之間的政治觀點南轅北轍，但是氣氛一直非常友善。

我相信當時的教師總數不會比一百多上多少，但是卻包含了許多偉大的天才及天賦雄辯家。除了已經提過的經濟學家(我應該再加上格

雷戈里〔Theodore E. Gregory〕，希克斯〔John Hicks〕和賓漢〔Frederic Benham〕)，還有名嘴拉斯基(Harold Laski)和布羅根(Denis Brogan)，托尼(Richard Tawney)和艾琳．鮑爾(Eileen Power)，馬里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當然還包括院長貝佛里奇爵士(Sir William Beveridge)，以及學院祕書梅爾(Janet Mair)夫人，這些都是最顯眼的會員。在前面幾年，有兩位退休的老教授肯南(Edwin Cannan)和沃拉斯(Graham Wallas)還偶爾亮相，悉尼．韋伯(Sidney Webb)也是如此(有時候貝翠麗絲．韋伯〔Beatrice Webb〕也會來)。

現在回想起來，大戰前在倫敦的那幾年似乎是我一生中智性活動最活躍、也最愜意的日子。之後，我再也沒有對理論經濟學的技巧燃起過同樣的熱情，也不曾再像與那些志同道合的第一流心靈互相切磋那樣受益良多。特別是那些名義上我和他共同負責，但實際上是由羅賓斯主導的討論會，所給我的經濟學智識比什麼都還多。

問者6：倫敦經濟學院原本是個費邊組織，怎麼會在1931年的時候，您和羅賓斯都能擔任教職？

海耶克：我想這完全是因為肯南這個人。韋伯夫婦在這方面可說是非常高尚的。他們想要一位心靈獨立的理論好手，而且深信經濟學不偏不倚的研究必然會導致社會主義，結果卻錯誤地接受了一個根本不接受［那種結論］的人。而當時主要的教授肯南，和講授貨幣銀行學的福克斯威爾(Herbert Foxwell)根本完全和費邊背道而馳……。說起來，拉斯基和我倒是有一點共通之處——那就是我們兩個都很喜歡藏書——但是除此之外，我們當然就沒有什麼相似之處了。我們意見很少能夠一

致。不要讓我開始跟你訴說倫敦經濟學院的故事，倫敦經濟學院因為有了拉斯基這位奇人遂成為很特別的場所。

問者6：可不可以說一兩個故事？

海耶克：拉斯基的問題是在病理上，即使時至今日，他的朋友們也認為他是個病態的騙子。如果你有時間，我可以跟你說一兩個我們藏書經驗的故事。你知道的，藏書家就跟漁夫一樣，不時會發現一些獨特的東西。但拉斯基的作法卻是：中午，我們和往常一樣用過午餐，在資深交誼廳碰頭，他興沖沖地跑進來說剛才在倫敦市廣場路，從一些裝著法國十八世紀十二開書籍的盒子裡，把這些書翻來翻去，發現全是談論宗教的東西。突然他發現有一本書的封底比其他的書要來得厚，拉斯基就問：「多少錢？」「每本六便士。」於是他就放了一先令，拿了兩冊，把其中一本扯開，結果掉出了四封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伏爾泰(Voltaire)之間往返的書信。這幾封信一直沒有出版。但這位仁兄做事的方式就是這樣。

問者6：會不會是他自己編的故事？

海耶克：沒錯。後來，還有兩件令人難忘的事情。為了因應可能(在1940年果然)爆發的大戰，我們1939年移遷劍橋，在倫敦大轟炸且我們尚未完全搬離之前，拉斯基和我一星期有兩晚從倫敦來到一位名叫比斯(Hugh Lancelot Beales)的同事家中去授課。第一次的情景真的是非常特殊，因為拉斯基正歷數蘇俄制度之美來取樂我們時，突然被播報的新聞給打斷了。那時候我們都在聽BBC，我想時間是七點半，傳來的是史達林–里本

托(Stalin-Ribbentrop)簽約【譯者按：里本托(Joachim von Ribbentrop)是當時德國外交部長，赴莫斯科簽署「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消息，從此之後，拉斯基卻表現得好像他這一輩子從來沒有說過布爾什維克黨人(Bolshevik)這有史以來最令人厭惡的東西一句好話似的。他好像不記得之前的二十年，他自己曾說了些什麼。但是一年後，在同一地點，大家吃過晚餐後又坐在一起聽新聞，而哈羅德【譯者按：即拉斯基】剛回過他在曼徹斯特的家，也體驗了第一次的轟炸。那時候他非常脆弱，因為有一顆炸彈掉在他的旅館附近，使他驚嚇過度。但是三個星期後，我再聽到的故事變成他住的旅館被擊中，他連人帶床從五樓掉進地窖裡。

問者6：關於倫敦學院，大部分的學生是費邊份子，還是只是想獲得學位的一般學生？1930年代到倫敦經濟學院的動機是什麼？

海耶克：你必須把教職員和學生區分開來。在教職員裡面，經濟學者這一邊及政治學者和社會學者這一邊又有很大的差別。在這兩大陣營中間還有律師、地理學者和經濟史學者。這些人要嘛持中立態度，要不可以說是最典型的非常溫和的費邊份子。像是布倫斯貝利(Bloomsbury)那群人，艾琳・鮑爾(Eileen Power)那種人就沈溺於布倫斯貝利社裡。他們都是很高尚的好人，並不是教條份子。

問者6：我不知道艾琳・鮑爾和布倫斯貝利扯在一起。

海耶克：沒錯，她剛好住在那裡，布倫斯貝利的人全是她的鄰居，她因此認識全部的成員。我想她不是積極份子，但是她跟他們都很熟。

還有一位是托尼，他當然是非常道地的費邊份子，但卻是一位你可以與之交談的人，他不是教條主義，是個非常有趣的人，我個人是喜歡托尼的。拉斯基幾乎是個笑料，我從來沒有把拉斯基當一回事，但是那時候的人們很看重他。現在，即使是他的同路人，早在他過世之前，就沒有把他當作思想家看待了。他年輕的時候一定是個非常聰明的人，但是我認識他的時候已經不是這樣了。

問者6：還有倫敦經濟學院的院長，貝佛里奇怎麼樣？

海耶克：說到貝佛里奇，他完全不知道經濟學為何物。

問者6：他大致說來是個公務員。

海耶克：是的，他是個公務員。我想他的事業在他擔任《晨間郵報》(*The Morning Post*)的主筆時最為成功。他可以根據指示，對任何題目大作文章。

問者6：我想這多少涉及牛津的導師制度，在這個制度下，學生每星期都要針對不同的主題寫一篇非常出色的論文。學生可以死記硬背，過後就忘得一乾二淨，既不會繼續思考，或對背景理論也完全興趣缺缺。

海耶克：但他可算得上是個中翹楚。我從沒有碰過有人能對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寫得如此頭頭是道。有關貝佛里奇的另一個故事是我說了許多次的，他幸好有養成一種習慣，在公開場合談論經濟問題之前，都會先請羅賓斯或是我讀一讀他的稿子。有一次，他的一篇演說實在太偏向通貨膨脹主義，於是我給他上了一課。很幸運下一篇稿子我也看

到了，文中有一句：「但是不幸的是海耶克教授發現，貨幣數量的增加會使價格揚升。」

問者6：所以知識上有缺陷的，還不只是你所寫的凱因斯而已。

海耶克：倫敦經濟學院的經濟學家，甚至連羅賓斯，似乎都沒有受古典的教育。有一次，我在總結系務會議時曾說了一句：「我們把貝佛里奇幹掉。」(Beveridge delendus est)但是我發現竟然沒有一位知道我在說什麼。這是個很有名的句子，我想故事是出自西塞羅(Cicero)。*Ceterum censeo Catonum esse delendum*。這是他對加圖(Cato)的駁辭，由於每一次在上議院演說，他慣以「因此，我認為我們必須幹掉加圖」來作結。

我以為這是大家所熟知的，因此就用這個句子來反對貝佛里奇，因為我實在是非常受不了他。因為這個人的不負責任，使得學院陷入嚴重的困境。他會以一個名義向洛克斐勒基金募錢，但是卻把錢花在別的用途上。使學院的名聲大大受損。他的熱心是短暫的，我相信他曾為了要蓋新圖書館而募了很多錢，我忘了這次是向誰募的，但他卻用這筆錢來聘請霍格本(Lancelot Hogben)到社會系任教。那是個很有名的趣聞，不過現在早就被人遺忘了。當時傳言說霍格本到的時候，倫敦經濟學院前面較低的樓面會裝置些籠子養黑猩猩來研究他們的交配行為，這可讓學生大為興奮。霍格本倒不是一個沒趣的人物，事實上，他是個很難纏的人物。

不過在我和曼海姆(Karl Mannheim)鬧翻之前，我大致和所有難纏的人物都還處得來，我甚至和拉斯基也處得不錯。直到他以為《到奴

役之路》是針對他而寫時，友情就結束了。但是因為我們都熱愛藏書，這點可是臭味相投。

不過我認為對學院真正構成危險的人物是貝佛里奇。當然，有一個很膾炙人口的傳聞說他幾乎要接管法蘭克福學院——

問者6：噢，是的，他是會幹那種事的人。我還沒有想到這層關係。

海耶克：那可是真的，事情是到了最後一分鐘才喊停的。

問者6：我知道你跟我說過制止這件事的經過，不過我沒有想到這是貝佛里奇幹的。

海耶克：你可以從羅賓斯的自傳中看到這段往事。羅賓斯直覺很好，但是他對這件事卻所知甚少；其實是合約放在貝佛里奇桌上等待簽字時，羅賓斯走了進來。謝天謝地，他並沒有容忍下來。「但是他們實在很棒。」於是他把我叫進去要我把情況告訴貝佛里奇。如果倫敦經濟學院被吞併了，那可真是一大災難。不過，他們那個很棒的圖書館倒是大誘惑。貝佛里奇就是抵擋不了這種誘惑，這使他幾乎要簽字接受。

這其實只是其中一樁。貝佛里奇行事完全無法預測。這不只是他，還有後來成為貝佛里奇夫人的那位厲害女士。你沒有聽過她？喔，如果你不曉得梅爾夫人是何許人，那可說對倫敦經濟學院一無所知。她是英籍蘇格蘭人，她的先生是個公務員，而她本人則和貝佛里奇一起在物資部(Ministry of Food)服務。後來貝佛里奇成了倫敦經濟學院的院長，把她也一起帶了去。她可真正管事。她是個粗俗但充滿精力深知

自己想要什麼的女人，她完全掌控了貝佛里奇。還有一個有趣的插曲是如此的鮮活：他們被疑有超友誼的關係。我確定沒有那回事。有一次就跟往常一樣，這個精力充沛而冷靜的女人走進資深交誼廳，對貝佛里奇不能作正確的決定感到憤怒。最後她大聲嚷嚷：「我知道他不算男人；他算不上男人。」

這對夫妻後來變得非常令人難以忍受，而且他下一步要做什麼完全無法預測，更不知道他會做出什麼讓學校丟臉的事來。有一陣子他募款的技巧非常成功，但是卻因爲沒有把錢用在原先募款的目的上反而受到質疑，倒不是說他不誠實，他是再誠實不過了，但是他的注意力會轉變，而且他覺得自己有權把錢用在當時他認爲最好的目的上。我在倫敦經濟學院的後幾年和他非常合不來，而且我很鄙夷他的這種——很難用言詞來形容，我不能說這是一種「知識份子的特質」。他是一個非常傑出的說明家。不管你給他的是什麼樣的題目，他都有辦法扯上關係。有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我剛到倫敦經濟學院的時候，貝佛里奇和他那群教授才剛出版了一本贊成自由貿易的小書。後來政府部門發生異動，貝佛里奇居然當著我的面對羅賓斯說：「現在該寫一本贊成保護的書了。」

問者6：我想他不是你討論課上的一員吧！

海耶克：不是，他對經濟學一點都不感興趣。他根本不知道經濟學爲何物。這是確確實實的。有時候我也對凱因斯有同樣的說法，但是實際上他們是不同的。凱因斯懂得自己的經濟學，而且還聰明地建構了一套理論。貝佛里奇並不具有那種特質。他是個稱職的律師，可

以把告訴他的簡報做成案例。

問者6：我知道卡爾多(Nicholas Kaldor)是你討論課的一員，而且有一陣子跟你走得很近。為什麼他會離開你而投向貝佛里奇和凱因斯？是不是有什麼緣故？

海耶克：這很難說得清楚。你知道的，我那篇《貨幣理論與貿易循環》就是他和一個非常可愛卻英年早逝的年輕女子[柯羅(Honor Minturn Croome)]共同翻譯的。他有時候會很自然地承認說早期他是屬於海耶克派的。我想是凱因斯的《論貨幣》[1930]說服他，並把他拉到另一邊去。而且他和貝佛里奇密切合作。貝佛里奇論就業的書是出於他的手筆。這是眾所皆知的事實。書裡面的經濟學純粹是卡爾多的看法。貝佛里奇是不可能寫出這樣一本書的。卡爾多承認書中有一篇文章是他寫的，但是其實整本書都是他寫的。而那篇文章貝佛里奇不願承認是他寫的原因是他根本就不懂。

問者6：貝佛里奇和卡爾多好像都靠他們所接受的凱因斯學說來從事他們的政治生涯。

海耶克：沒錯。卡爾多因此成了當時首相或是財長的政經顧問。我們總是把他們[卡爾多和巴洛格(Lord Thomas Balogh)]叫作菩薩和臭蟲(Buda and Pest)。

問者6：卡爾多是菩薩。

海耶克：有趣的是這兩個綽號菩薩和臭蟲，沒有人會弄混誰該是誰，

巴洛格是臭蟲。卡爾多胖胖的，看起來像個菩薩，而巴洛格是大家都討厭的，所以說他是臭蟲。

另一個極端人物則是希克斯。這個超級知識份子、卓越的理論家，有時候真的是非常放肆，但是有時候我也認為希克斯這麼做是說得過去的。有一次他出乎意料地對我說：「很好，我們兩個能懂。」這有一點予智予雄的味道。他承認以我的情況可跟他平起平坐，不過還不能完全跟得上他的水準。他當然是我們那時代最傑出的思想家，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他是個非常有教養、博聞強記、受過非常良好教育的人。同時他也嫻熟歷史。

※ ※ ※

問者2：你對希克斯的著作《價值和資本》(*Value and Capital*)的評價如何？

海耶克：喔，絕對說得上是他那時代一流的作品。就價值理論本身而言，到目前尚無人能出其右，而且也並沒有真正以生產的角度來加以分析，我想這是價值理論定型之作。我不認為薩繆爾遜(Paul A. Samuelson)的改良會比原來的好。我認為希克斯以替代率(rates of substitution)來分析，在那狹窄的領域中是一項確實的成就。

問者2：你會不會認為現在我們所稱的凱因斯革命其實應該叫作希克斯革命？他在使大家接受凱因斯的思想上，是不是具有影響力？

海耶克：我實在不認為希克斯是個改革份子。我想他試著讓理論有一更為人所接受的形式。不過我倒是有理由說也許應該叫作卡爾多革命，這和卡爾多這個名字涉不上關係，但這個學說是透過貝佛里奇爵士論充

分就業的那本書宣揚開來的，而這本書的執筆人是卡爾多，不是貝佛里奇，因為貝佛里奇爵士從來就沒有懂過什麼經濟學。

就在我接受了倫敦的教職，沒多久就和凱因斯辯論起來，這更加使我聲名大噪。(順帶說一下，雖然我一直不同意凱因斯的學說，而且曾經和他有過幾次激烈的辯論，我們私底下仍相敬如賓，且在許多方面我確實對他仰慕之至，而且對他這個人也非常喜歡。)羅賓斯要我在《經濟論叢》(*Economica*)上評論凱因斯的近作《論貨幣》，我長篇評論的第一部分刊於1931年8月號，剛好在我接受倫敦經濟學院的職務之前。雖然由於凱因斯很快地就完全改變了他的想法，使這篇文章派不上用場，但我仍然認為這是一篇相當切題的批評。

從已故的庇古(A. C. Pigou)教授所說的話最能看出凱因斯的立即反應，庇古在《經濟學實務》(*Economics in Practice*)說到這件事(沒有提名道姓)：「一、兩年前，一本重要的著作出版了之後，針對其中一些段落有人作了認真而詳盡的批評。作者的回答並不是反駁批評，而是對批評者幾年前寫的另一本書進行大力攻擊。踩線打保齡。這是種玉石俱焚的方法。這種事情當然是不對的。」

我在紐約大學註冊唸博士班的時候開始進行的論文(我記得我把題目訂為：「貨幣價值的穩定性是否與其功能相容？」〔Is a stabi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money compatible with its function?〕)和稍後幾年我在維也納著手的德文著作雖然都沒有完成，但在許多方面都帶動了一連串的發展。使我往後二年在某種場合所發表的著作，大部分是上述工作的副產品或其中研究所得出的部分結論。

我記得1923年底我所得到的最初幾個結論之一是：國民價格水準的穩定和匯率的穩定是相互衝突的目標。但是我還來不及將針對這個主題所寫的短文予以投稿刊登，就發現凱因斯在他的《貨幣改革的軌跡》(*Tract on Monetary Reform*)[1923]說出同樣的主張。爲了避免讓人誤認由於自己擁有原創性發現的希望落空，所以才使得我後來持續與凱因斯對立，我必須強調，當時甚至過了好長一段時間，凱因斯都是我心中的英雄之一，而且我對他這本著作特別推崇。幾年之後有一次在我早期造訪倫敦的時候遇見他，場合是在歐洲研究所召開的有關產業變動研究的會議(我想是在1929年)。那是我們第一次的文字衝突，至於我到底不同意的是貨幣理論的哪一點，我已經記不得了。剛開始的時候就像往常一樣，他想要強使我屈服，但當我起而對抗，並對自己的觀點能夠言之成理，他就開始以尊敬的態度對待我，而且此後不管他是如何地不贊同我，也都一直對我待之以禮。(對於拉斯基說凱因斯曾經把我形容爲「歐洲最傑出的糊塗蟲」〔the most distinguished muddlehead in Europe〕一事，我深表懷疑。這種說法聽起來比較像是出於拉斯基而非凱因斯之口。)

問者6：你和凱因斯第一次見面是什麼時候？

海耶克：我和他第一次見面是在1928年，我和倫敦經濟學院還沒有任何正式的接觸。我參與倫敦和劍橋經濟服務(London and Cambridge Economic Services)計畫，這是包括對倫敦和劍橋兩地景氣循環的觀察之始。

我是第一次在維也納籌辦景氣循環研究機構(Konjunkturinstituten)

的人，後來倫敦跟著效法，當然也就邀請了我。凱因斯是董事會的一員。我們隨即就利率的問題有了溫和的爭議。這是避免不了的。他一如往常，嘗試想以壓路機的姿態壓過我這個年輕人。但就在我起而辯解的那一刻——我必須感謝他給我那一刻——他就認真地看待我，此後也一直都很尊敬我。我知道對我的標準說辭是：「沒錯，他是很瘋狂，但是他的想法也相當有趣。」這也就是他對我的看法。

後來，我們還有許多其他共同的興趣。讓我來告訴你主要的一個故事，這件事我很不諒解他。我曾經以相當的篇幅對《論貨幣》加以評論。我之所以要予以批評，是因為不久前我從研究中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可說是對就業函數(employment function)——也就是就業直接受到生產總量的影響——的通盤批駁。我想我是代替佛斯特和卡欽斯兩位先生把整個理論給摧毀了。

1920年代美國有一個團體發展出非常類似凱因斯思想的簡單形式。1923年和1924年我在美國的時候佛斯特和卡欽斯兩位先生懸賞對他們論著最中肯的批評。我並沒趁這個機會有所回應，但是得獎的那本書實在是太差勁了，所以我想我必須回頭去探討這個題目。這篇後來以英文刊登題為〈儲蓄的弔詭〉的文章，確實包含了我對價格和生產的原始想法。

因此當《論貨幣》問世的時候，我有點惱火，正當我以為終於可以敉平總合需求和就業的關係，沒想到又被提了出來。這主要是發生在我到英國的第一年。對凱因斯的《論貨幣》之評論分兩部分。附帶說一句，我認為《論貨幣》中某些章節比《一般理論》[1936]要好得多，所以我的評論整體說來是恭維居多，不過對其主要論點是批評有加的。那個理論很快就過時了，於是，當第二部分的評論刊出後，凱

因斯跟我說：「喔，沒關係，反正我再不信那一套了。」這真是令人喪氣。

問者6：確實是很令人喪氣，根本沒必要做。

海耶克：現在回想起來，我總是說就是因為這樣我才沒有再攻擊《一般理論》，這本書實在寫得不太正確。我知道還有比這關鍵點上之差異更重要的東西，但是當時對總體和個體理論存在差異這種觀念，還並不是很清楚。我漸漸才認清一個事實，討論的重點應該是放在總體和個體理論的對比上。

但更重要的是，一直有人批評我在《價格與生產》中有關資本的理論不甚妥當，在龐巴衛克式原始的生產平均期狀態下，確實不太恰當。於是我著手寫一本討論資本和貨幣的巨著，最終得觸及貨幣現象。我在這件事情上花了七年的時間，比我原先所想的時間長得多。在我論及貨幣領域之前，我就已經對這個題目感到厭倦極了。後來大戰爆發，終於使我願意把那部分單獨成冊[《純粹資本理論》(1941)]，而暫時先把貨幣的部分完全拋開，打算有空再寫。

說來也許你不相信，大戰期間我是和凱因斯站在同一戰線對抗他的批評者，因為凱因斯非常害怕通貨膨脹。我實際發表了一兩篇論文，有一篇是評論他戰時的小冊子，另一篇則是論及對抗通貨膨脹的問題，這是他早就同意的。大戰那幾年真正的危險是通貨膨脹，而不是貶值，所以我們都起而對抗通貨膨脹。就是在這種氣氛下我想加強他的影響以對抗贊成通膨的人士，所以便不想繼續寫那本書。

因為我們有許多其他共同的興趣，包括在歷史方面和非經濟學的

領域，於是相處融洽。大致說來，我們見面的時候是不談經濟學的。大戰期間我們常常見面，雖然他在倫敦工作，但是週末的時候會回到劍橋，而我當然待在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所以我和他還有他的夫人羅波卡瓦(Lydia Lopokova)私交相當不錯。

我最後要跟你說的一件事是，我不很確定我要告訴你的這兩件事或三件事是發生在同一個晚上，像我想的，或發生在連續兩天的晚上。那是他剛協商完戰後英國的貸款回來，疲憊極了。我說的是1946年他過世前的六星期，新年剛開始的時候。但是他整晚在高桌子上向我們介紹他從美國收集回來的伊莉莎白時期書籍(Elizabethan book)。

這天晚上稍後事情就發生了，這需要先作一下解釋。戰時，他開始定期寄給我《思想史期刊》(*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當時那是一份新的期刊，而他是英國唯一的訂戶。他注意到我感興趣之後，每次一讀完就寄給我(這可看出我們的友誼)。事情是這樣的，雖然兩三星期前我就收到這本期刊，但在事發當天早上才讀了一篇討論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散失的第二本著作之出版狀況。我剛好在國王學院喝咖啡，對面坐的是一位天文學家，原本跟這種人是很難有什麼交情的，但是因為我讀了這篇他所不知的文章，面他又大感興趣，所以我就把我能記得的出版情況說給他聽。凱因斯跟我們隔了有三個座位之遠，正和別人聊天，可他卻一直都在聽我們的談話，因為他突然說「你錯了，海耶克」，而且還能糾正我。由於他是兩週以前寄給我的，所以他讀這篇文章至少有兩週了。雖然他在想著別的事，但他仍能保持清醒，並注意到我所說的內容。他的糾正是對的。我並沒有注意到那個細節，而他卻能指正我。

就在發生這件事的同一個晚上——也許不是他介紹從美國收集回

來伊莉莎白時期書籍的同一天晚上，但是確定相隔不到幾週——我們坐在資深交誼廳閱報的時候，我提到羅賓森(Joan Robinson)女士和卡恩(Richard Kahn)對貨幣政策所作的研究。他大叫：「他們是群傻瓜，你知道，我的思想在1930年代的重要性非比尋常，對抗通貨膨脹是無庸置疑的。但是，海耶克，你可得相信我，我的觀念是有時效性的。我要像這樣[彈了一下他的手指]扭轉輿論。」六個星期後，他便辭世了。我想要不是因為他的過世，他是會做到的。

問者6：也許會吧，他很能操控輿論，不是嗎？

海耶克：沒錯。這是他狂妄之處。他常稱自己是卡珊杜拉(Cassandra)[譯者按：木馬屠城的預言家]。他以為他可以玩弄輿論一如彈奏樂器一樣。他在大戰和約的影響力使他大為得意。當然，他非常清楚自己掌握語言的能力，不過我想這一點在《一般理論》並沒有表現出來，但是他確實可以寫得很優美，而且他也擅於演說。我常常說——別人倒沒有這麼常提起——他的聲音非常具有魔力。他的聲調極具抑揚頓挫。我看得出來人們只要聽他說的話，就會為之著迷。

還有就是他的興趣包羅很廣。你幾乎可以和他無所不談。當然，他的知識還是有明顯不足之處。他的知識是美學導向的，結果造成他對十九世紀的經濟史全然無知。真的是一無所知。他根本就不喜歡。

甚至連早期的英國經濟學家都要我每天來告訴他，但有關經濟史的部分就沒這麼多。他知道他的馬夏爾(Alfred Marshall)，但是對其他人則所知甚少。有一段時間他對馬爾薩斯起了興趣，但我還是必須跟他說桑頓。過了很久我意識到，如果我早把十九世紀英國的通膨主義

者介紹給他，可能會使他打消念頭，不過我一直沒機會跟他說這件事。

問者6：他知不知道傑逢斯，你記得嗎？

海耶克：知道，他知道。

問者6：有人會認為他應該知道。傑逢斯和他的父親寫了有關邏輯的書，那本書——

海耶克：是的，他對傑逢斯的了解是在邏輯而不是在經濟學方面。不過，在經濟學方面他確實知道大發現和價格指數。但是對於邊際效用，特別是傑逢斯所擅長的資本問題，凱因斯全然不知。

在國際貿易理論方面，他幾乎拿不出什麼東西來。他挑了公共影響(public-impact)統計學這門來研究，如果你算算他學習的時間，我想他花在學習經濟學的時間應該不會超過一年。他榮譽學位考試(tripos)的兩部分，其一我想是數學，另一個學門就是經濟學了。我要說我是喜歡凱因斯的，而且在很多方面也相當崇拜他，但是我並不認為他是個好的經濟學家。

問者6：在他晚年，我想約在1940年代，他寫了一篇我想是有關伊莉莎白時期文學某個層面的文章，文中提到他的記憶力非常短暫。他說：「這個星期我是這主題的專家，下星期我卻可能對其一無所知。」

海耶克：那種說法一點也沒錯。有幾件個案讓我很驚訝。基本上他是非常崇尚空談理論的(doctrinaire)，但是對新觀念也有開放的態度。我寄給他一篇論文，文中提到投資會增加對新資本的需求，他很坦然地

承認這對他是全新的觀念：「但是你可能說得沒錯。」還有一次我寄給他一篇有關某種穩定措施的論文；那個術語我現在想不起來了。當時有人提議以指數[以商品為準備的貨幣]來穩定貨幣。雖然他對這事不甚了了，他還是興緻勃勃地加入討論。這次的情形也是一樣，之前他根本完全沒有接觸過這種想法。

問者6：你什麼時候才開始意識到凱因斯暫時贏得了勝利，也就是說他讓政府和其他一些作決策的人接受了他的看法？

海耶克：你是說他獨領風騷？就是在戰後。

問者6：戰後。我不是指理論的論戰，我是指與政府有關的實務部分。

海耶克：這和另外一點略有關係，也就是說在戰爭期間，因為在政府部門共事，所以凱因斯贏得羅賓斯的支持。

問者6：喔，原來那時候他們一起做事。

海耶克：是的，沒錯，他們那時候是以英國代表的身分共同出席布列頓森林會議。而在戰前非常反凱因斯的羅賓斯多少是被他爭取過去了。倒不見得在純理論方面，但恐怕他是這樣子——我現在最好告訴你另一個說法。我有一種理論：所有擔任公職的經濟學家都會因服務於政府部門而被腐化。而我也必須承認(這也是為何我要插入這句話)我的獨立性得力於當各國政府開始要我從事公職服務時，我立刻和他們畫清界線。

問者6： 我正要問你這一點。

海耶克： 我曾經任職於奧地利的一個政府委員會，六個星期或六個月後我就離開了。戰時我[在英國]不獲任用。那時我依然是個外人，敵國的外人，你看我的地位非常特殊。我並沒有被利用來達到任何戰爭的目的，但我也不受干擾。這是在英國再理想也不過的職位了。但是戰後我做了一件事情，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我到直布羅陀(Gibraltar)作了一次社會調查。

1944年，大戰的最後一年，碼頭工人出了點麻煩。傳統上從英國去的碼頭工人工資要比直布羅陀的碼頭工人來得高，這種作法出了問題。那裡甚至連生活成本指數都沒有，因此殖民局問我是不是可以為他們找個好學生到直布羅陀去編製生活成本指數。我說：「現在沒有好學生，我根本沒有學生。但是如果你們要我去直布羅陀，我可以在假期的時候過去，順便享受一下。」「如果是你去的話，我們會要你多做一點。你可不可以為直布羅陀作一次社調？」

於是我去直布羅陀住六個星期。這真是不平凡的經驗，別想要我告訴你一些軼聞，這會沒完沒了的。反正，我是做了一些政府指定的工作，但這是最後一次了。後來殖民局要我到塞浦路斯(Cyprus)，我只得說不，我想我已經打算好要去美國了。

因此我擔任公職的時間並沒有長到足以腐化的地步。在美國至今沒到這種地步。他們第一次要我參加華盛頓的一個委員會時，我必須說不，我正要離開。所以我擔任公職的實際經驗是少之又少。看看羅賓斯這麼一個我所仰慕的人，他的例子使我更加相信當官會腐化經濟學家的態度。羅賓斯後來已不算是經濟學者，而成了位政治人物。

問者6：我想這就是個人抉擇的問題了。魚與熊掌，不太可能兼得。

海耶克：當然凱因斯在某方面說起來也是比較像個政治人物。

問者6：更甚於理論家。

海耶克：至於羅賓斯我想加一句(我希望你能親自和他聊一聊)，我們必須注意他有一個非常可愛的習性。他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忠誠朋友。不過，要是有人問他對拉斯基、或是貝佛里奇的回憶，雖然他會誠實以告，但是說的並不是實情。太多的修飾。因為這兩個人都是他的摯友。我想對這種事情我的態度要開放得多，我不會絕口不談。我對拉斯基和貝佛里奇的描述可能相當不客氣。

如果你要問我，最想再和什麼樣的有趣人物共度一個夜晚，我的回答是熊彼得和凱因斯這兩位有許多共同點的經濟學家。他們的共通處一言以蔽之是驚世駭俗(pour épater les bourgeois)，兩個人都是如此，表現的方式不同而已。熊彼得比凱因斯更具有學者風範，也更為天資聰穎。他見識之獨到快速，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的思想卻全然沒有個一致性。他相信他的本能。我想大概沒有人能為他寫一本好傳記，因為這需要同時具有批評眼光的摯友來執筆，但是我卻想不出有這號人物。

※　※　※

問者6：可不可以請你說一下你和凱因斯學派的經濟學家有哪些不同之處？

海耶克：雖然不是出於他的本意，但是凱因斯刺激了總體經濟學的發

展。我認為不只是他的結論，而是整個總體經濟學的基礎都是錯誤的，因此我想要證明我們必須回到個體經濟學。源自於自然科學家的總體經濟學方法，認為我們可以推演任何事情以測量總和及平均效果的強弱。這令我更覺困惑。

我覺得這件事我還不足以勝任，又不知道還有什麼人可以從事這項特別任務。我倒希望我在資本理論方面所做的努力能夠後繼有人。這是個非常有趣的新領域。這種情況意味著我必須為一個我已經知道的結果提出證明，這實在非常無聊。另一點則是個開放式的問題：當視經濟學為複雜現象的一種新科學原型，已經無法運用物理學的機械模型來詮釋，而必須以我當時形容為「僅循跡預測」(mere pattern predictions)來處理，而這些預測又是相當有限時，那麼經濟學究竟以何面貌出現？如果把這當成一個知識性的問題來思考，這又更具吸引力了。

問者6：現在回想起來，你會不會說以奧國為本的資本理論結果是以《純粹資本理論》一書告終？

海耶克：相當大程度上是如此的。因為沒有人完成原先我希望由別人去完成的事。

問者6：至少現在人們已經在嚴肅看待凱因斯學派總和的問題，結果你成了五十年前就對這點提出質疑的第一人。

海耶克：人們是因為對凱因斯失望，才會把興趣再轉回到我身上。而且光是失業竟與通膨同時發生這個事實，使大眾的幻想瞬間破滅。

問者6：有人說凱因斯的《一般理論》就是故意寫成令人混淆且予以複雜化。你覺得這種說法可靠嗎？

海耶克：手法還不會這麼笨拙。他深信他比其他所有人都來得聰明，而且他想他的本能已經告訴他應該做什麼，於是他就是想發明一種理論來說服別人去做。這才是他真正的行事方法。就一個經濟學家而言，他在經濟史方面的訓練非常不足，你知道他對十六世紀伊莉莎白時期有股狂熱，也是這方面的專家，但因美學的理由，他討厭十九世紀的經濟史，其嚴重的程度幾近於無知。十九世紀是醜陋的。

問者6：為什麼他這麼憎恨十九世紀？

海耶克：因為他相信勞工史上托尼及其同伴的故事。勞工階級的貧困化。這全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小說情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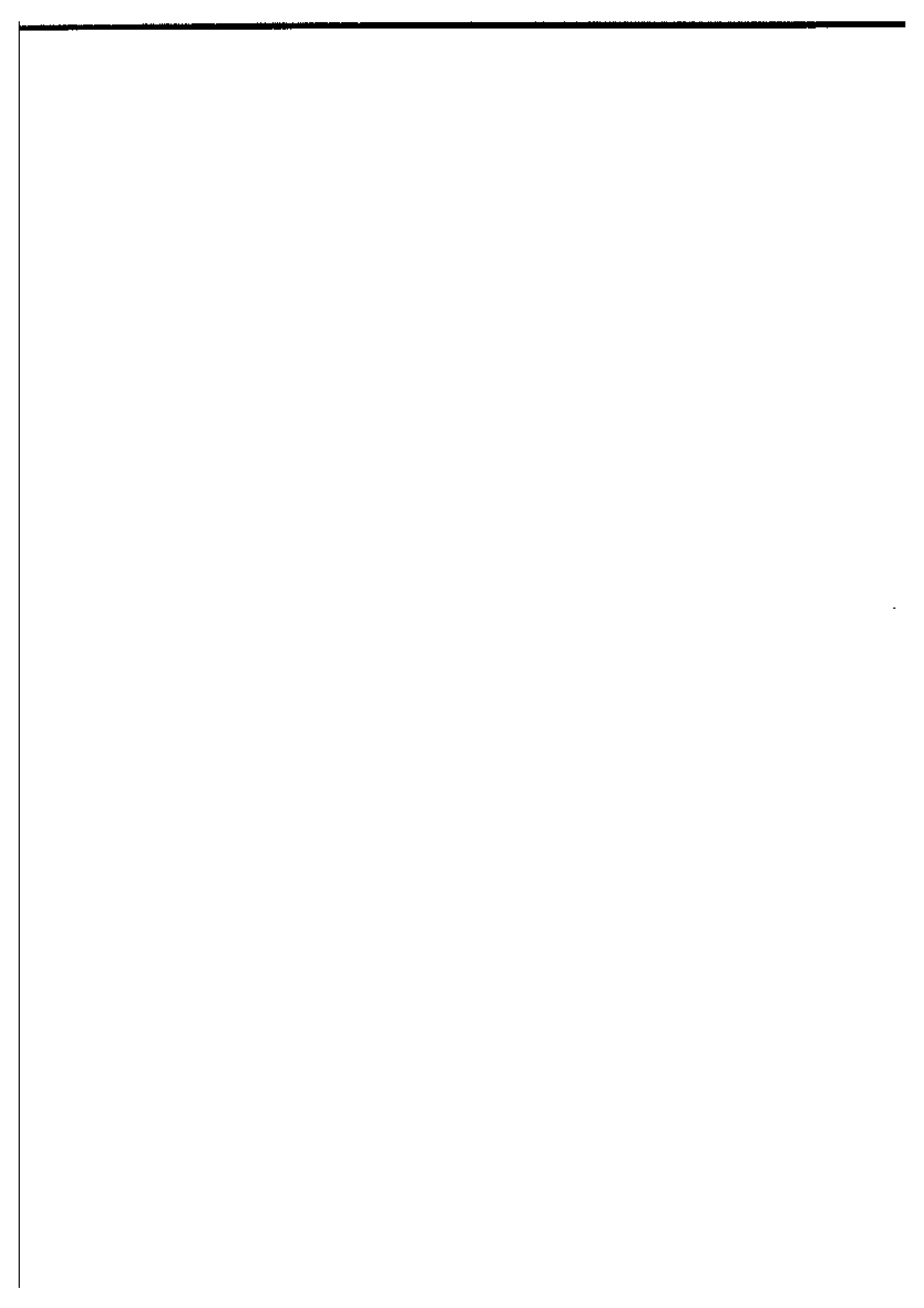
凱因斯寫給我唯一的一封信是論《到奴役之路》，這已經被一再地引用，他在信中表示與我心有戚戚焉，並總結說危險是很大的，但是在一個人們覺得受到公平對待的國度裡，這些事情都可以避免。

大戰的爆發使倫敦經濟學院搬到劍橋，大部分親近的同事也離開學院擔任公職去了。有一陣子我是倫敦經濟學院唯一的資深經濟學家，下面只有兩個年輕人當助手。不過，至少還有和劍橋合開的課程，有一段時間，我爲這兩個學術單位講授高等經濟理論，而庇古則傳授基礎理論。

大戰的第一年我們還是住在倫敦，我一星期只有三天到劍橋去。但隨著1940年9月大轟炸的開始，這種通勤就行不通。因爲最初我沒有

辦法在劍橋找到合適的居所，而羅賓斯家族在邱滕斯(Chilterns)有一間平房讓我們家借住了一年，另外，當時與我已經相當友好的凱因斯，則爲我在國王學院弄了幾個房間。1941年我終於在摩頂巷(Malting Lane)找到一棟房子，其實應該說是間改造的穀倉，我們在那一直住到1945年。

大戰那幾年在劍橋的生活對我而言特別宜人，也給了我溶入英國生活的機會，從一開始，我覺得在英國生活非常自在。不知怎麼地，英國的整個情調和學術氣氛立即深深地吸引著我，而戰時的情況我全站在英國這邊，也大爲加速了我以此爲家的過程，尤勝於我對祖國的認同，事實上，由於1920年代的形勢，我和奧地利已經有點疏離了。相較之下，我第一次到美國，以及後來在美國居留的時間，甚至後來在德國，我都沒有真正的隸屬感，而英國式的生活是這麼自然地符合我所有的本能和習性，如果不是因爲情況特別，我永遠都不會想再離開那個國家。在所有的生活型態當中，古老大學的學院生活依然對我是最具吸引力的，至少劍橋當時的情形是如此，牛津的情形我就不清楚了。在國王學院的高桌(High Table)和綜合廳(Combinations Room)的那些夜晚是我生命中最堪回味的，而當時我所認識的一些長者，在他們有生之年，一直是我要好的朋友，特別是克拉彭(J. H. Clapham)。



第三部
在分歧點上

在劍橋時教學負擔很輕(學生很少)距離又近，使我有著比以前多的時間來做自己的事。雖然我主要的興趣還是在純經濟理論，但《到奴役之路》卻是在劍橋時寫下的，這本書是從我早在1938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所揭露的某些觀點發展出來的，也是大戰前兩年我致力於理性的濫用與衰微之研究的進一步成果，這一點稍早我已經提過了。

問者1：依我看《到奴役之路》和技術性較強的經濟學書籍比較起來，是一般讀者能看懂的書。在英國用「外國人」……這個字是很有意思的。某種定義下的文化在世界活動的順序裡究竟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知道您曾經對這方面作了一些新的思考？

海耶克：是有那麼點關係，但你所由出的文化不必然就是最能吸引你的。就文化層面而言，我現在覺得我的國籍是英國而不是奧地利。這也許是因為在1930年代早期到1950年代早期這段時間，我生命中最具決定性、最活躍的那部分是在英國度過的。但是從我抵達的那一刻起，我第一次發現自己處在一個和自己全然氣味相投的道德環境，我幾乎是一夜之間就完全融入了。

我必須承認十年前我初來到美國的時候並沒有同樣的經驗。我覺得美國很有趣，也很吸引人，但是我並沒有像我成為英國人那樣的感覺要成為一個美國人。不過我想這是個情感的問題。我的習性像英國人，多於像美國人，甚至遠勝於我的奧國同胞。我想就某種程度而言，這是個人對特定文化接受度的問題。有一陣子，我可以說一口相當流利的義大利文，但是我永遠也不會變成一個義大利人。但是，這完全是情感的問題。我並沒有那種可以使我成為義大利的感覺，但是我卻可以一下子就成為一個英國人，因為這對我是件非常自然的事，這是我後來才發現的。這就有如你踏入一個溫暖的浴缸，而溫度剛好和你的體溫相同。

問者1：是什麼使你覺得跟英國人相處甚歡？

海耶克：某種社會傳統的力量使人可以心照不宣地馬上了解你的需求。

問者1：可不可以舉個例子？

海耶克：比方說中斷對話的方式。你不用說：「喔，對不起，我在趕時間。」而是變得有點心不在焉，顯然在想著別的事；你一個字都不用說。你的夥伴自會中斷對話，因他能了解，你真的想做別的事。這毋需以言詞表達。這是我在那一刻不想繼續談下去的間接表示。

問者1：在美國會有什麼不同？是更直接嗎？

海耶克：他要嘛會勉強自己注意聽，好像自己很專心似的，不然就是會直接了當地說：「喔，對不起，我在趕時間。」在英國不會發生這

種事，我不能說從來沒有人這麼做，但這不是英國式的作法。

問者1：那麼奧地利的作法又有什麼不同？

海耶克：會以非常客氣的口吻解釋你實在是非常抱歉，但現在你真沒有辦法。你會大費唇舌地來說明，而在英國卻不用隻字片語來說明。

※ ※ ※

問者6：這種在英國賓至如歸的感覺對你掌握英語的精微之處一定大有幫助。

海耶克：戰時我在《到奴役之路》進行文字遊戲，因為那是我第一次覺得我可以掌握英語，是那種我可以從寫作英文中得到樂趣的感覺，我是說，我在表達學術論點的時候並沒有困難，但是——

問者6：你真的感到悠游其間。

海耶克：其實，如果你花時間去讀導論的開頭部分，和前兩三章，就會發現我在那兒試著展示自己英文可以寫得多好。而且，我還不厭其煩地一再朗讀，希望能有律動的感覺。

問者6：是的！那是韻律感。

海耶克：如果整本書都這麼做可能要花上好幾年的時間。但是從風格上來說，開頭的前兩三章和導論可能是我寫過最美的文字了。真正花上時間，並享受我終於達到可以把英文寫好的境界，不只是寫得正確，而且還是優美的英文。戰時那幾年就是這樣，而漸漸地——我想我還

可以在《到奴役之路》上弄一兩個不同版本。我真的樂在其中。也許我對純理論已經有點厭倦。我花在《純粹資本理論》那四年實在是相當不好過。

你從我的文章中最少還會發現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原本計畫以一種非常不同的形式來寫一本大部頭的書，結果部分文稿集結成《科學的反革命》一書。原本想要寫的書名是《理智的濫用與衰微》(*The Abuse and Decline of Reason*)。我在決定把《到奴役之路》寫出來之前，真的預期在結尾處會討論理性的衰微。比呈現出來的還要通俗，因為我的野心實在太大了。最先要包含的章節是我已經寫好的論聖–西蒙學派(Saint-Simoneans)、孔德、孔德到黑格爾的關係；然後有兩三章是論法國，然後再一章就是論黑格爾和馬克思。而我討厭談到馬克思。我唸書的時候必須花很多時間在馬克思上。寫到他使我很沮喪，於是我就放棄了大篇幅歷史性敘述的想法，只對理智的衰微作了系統性的敘述。題目是報應和傲慢(Nemesis and Hubris)。

※　※　※

問者5：《到奴役之路》會不會使人誤認為是對於可能要發生之事件的一種觀察——

海耶克：1939年英國已經興起了一種非常特別的情況，也就是人們開始認真地相信民族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是資本家對社會主義的反擊。現在說來令人難以置信，但是我碰到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貝佛里奇爵士。他真的深信這些民族社會主義者和資本家是反社會主義的。於是我針對這個題目為貝佛里奇寫了一份備忘錄，後來將之變成期刊論文，再利用戰時寫成我認為將是論理智濫用與衰微巨著的真正普及

版。這只是第二部分，是論理智的衰微的那部分。當時主要是針對英國的社會主義知識份子，這些人似乎都認為民族社會主義並不是一種社會主義，只不過是一種毫無價值的學說而已，因此我才在寫作上，作了這樣的調整。我只是要告訴他們：「你們走的路和他們是一樣的。」

這本書在美國所得到的反響是如此的不同，如果說在美國竟引人注意的話，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事。這本書完全是以英國為寫作參考架構，當然在英國所得到的反應就完全不一樣。除了少數的例外，英國的社會主義份子認為這本書是肺腑之言，也提出了他們願意思考的問題。比如像伍滕(Barbara Frances Wootton)女士寫道——其實我和她有著一次非常特殊的經驗。她說：「你知道嗎？我原本想要指出一些你已經指出的問題，但是既然你已經極盡誇大之能事，所以我只好跟你唱反調了！」在美國，情況完全不一樣。當時社會主義是一種新的傳染病。大家對新政的熱情正方興未艾，大致可分為兩派：有一群人是對書本身很感興趣，但是卻從沒讀過這本書——他們只是聽說有這麼一本支持資本主義的書——而美國的知識份子，因為才剛受集體主義的荼毒，覺得這是背叛了最高理想，因此知識份子應該起而維護。因此我受到無法想像的謾罵。這是我在英國時從來沒有遭遇過的。批評影響之深遠甚至使我在學術上喪失名譽。

1940年代中期(我的說法也許聽起來很自負)，我想我是備受爭議的兩大經濟學家之一，一個是凱因斯，一個就是我。現在凱因斯死了，也成了大家眼中的聖人，而我則是因為出版了《到奴役之路》而名譽掃地，真是滄海桑田。

《到奴役之路》受到大眾的歡迎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雖然長期以

來我一直抗拒把我從純理論牽往從事實際工作的拉力，但是這件事確實對我的生活產生極大的影響。在英國受到立即的歡迎，跟在美國所受到的情況同樣出人意料之外，不過引人注目的形式卻和美國不同。在人們對這本書大感好奇時，我剛好恭逢其盛，因爲1945年的3月到5月，也就是這本書登上暢銷書榜時，我正好在美國旅行演講，這是我一生中最奇特的經驗之一了。

美國的出版商，芝加哥大學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原本安排了一次五個星期的訪問，其間我應該在東部和中西部五所主要大學作一系列三至四場的演講。當我坐著護航艦，慢慢地通過大西洋(當時還在戰時)，船上沒有通訊設備，《讀者文摘》上刊登了該書的節錄，使得情況完全改觀。我突然一夕成名，到達之後被告以整個訪問計畫都改變了，我必須去作一次比較廣泛的通俗旅行演說，而所有的活動安排都落入商業性演講代辦機構手中。於是我這個從來沒有對廣大聽眾作任何通俗演講的人，在沒有任何準備，事先也不知道題目的情況下，居然抵達美國的第二天就在紐約的市政廳演講起來，更令自己大感意外的是，我居然可以做得很成功。

我的旅程遠至西邊的奧克拉荷馬市(Oklahoma City)，中間經過芝加哥(Chicago)是我此行的重鎮，這段故事實在太長了不適在此道盡。但是我往後的許多旅行合約和最後移往芝加哥，說來全歸功於這次旅行。事實上，自從我二十一年前以研究生的身分來到美國之後，中間我都一直未再踏入美國，但是在此之後我幾乎每年都回來，直至1949年底我完全搬過來。

問者6：可不可以請你評論一下人們對《到奴役之路》的反應？

海耶克：《到奴役之路》的出版已到了使英國人民警覺社會主義之危險的地步。但是在美國我聽到的全是對新政的新熱潮，不過也有一些劇烈的反響。我應該這麼說：在英國談論本書的人是真的讀過這本書，而在美國則是那些根本就沒有讀過，或充其量只讀了《讀者文摘》上的節錄的人在討論。

我想我已經跟你說過，我並沒有從《讀者文摘》的節錄中得到一分錢，因為芝加哥大學出版社讓《讀者文摘》免費刊登。大部分人讀的也是這個版本。節錄是出自伊斯門(Max Eastman)之手，做得非常、非常地好。看過《讀者文摘》節錄和原書的人數之比大概是十二比一。甚至連很多當時在獄中或戰俘營的人也都讀過節錄。《讀者文摘》的分佈網路，顯然深入戰俘，特別是英國的戰俘營。很多德國人說：「我是讀《讀者文摘》學英文的。」

反正，我到達紐約(New York)的時候：「原來的計畫已經取消了。你突然成名了。你要到美國作旅行演說。」

「我沒辦法，我從來沒有作過公開演說。」

「不過，都已經安排好了，你一定要試一試。」

「什麼時候開始？」

「噓，你已經來晚了。」那時候是星期六下午。「明天早上你就開始在紐約的市政廳演講。」

這對我一點意義都沒有。我腦中想到的是《紐約客》(*New Yorker*)上一幅仕女俱樂部的漫畫【霍金森(Helen Hokinson)所繪】。我心裡想，既然是星期天早上，也只能是這種仕女俱樂部吧。當我從住宿的麗晶飯店(Regency Hotel)被載往市區途中，我開始詢問來接我的主持人，「那麼，你期望會有什麼樣的聽眾呢？」

「市政廳可以容得下三千人，但已經大爆滿。」

「天啊！我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事。我到底要講什麼？」

「喔！我們把主題訂成『法律和國際事務』(Law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天啊！我想都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我做不來。」

「都已經宣佈了，就等著你去。」

於是我被引進這個龐然大廳，裡面那些設備都是我沒見過的。當時他們有聽寫的機器、擴音器，對我全是新事物。我記得最後我問主持人：「時間是四十五分鐘？」

「不是，必須剛好是整一個小時，因為有現場電台轉播。」

於是我就得談一個我全無概念的題目，我還記得我的開場白是：「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想你們都會同意我說——」那時候我還不知道接下去該說什麼。

後來我發現美國的聽眾是非常善良的聽眾，你可以從他們的臉上看出他們的興之所在，這和譬如說英國聽眾是全然不同的。漸漸地我把他們的情緒帶動起來，結果這次演講非常成功。我這種人幾乎可以說從來沒有對大眾演講過，從來沒有不用講稿就上台，居然發現自己可以勝任這種通俗演講。

在那五星期中，我跑遍了全美，遠至洛磯山區、西部和南部，漸漸地體認到自己已經成了一個經驗豐富的公共演說家。

※　※　※

海耶克：我想是在1946年的秋天，我第一次有機會為英國國會到德國去演講。英國和美國的占領區我都有去，我想我主要的活動地點是在科隆(Cologne)，而我在那裡最動人的經驗，便是在大學發表演說。當

時，我完全不知道德國人會對我有什麼了解，而來聽演講的聽眾擠得連學生都進不來，地點是在一個很大的演講廳。後來我發現人們已經在傳閱《到奴役之路》的打印本，雖然當時該書尚未在德國出版。

問者6：演講的題目是什麼？

海耶克：《到奴役之路》。除了科隆，我還在附近一些城市作演講，包括達姆斯塔特(Darmstadt)，這個地方可真令我難忘，是因為整個城市完全被戰爭夷為平地；剩下來的似乎不是一個城市，而只是一堆堆的斷石殘垣。我爬過那些瓦礫堆進到一個大地洞去演講。

問者6：倫敦方面有人告訴我有過一次所謂「祕密警察演講」(the Gestapo speech)的事件，你受到阿特利(Clement Attlee)的攻擊。可不可以請您說說那件事？

海耶克：祕密警察演講的人物是邱吉爾，時間大概是《到奴役之路》出版不久之後，在那有人指出他是受到《到奴役之路》的啟示，也是在那裡，邱吉爾預言社會主義政府會導致祕密警察統治。後來阿特利以控訴「邱吉爾先生是受到佛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海耶克的影響」來回應。

問者6：這就是全部嗎？

海耶克：沒錯。邱吉爾在演說的時候，從頭到尾都在講祕密警察。社會主義份子習以全名來稱呼我，也不是阿特利所特有的；其他人也這麼做。社會主義對我正式稱呼是「佛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海耶克」。

問者6：1947年有一篇文章提到你，把你說成是邱吉爾的經濟顧問。有沒有這回事？

海耶克：沒有。我只見過邱吉爾一次。

問者6：標題是：「邱吉爾的顧問提出說明。」

海耶克：我剛好是經濟系教職員的頭頭，在頒授學位之前，受邀和邱吉爾共進晚餐。在晚宴期間我可以看到他牛飲大量的白蘭地，我被介紹給他的時候，他幾乎已經沒有辦法說話了，但馬上認出我是《到奴役之路》的作者。他是喝醉了，只說了一句：「你說的對極了；但是這件事不會發生在英國。」半個小時之後，他發表我所聽到的少數精彩絕倫的演講。

問者6：岡布里奇告訴我他認為「祕密警察演講」可能使邱吉爾輸掉選舉。你想有沒有關聯？

海耶克：我想這也不是不可能。在那段時間他曾受到阿特利和多爾頓(Hugh Dalton)公然的攻訐，每一次都在指責他的想法來自奧國經濟學家海耶克。這麼一來，大眾的心裡就把我和邱吉爾聯想在一起，不過，他顯然是知道這本書的內容。我是從那次的相遇知道的。我甚至不知道他讀了多少——有沒有讀完全書？——除了這一次，我對他沒有任何的影響，也沒有任何的接觸。但是當時反對他的是說在演講中用了太多「祕密警察」這個字眼，可以這麼說整篇演講所造成的殺傷力比其他事情都大。

問者6：我還有一個問題是「馮」(von)這個字的使用，比如「馮・米塞斯」、「馮・海耶克」等。我模糊地記得有這麼一個故事說米塞斯如何得到這個頭銜，以一個猶太人而言是少見的，故事好像是關於他父親獲得了頭銜並世襲下去。詳細的情形如何？

海耶克：這些頭銜都是世襲的。先來說說米塞斯的例子，一般的說法是，試想英國所有的高級政府官員都是專業人士和商業人士，他們都因特殊的恩典，而有「爵士」(sir)的頭銜，並且傳給所有的子孫。在奧地利，不是稱「爵士」，而稱之為「馮」，通常可以追溯到好幾代以前。不過，事情變得複雜是1918年革命之後，已正式廢除這類頭銜，甚至禁用。結果在奧地利，說來有點好笑，沒有人可以合法地對自己用這個頭銜，但是卻可以用在別人身上。在奧地利你不可以稱呼自己為「馮」，但是基於禮貌的考量，你會以此尊稱任何曾世襲這種頭銜的人。這種情況在我個人身上就變得更為複雜。我是個守法的公民，完全不用「馮」這個頭銜，不過，在我的出生證明上免不了有此頭銜。因此，當我為了歸化英國籍，而提繳出生證明，結果收到歸化證明時，我的英文名字突然變成「馮・海耶克」。那時候我急著想要持英國護照到歐洲度假，為了避免要求修正所引起的官僚作業，就默默地接受了。此後，我在奧地利正式名稱是海耶克先生，但是在英國的正式稱呼是馮・海耶克先生。

※ ※ ※

問者7：可不可以請您說明寫作《到奴役之路》的動機？

海耶克：主旨在反對我所說的古典社會主義(classical socialism)；是針

對生產手段的國家化或社會化。許多當代的社會主義黨派至少在表面上已經放棄這項主張，而轉向財富的重新分配和公平稅賦觀念，這些福利不見得能夠直接適用。我想如此一來不會改變其基本的缺點，因為我認為對經濟世界的間接控制最終會導致同樣的結果，只是過程會慢得多。所以我說當時如果採行中央計畫體制——這仍是大部分社會主義計畫正式的目標——似乎會有立即危險的警語，現在就不是那麼切中要害了。至少過程會不一樣。現在福利國家政策有些地方，譬如說重分配這方面，到頭來會導致相同的結果：摧毀市場秩序，並使摧毀市場成為必要，而且漸漸地被中央計畫取代，這是違反現今社會主義者的意志。其後果還是一樣。但是我們所描述的過程，特別是我假定事情會發生的相對速度，當然不再適用於所有的社會主義計畫。

問者7：不再倚賴中央計畫，反而趨向使用預算來進行所得重分配？

海耶克：沒錯。我不知道是不是該說我自抬身價。我認為如果社會主義仍堅持原來的計畫，也許會更快地自取其辱。

※ ※ ※

編者註：以下數頁是重刊1945年4月海耶克和兩位芝加哥大學教授經由電台廣播的討論全文。

《到奴役之路》

電台討論

芝加哥大學圓桌會(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Round Table)

國家廣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

共同製作

1945年4月22日

大家圍在圓桌……

海耶克，倫敦經濟學院的經濟學教授，1899年生於維也納。他受業於維也納大學，並於1921年擔任奧國公職。後來他出任奧地利經濟研究所(Austri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的所長，並在維也納大學擔任經濟學的講座。1931年，他前往英國擔任倫敦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而且從1930年代中期起，一直和倫敦經濟學院保持關係。1938年，他歸化為英國公民。海耶克先生著作等身，諸如《價格與生產》(1931)；《貨幣理論與貿易循環》(1933)；《集體經濟計畫》(*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1935)；《純粹資本理論》(1941)；以及《到奴役之路》(1944)。

克魯格(Maynard C. Krueger)，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的助理教授及院務代表，在專精於經濟學之前，曾研習歷史和國際政治。1926年在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 of Missouri)完成大學教育。1927年從密大取得碩士學位後，隨即在奧比恩學院(Albion College)擔任史學講師。他曾花三年的時間在歐洲的巴黎、柏林和日內瓦各大學研習。1932年他開始在芝加哥大學教書，從1928年到1932年這段期間，他任教於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金融和商業學院(School of Finance and Commerce)，目前他是社會黨的全國主席，1940年代表社會黨競選副總統。

梅里亞姆(Charles E. Merriam)，芝加哥大學政治學侯勒傑出服務講座榮譽教授(Morton D. Hull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Emeritus of Political Science)，曾為國家資源計畫局(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的委員，並曾擔任該局的副主席。他同時也是近代社會趨勢委員會(Commission on Recent Social Trends)和總統的行政管理委員會(President's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的委員。梅里亞姆教授活躍於芝加哥的政界，曾在市議會擔任三屆議員，1911年參選芝加哥市長以些微差距落敗。他曾就讀於尼諾克斯學院(Lenox College)和愛荷華州立大學(State University of Iowa)，並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梅里亞姆教授從1900年起就任教於芝加哥大學的政治學系。他著作頗豐，諸如：《美國政治理論史》(*A History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eories*, 1903)；《美國政治思潮，1865至1917年》(*American Political Ideas, 1865-1917*, 1921)；《美國政黨制度》(*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1922)；《政治新貌》(*New Aspects of Politics*, 1925)；《政治力》(*Political Power*, 1934)；《政治在社會變遷的角色》(*Role of Politics in Social Change*, 1936)；《新民主和新獨裁》(*The New Democracy and the New Despotism*, 1939)；《政治序幕》(*Prologue to Politics*, 1939)；《何謂民主？》(*What Is Democracy?*, 1941)；《論民主進程》(*On the Agenda of Democracy*, 1941)；以及《公共和私人政府》(*Public and Private Government*, 1944)。

「到奴役之路」

克魯格先生：海耶克教授，您剛出版了一本書，書中對各種社會主義者都作了通盤的攻擊，包括社會黨的社會主義份子，而我本人剛好是這個黨的一員。今天的圓桌討論主要就是針對您的主要論點。可不可以請您以一句話告訴我們您這本書的基本命題？

海耶克先生：其實並不是攻擊社會主義份子，而是想要說服社會主義份子，我這本書就是獻給社會主義份子的。我主要的命題是他們為達到他們想要的目標所用的方法是錯誤的。規範社會事務有兩種方法，一是競爭，一是政府指導。我反對政府指導，但是我想要讓競爭行得

通。

克魯格先生：這本書也對計畫作了攻擊。梅里亞姆教授，你目前所講授的正是政府和經濟秩序的關係，您對這本書的看法如何？

梅里亞姆先生：我一直在從事計畫，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四十年了，包括芝加哥的計畫，各州的計畫，區域的計畫，以及在華盛頓的國家計畫，我未曾發現我們的計畫有導致奴役狀態，反而是向自由和解放邁進，並邁向人格的更高境界。我覺得這本書在我們這個領域並沒有特別貢獻，反倒會使人弄不清計畫在這個國家的意義。

克魯格先生：我預見這裡會有一些有趣的討論和爭辯。海耶克，您主要的主張是計畫會導致集權主義。您這麼說，有沒有什麼證據？

海耶克先生：當然是有的。您在這次討論中運用「計畫」一詞的方式，其意義非常模糊到幾乎根本沒有任何意義。您似乎把所有的政府活動都稱為計畫，而且假定有人就是反對所有的政府活動。

梅里亞姆先生：換句話說，你不喜歡美國人對「計畫」這個字的用法，而你引進了另一種用法？

海耶克先生：我不知道什麼是美國的用法，而且我還懷疑這是不是一般用法。那是你的用法。

梅里亞姆先生：從這裡對街就是美國計畫官員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Planning Officials)，會員大概有一千二百人。此外，還有數以百計的

都市計畫局，以及四十八個州計畫局，過去十五、二十年來，華盛頓也有各種計畫在進行。如果你不知道這點，我現在剛好直接了當的提醒你。

海耶克先生：這我知道，但是美國有許多反對計畫的人，他們的反對並不表示他們認為根本不需要有政府，他們是希望把政府限定在某些功能裡。你知道嗎，我確定同意這一次的討論就跟其他的討論一樣，會非常擾亂視聽。我想要指出的是：規範我們的事務基本上有兩種不同的方法。一方面，有一種方法是要靠著競爭，如果要讓競爭有效，需要政府做很多促使其有效的活動，並且在其無法形成有效競爭時，能夠予以支援。

梅里亞姆先生：我不喜歡美國人計畫的觀念這麼快就被斷然否定。今天我才讀了一篇有關你那本書的評論，文中說道：「這是對立意良好但感情用事的計畫者和社會主義份子的一服解毒劑」如此的一視同仁——比你書中所作的任何歧視有過之而無不及。

海耶克先生：我希望這本書是如此。

梅里亞姆先生：從這觀點出發，讓我這個美國的計畫者告訴你我們對字的用法並不像你想的，而且我們也不喜歡你把這種用法加在我們身上，你聽了一定會感到失望。

克雷格先生：梅里亞姆，請你先等一下，給這個人一個機會對我們和我們的聽眾解釋，他所使用的「計畫」這個詞的意義。我的了解是你並不是拒絕所有的公共計畫。可不可以請你說一些不在你攻訐之列的

計畫清單？

海耶克先生：凡讓競爭得以運行其中的法律架構，如契約法、財產法、防止詐欺和欺騙的一般條文，這全部的規劃都不在我討伐之列。這些都是非常符合需求的活動，不過請容我以更正面的方式來定義不利於競爭的計畫。

要是政府被要求決定一件事情該做多少，誰該來做這件事，誰又不得參與，誰有特權，而這種特權——是一種有別於競爭體系而又不能與之相容的社會體系，大部分的社會主義份子提倡這種社會體系至少上百年，而且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正是我反對的，我所主張的就只單獨反對這類計畫。

克魯格先生：我們是不是可以問你一些這方面的問題？你認為對工時的限制——最高工時法案——怎麼樣？這是不是符合您對適當計畫的表達？

海耶克先生：是的，如果不太過分的話。有些管制可以為整個體系創造公平的條件，這便是其中之一。但是，如果超過與整個國家綜合情況相適應的那一點，可能會造成相當多的干擾。例如今天強制所有人每天的工作量不得超過四小時，可能會徹底打亂競爭體系。

梅里亞姆先生：工時限制依您看來是否有任何可議之處？

海耶克先生：並不是任何工時限制都得反對，但是確實有這種可能。你可從這個例子看出，我所反對的並不是原則，而是程度。工時限制的問題在於無法將這種特別情況下所牽涉的成本與事件本身來進行衡

量。

克魯格先生：應該容許最低工資法的存在嗎？

海耶克先生：一般而言，應該容許適用於各產業的最低工資法，但我並不認為這是達到目的的特好方法。我知道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讓所有人都獲得最低工資。可是一旦你由為各產業設下一般性的最低工資轉成替個別的產業立下特定和個別的最低工資，那麼自然會使價格機制僵化，因為指導人們在各行業及交易進行交換的準則不再是價格機制了。

梅里亞姆先生：那對田納西峽谷管理局(TVA)您又有什麼看法？

海耶克先生：田納西峽谷管理局的大部分職能一般經濟學家都不會加以反對的，而主張自由放任者當然不在此列。防洪建設和修築水壩被視為是政府的功能。我總有這麼一個印象：其他許多依附這個計畫之上的功能根本不需要由公營企業來進行。但是由政府來提供防洪設施及類似的措施之原則，是政府全然合法也是必要的功能。

梅里亞姆先生：即使是像田納西峽谷管理局所進行的水力發電廠之開發亦然？

海耶克先生：這要看情況而定。如果私人企業確實沒有辦法提供水力發電廠，則我並不反對。

梅里亞姆先生：這並不是邏輯的事情，而是實際調整的問題。

海耶克先生：你是否能夠創造競爭的環境便是個實際的問題。

梅里亞姆先生：不是邏輯問題？

海耶克先生：我所要說的是，如果你能創造競爭的環境，那麼就應該倚重競爭。

克魯格先生：全面的社會保險制度是否有違您對良好計畫的定義？

海耶克先生：類似的社會保險制度當然不算違反，即使是由政府幫助籌劃都不算是違反。唯一會有問題的地方是其強制性有多高，還有，連帶的產業公會壟斷性的力量藉此能有多強？因為這是大幅削減競爭的方法之一。

梅里亞姆先生：您該不會是說所有的政府社會保險都要反對是嗎？您希望保險完全是自由選擇的？

海耶克先生：大可以是自由選擇的，這和由政府支助並不衝突，為什麼要讓它成為強制性呢？我一點都看不出來有這種必要。

克魯格先生：其中一個理由是絕大部分的人，占人口的大多數覺得應該有。這便是要使之強制性的理由。我想大家都相當同意這一點。

海耶克先生：這我可不知道。

克魯格先生：您對提供人們在食、衣和住這幾方面最低的保障有什麼想法？這是不是也違反了您對適當計畫的定義？

海耶克先生：您所謂「最低的保障」是什麼意思？我不斷地說我贊成所有國人都能獲得最低所得。

梅里亞姆先生：您自己的書上就是這麼說的，您的意思是什麼？

海耶克先生：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再說一遍——我指的是保障每個人都有可賴以維生的最低所得，當然，你們有了，這大致是以失業保險的形式存在。

梅里亞姆先生：克魯格用這個詞，似乎讓你感到不安。

海耶克先生：不是，但是他把事情說成是對特殊事物的特定保障。

克魯格先生：我完全是引用你的說法。

梅里亞姆先生：是從你的書上來的。

克魯格先生：食、衣、住的最低保障。如果這是被許可的話，那麼我會很高興聽到你這麼說，因為你想的遠超過於此。在國際領域方面，您希望有一強權能抑制各國不致做出傷害鄰國的行為。我覺得你所容許的公共計畫要比本國許多您的讀者所想的要多。

海耶克先生：我注意到這點了，我可不是什麼無政府主義者。我並沒有說競爭的體系可以不需設計精良及有效實施的法律體系便能運行不輟。以內政來說，我們至少有個辦法，但是在國際上根本還沒有這種法律體系。

克魯格先生：是否可以請您跟我們說一下您理想的體系中會排除哪一種計畫？您覺得哪一種計畫是可議的？

海耶克先生：我已經把一般性的定義告訴你了。也就是說對生產的數量或方向的任何直接控制。如果你想知道美國有些什麼例子，我想我必須提出一些戰前的例子。我們可以舉出農業調整行政局(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dministration; AAA)，幾乎所有的國家復原局(NRA)，以及最近的「格菲煤礦法案」(Guffey Coal Bill)。真是不勝枚舉。

梅里亞姆先生：關稅是不是也包括在內呢？

海耶克先生：所有阻礙競爭的限制當然都包括在內。

梅里亞姆先生：你會廢除所有的關稅，是不是？

海耶克先生：我對自由貿易深信不移，自由貿易是出於同樣的哲學。

梅里亞姆先生：沒有任何的限制或條件嗎？

海耶克先生：有件事令我很不高興，許多接受我書中內容的人並不相信自由貿易，而且並沒有看出這是同一哲學的基礎組成部分。

梅里亞姆先生：您是否反對農民實行價格平準(price parity)？

海耶克先生：如果「價格平準」指的是必須由政府來確保特定的價格，那我必然是反對的，因為這代表了競爭的價格體系完全無效。

梅里亞姆先生：那麼，如果我們要避免走上到奴役之路，您就覺得必

須廢除所有的關稅和對農民實行價格平準？

海耶克先生：這是要避免走上那條路最可靠的方法之一。

克魯格先生：另一件我感興趣的事是有關失業方面的計畫問題。您在書中解釋為什麼現在的人比上一代想要更多的計畫，但是在解釋中卻沒有用到「失業」這個詞，事實上失業這個詞很少出現在您的書中。在處理失業問題上，有哪種計畫是正當的？

海耶克先生：基本上，什麼是需要的並且能有效的取得，大體上是——幾乎完全——取決於貨幣政策方面，目前有許多看法是我不同意的。我的意思是說，政府在提供可以導致高水準、且呈穩定狀況的就業之環境上，負有重要的功能，這一點是沒有人能質疑的。至於特定的方法是否有效，則是非常技術性的問題。

梅里亞姆先生：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是否正走上到奴役之路？

海耶克先生：儲備銀行有犯錯。

梅里亞姆先生：我是指，原則上說來如何？

海耶克先生：不是。對我來說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會否認貨幣體制應該由中央控制。這是屬於使競爭可運作的一部分架構。

梅里亞姆先生：您沒有聽過採行聯邦儲備銀行理事會法案的辯論。

海耶克先生：我已經對聯邦儲備體系的歷史作過非常詳細的研究。

梅里亞姆先生：那麼你是沒有聽過有人指責這個制度的社會主義性格？

海耶克先生：不要叫我為別人的胡說八道負責。

梅里亞姆先生：凡是你不喜歡的字眼，你就說是胡說八道或模糊其辭。

海耶克先生：是你認為胡說八道的。

梅里亞姆先生：我認為是胡說，沒錯，但是身為一個崇尚實際的人，我會看到本國——我指的是在美國——發生的事和在奧地利，或是在歐洲大陸，或是在英國有所不同。

克魯格先生：在我看來你書中主要的論點之一就是胡說八道。這個說法是用非常淺顯的語言所表達的：在歷史上，極權主義、特別是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並不是對歐洲集體主義潮流的反動，而是社會主義潮流不可避免的後果。我覺得這顯然是對史實的一種顛倒，我倒希望有另一種能夠讓我了解的說詞。

梅里亞姆先生：以有限的詞句。

海耶克先生：這是我主要的信念，也是該書的主旨。之所以會如此，簡單說來，就是社會主義的潮流是使得政府在所有的活動中掌握愈來愈多權力的主因。在歐洲，一旦政府直接控制了大部分的社會活動，他們就必須告訴人民這些活動是用來達成什麼樣的目的。因此，他們就必須從僅僅控制我們的物質活動，進而控制我們的理想和信念。

梅里亞姆先生：為了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必須說從1899年我以柏林大學學生的身分第一次到德國起，之後又去過許多、許多次——特別是在1924、1926、1929、1930和1932年那一段時間——我所得到的印象卻剛好相反。在納粹主義的發展上最強有力的因素不是共產主義的存在，而是對共產主義的恐懼。

克魯格先生：如果我們對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之間的歷史觀察不能有一致的看法，就讓我們轉向邏輯上的論證吧！海耶克，你的論點是中央計畫必然導致集權主義。我想要對這個看法有更多的了解。

梅里亞姆先生：你所謂的「中央計畫」是什麼意見？我對這一部分有一點困惑？

克魯格先生：這是我首先要思考的事，我想跟二位一起來思考這在定義上是否可能——比方說，簡單的把計畫定義為集權主義——或是有什麼真正的邏輯在裡面，因為我看不出這本書的邏輯在哪裡。

海耶克先生：過去人們認為如果我們把事情由私人企業的手中交由政府來控制，會把事情做得更好，我所用的「中央計畫」一詞正是這個意思。這就是我對這個詞的用法。但是一旦這麼做了，就會發生這些人所沒有預見到但卻必然會發生的後果。因為政府控制了手段，所以也必然決定用這些手段要達到什麼目的。

梅里亞姆先生：原始的馬克思主義者屬無政府主義者，不是嗎？他們根本就不相信國家。

海耶克先生：他們希望最終能廢止國家，但是所提議的作法卻是透過全能的國家(omnipotence of the state)來達成，他們僅僅承諾在遙不可及的未來會廢除國家，但是卻從來不解釋要怎麼做到。

梅里亞姆先生：不過，那仍是個信條，不是嗎？

海耶克先生：馬克思主義有好幾個學派。

梅里亞姆先生：難道我們不能說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應該被當成是共產主義的先知？

海耶克先生：我懷疑蘇聯是否真的有人相信國家會徹底消失。

梅里亞姆先生：我們談的是情況的邏輯，而不是實際的事實。那是信條，不是嗎？

克魯格先生：海耶克，綜合起來你在不同的段落交互使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集權主義」、「計畫」和「集體主義」這幾個詞，你把這些詞換來換去，讓我們不禁要問您指的計畫到底是什麼意思。比方，你堅稱必須對個人的活動有所控制。

也就是說，如果要有經濟計畫，中央計畫當局必須對人民的職業選擇有所決定，廢棄職業選擇的自由，必須決定那些特定的人應該消費什麼商品和服務，消費多少數量，而且尤有進者，必然會對個人的思想和言論加以控制，甚至會控制其家庭關係。你在書中都提到了。為什麼中央計畫需要對個人的活動作此控制呢？

梅里亞姆先生：你所說的「中央計畫」並沒有包括我那種計畫。

克魯格先生：也沒有包括我那種計畫。

梅里亞姆先生：從某個觀點來看，華盛頓是中央計畫，或座落在華府由私人贊助的全國計畫協會(Nat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也是。

海耶克先生：我並沒有交互使用這些詞，克魯格，我說集體主義是可以用於許多事物的一種方法，而其他的是集體主義不同的品種。但我也說造成某些後果的，是方法，而不是人們想要達成的目的。提議以中央計畫這種方法作為組織生產的一種方式，去取代競爭，這意味著政府，或是某種中央權力機構，必須對資源加以完全控制。

梅里亞姆先生：但是如果「中央計畫」並不是那個意思，那麼，在美國自然也沒有那種意思了。

海耶克先生：我相信我對這個詞的定義和使用一直是指這種意義，而且我也相信即使在美國也有許多這種中央計畫。

梅里亞姆先生：這一點我不同意。你可否舉出一些例子？

海耶克先生：我之前就列出一些了。

梅里亞姆先生：你是指農業調整行政局，但這是憲法規定的，這並不會把我們導向到奴役之路，因為這些已經是死的了。

海耶克先生：大部分的戰爭控制都屬中央計畫，只不過是暫時而已。

梅里亞姆先生：難道你希望由選區和各郡來執行戰爭？戰爭必須中央化，不是嗎？

海耶克先生：戰時，我們都必須有些集權作風。

梅里亞姆先生：這一點你並不反對，是吧？

海耶克先生：不反對，因為你必須暫時犧牲部分的自由以保持長久的自由。

克魯格先生：為了反對將計畫作如此的定義：必須對所有個人的行動加以控制——我想向您提出，我想您也一定讀過，有許多著作中論及民主式的計畫乃建立在分權，在作決策時靠規則，而不是任意威權之使用，並奠基在以維護民主政治的過程作為人民控制政府官員的重要手段。但是你似乎把這些都忽略掉了。比方說，你堅稱計畫和法治(rule of law)是不相容的。

梅里亞姆，你是個講法治的人，對這一點有什麼看法？

梅里亞姆先生：是的，我對法治有一些了解，但是我覺得海耶克所作研究的許多缺失中，最大的缺失在他沒有考慮公共行政和管理的問題。如果我對他的了解沒錯的話，他認為任何委由行政者或經理人處理的都屬不合理。

海耶克先生：提了許多論點，但是我相信克魯格你的是最重要的。

梅里亞姆先生：我覺得我的才是最重要的。

海耶克先生：我必須先從克魯格說起。你們這些社會主義者以創新的實驗設計出取代社會主義傳統方法的替代方案，在智性上是很吸引人的。實際上，這是由於體認到我所指出的那些非常危險之事物。我認為你還不夠深入。你還沒有看出有多危險。你所提出的修正方案尚未能加以避免，但是，至少你已經看出危險的端倪。

不過，我的論點是，我一直在討論的是決定我們目前發展的那種社會主義，而不是那種加起來不過短短五年歷史，且已在十幾篇論文和知名期刊上廣被討論，但甚至連作者對其實用性都存疑的冥想性(speculative)社會主義。

梅里亞姆先生：你所討論的是什麼？我有點困惑。克魯格，你知不知道或了不了解他在說什麼？

克魯格先生：我想他只是排斥所有提及如何以民主的方式來進行計畫這項問題的智慧結晶，因為他堅持一個定義：計畫就是不民主的。

梅里亞姆先生：他是要把我們逐出圈外，就定義上來看，我敢說他的定義僅是定義。

海耶克先生：五年前或甚至十年前我就用了這個定義，我所認識的所有社會主義份子都這麼用，所有社會主義份子都認為計畫可以在民主體制下發揮效用。現在你我都得到一個結論：所有關於政府主導經濟的舊觀念，在民主的體制中都無法實現。我在此總結說這適用於所有的社會主義。有鑑於此，現在你們設計出一種你們覺得可以避免這類問題的新型社會主義。我是抱持著最大的興趣來看這些實驗的。

梅里亞姆先生：那麼，我實在不知道為什麼你能確定在一種你說還沒有試過的體制下，不能有民主的狀況？

海耶克先生：你們的控制方法可能全然不同，我完全贊成進行開創和實驗。

梅里亞姆先生：我想我們比你對民主更有信心。從你書上的某些篇章，我可以這麼說。

克魯格先生：讓我把這個論點稍往前推。海耶克，你堅稱任何的計畫都和法治不相容。並且在一個小註上提到不接受任何具有民主本質或性格的社會主義計畫的想法。您似乎不相信政治程序中有什麼能讓政府對人民負責的方法。這真的是你的立場？您是否不相信政治程序是建立責任制的一種方法。

海耶克先生：如果你對中央計畫的用法和我一致——政府指導生產——那麼，我相當確定這是無法由民主程序來有效控制的。這需要人民之間達成某種程度的協議，這我們卻無法期望會發生在自由社會裡。這需要能讓人們意見一致的方法，否則就永遠得不到民主的監督。

梅里亞姆先生：在「為什麼不肖者會出頭」(Why the Worst Get on Top)這一章裡，您似乎對民主社會大有作為的能力表現出沈重的懷疑。比方，你說愈是聰明的人，就愈不可能意見一致。果真如此，那麼便失去我們施教的意義了。

海耶克先生：我是說像梅里亞姆你這樣的人很可能賦予民主本身所無

法完成的工作，因此很可能毀了民主。

梅里亞姆先生：你以為那是我的觀點。我的論點是，那就是民主的形成，而民主的弱點是由於人們聽從你的判斷——某些人認為這是你的判斷——所造成的。

海耶克先生：這就是我們不同之處。

克魯格先生：海耶克，我跟你一樣對全能的(all-powerful)國家感到懷疑。

梅里亞姆先生：你所謂「全能的」國家是什麼意思？

克魯格先生：我是套用他的說法，他每一章都用到「全」(all)、「全面」(comprehensive)這些字眼。

梅里亞姆先生：沒有任何國家是全能的。

克魯格先生：我並不想以發展集權國家來擺脫十九世紀經濟動能往私人集中的情況，但是，海耶克如果你真的對此感興趣，我覺得你可能會對改善政治程序感興趣，透過這個程序人民和政府建立某種連繫。但是你卻說，我引你的話：「對於個人道德選擇似乎愈來愈弱的代議士定期選舉，並不是試鍊其道德價值的好機會。」我覺得除非政治程序能成為考驗道德價值的時機，否則必然會有大麻煩。

海耶克先生：如果斷章取義，是會誤導別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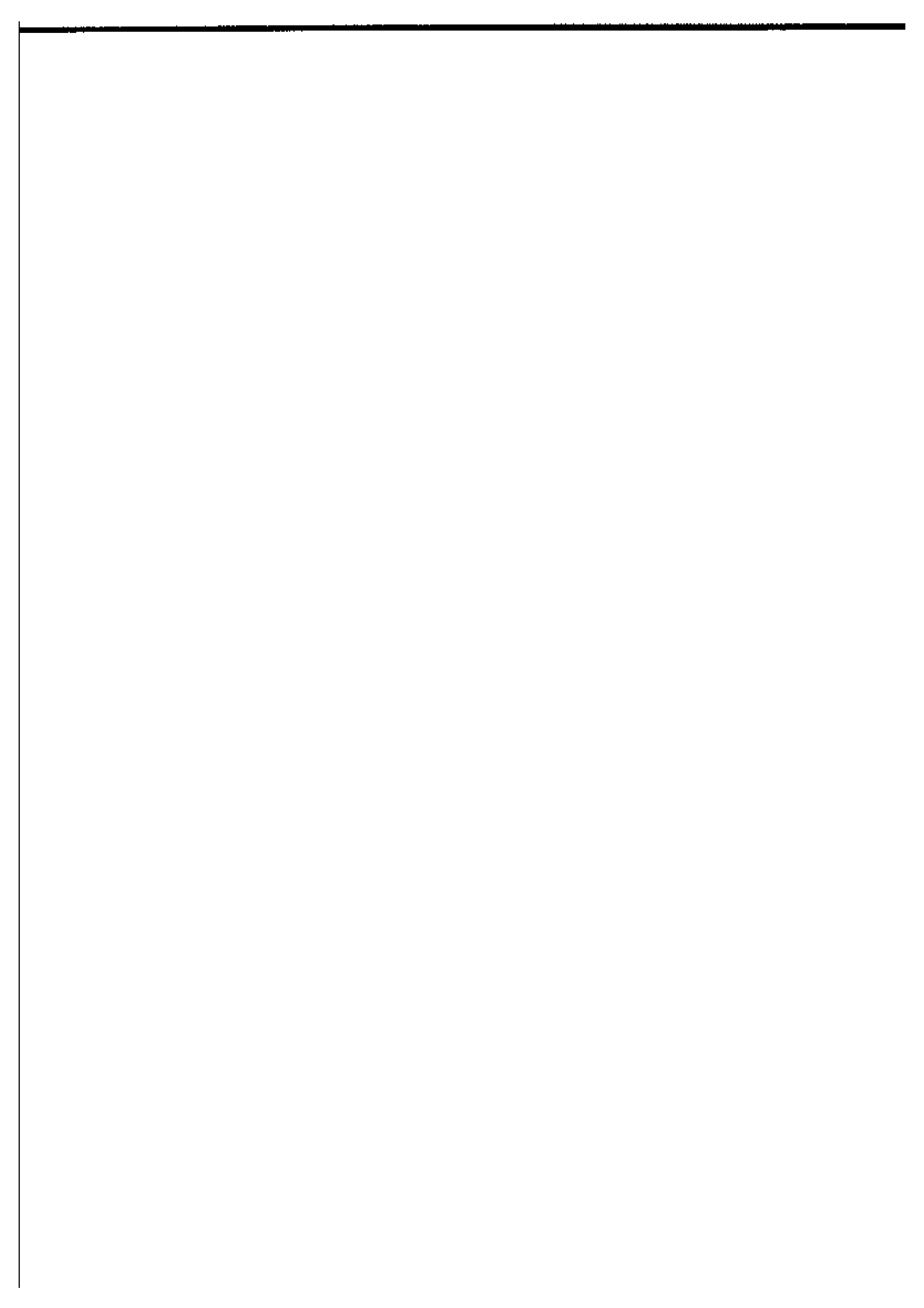
克魯格先生：我建議我們每一個人都來作個結論，為聽眾澄清我們在

這個問題上的基本立場。

梅里亞姆先生：我發現現代的趨勢是走向自由——自由在人類歷史上以現在是最受重視了。農奴制度和奴隸都已遠離我們，而不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命運。戰爭和失業這兩大人類的詛咒已逐漸為人類所唾棄，民主的努力帶來了公私企業的興起，以及政府、商業、勞工、農業和教會的創造力。

克魯格先生：如果你非把計畫定義成集權不可，那麼便沒辦法使其成為民主，但是計畫可以和維持程序規則相容，因為後者限制了權宜措施的權利。自由、平等和安全都可以結合在一起，但為了達到這個境界，我想必須放棄或限制某些自由。其中有私有化自由與控制他人生活所賴之手段以求取利潤的自由。與其用道德來限制個人行為必須走正軌，倒不如讓道德原則進入政治程序，並透過政治活動和政黨來運作。不然的話自由只是空泛之辭。

海耶克先生：我不會聽了你一席話而有所動搖。你看你所說的依然是個古老的爭議——國家應該是大有所為或是無為而治。我整本書的目的就是要以新的區分來取代舊有模糊而愚蠢的觀念。我已經意識到有些政府的行為是非常危險的。因此我全副心力是在區分合法的和不法的行為。而我所嘗試的作法是說只要政府的計畫是有利於競爭或是在競爭使不上力時政府介入，都不予反對；但我相信所有其他形式的政府活動都是高度危險的。



第四部
芝加哥-佛萊堡

大戰之後，1949年之前，我到美國爲期最久的一次訪問是在1946年的春天和初夏那段時間，當時我接連在芝加哥大學和史丹福(Stanford University)大學各停留兩個月。那段時間是我多年來第一次有比較多的閒暇時間可以認真地重拾我在超過二十五年以前開始進行的有關心理方面的研究，最後出版了《感官秩序》。

第一次訪問[即1945年的演講旅行]之後，有一筆可觀的財源誘使我多從事半通俗性的寫作和演說，而且我有一些朋友也強力鼓勵我留下並坐享其成。各種機會多的是，但我要嘛覺得這份工作沒有吸引力，要嘛覺得自己可能沒有辦法得心應手。事實上，我覺得這類通俗的演說和寫作會腐蝕一個人之思維，而且如果我堅守學術活動，終究我會爲我所關心的政治理想盡更多的心力。但我確曾發揮了一些實質的影響，同時也賺了一筆不少的外快，使我覺得自己大可遠離俗慮度個完全的假期，並暫時把精力花在抽象的問題上。如此一來我一些左派的朋友(非常無禮地)讓我了解到在他們看來我已經不再是個科學家，反倒成了個宣傳家，也曾令我感到痛心。總之，我決定暫時全然不顧別人對我的期望，而只去做當時自己最感興趣的事，以盡責作爲對自己

的報酬。這工作是我對理論心理學方面的一些舊想法，是大戰前幾年因從事有關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而重新活躍起來。

我永遠不會想到要離開英國，特別是如果我能繼續住在劍橋，我是一定不會要走的，[雖然]我的確開始感到在倫敦經濟學院這種高度專業化的機構氣氛有點狹隘，而且因爲長距離的通勤和晚上的教學，在那裡工作實在是愈來愈累人。我打一開始接受芝加哥的工作[1950年時]純粹是因爲這份優渥的待遇使我能夠完成我嚮往已久，但因大戰而被迫拖延了好多年的離婚和再婚。實際上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潮委員會的職位提供了我幾乎是完全理想的機會，可以去追求我漸漸發展出來的新興趣。身爲社會科學和道德科學的教授，我在那裡可以專心於幾乎是任何我在意的題目，而且我要教多少課也由自己決定。說起來，我有點變得是名不合時宜的經濟學人，而且對經濟學發展的方向非常不認同。雖然我還是認爲我在1940年代有關科學方法、思想史和政治理論方面所作的研究不過是暫時涉足其他領域，但是卻發現很難再回到經濟理論的系統教學，因此，在教學負擔上不用被迫這麼做著實是一種解脫。

問者6：沃爾科爾基金(Volker Fund)和您[1950年]到美國不是有一些關係嗎？

海耶克：[1945年]演說旅行——這也是我說這個故事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在底特律(Detroit)的經濟俱樂部(Economic Club)。當時總部是設在芝加哥大學的四角俱樂部(Quadrangle Club)，因為幕後主其事者是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日常事務全由全國的演奏和藝術家組織來

照應。底特律的那場演講非常成功。第二天早上，或是第三天，回到芝加哥之後，有一位男士出現在我的俱樂部，對我說：「教授，我不會花您很多時間，不過像《到奴役之路》這樣一本書也應該以美國為例，您是否可以做這件事？」

「我不知道。」

「是不是可以做呢？」

「嗯，我想如果挑對了人，是可以做的。」

「要花多少錢呢？」

「我不太清楚美國的行情，但是我想大概是一年一萬美金【合現價為六萬美元】，連續三年，就可以成書。」

「錢是您的。」

那就是盧諾(Harold W. Luhnow)先生。我並沒有很認真地看待這件事。但是我和在芝加哥的好友賽蒙斯(Henry Simons)就此事有過長談，中間有些複雜，但是最後我必須返回英國。我在途中只好向盧諾回報我無能為力。

他的回電是：「可否請你自提條件回來做這件事？」

「不要你付錢。如果你能安排一所大學邀請我做訪問教授，也許我有辦法兼顧這件事。」

「你喜歡哪些大學？」

你知道嗎，這都是以電報往返。我說：「芝加哥。」我在那裡開始和賽蒙斯談起這件事的，然後我提到我還沒有去過西岸，我提到史丹福也行。三個星期之內我收到三所大學校長的邀請函，後來的安排是一學期中分別在芝加哥和史丹福兩處授課。

問者6：產生美國版的《到奴役之路》的計畫是什麼？

海耶克：我幾乎要說服賽蒙斯接下這份工作，條件是當時在華盛頓工作的達瑞克特(Aaron Director)能夠加入和他一起做。

問者6：這是在芝加哥吧？達瑞克特是弗利曼(Milton Friedman)的連襟？

海耶克：沒錯。他原來是在芝加哥，戰時在華盛頓工作，當我和賽蒙斯商量時，達瑞克特人還在華盛頓。但事情告吹，先是達瑞克特拒絕接受協助賽蒙斯的工作。後來又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在我前往史丹福進一步地作些努力之後，賽蒙斯突然過世了。反正，達瑞克特反倒因此而覺得應該以摯友的身分來繼續原先他不願意和賽蒙斯一起做的事。於是，達瑞克特就拿了沃爾科爾的錢到芝加哥去，任務是為美國寫一本「到奴役之路」，不過他一直沒有寫出來。這便是我和盧諾接觸的開始。此後，除了參加一些他所召集的討論會，我和他便沒有更進一步的直接交往，不過我有理由懷疑，稍後，蕭夫開始想要說服哈欽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邀我到芝加哥去是他幫的忙。原先是讓我到經濟系去，但是他們把我刷下來。

……不管背後是誰，要我前往芝加哥大學的決心不變，並且努力方向由經濟系轉到社會思潮委員會。這對我終究是更具吸引力的，因為教了二十年的經濟理論之後，我已經有一點倦怠，而社會思潮委員會的邀聘顯出我可以講授任何與社會科學沾上邊的主題，尤其是如果什麼時候我不想開課也不勉強。這一點，再加上相當高的薪水，實在令人難以抗拒。因此，我就去了芝加哥。

《科學的反革命》中有關思想史的那幾章，也就是1940年寫於倫敦論聖–西蒙學派和孔德的那些論文，是對我一直感興趣的領域所作出的最大膽嘗試。這是我在不同時期對好幾位經濟學家傳記背景的描繪(戈森〔Hermann Gossen〕，威澤，坎地龍〔Richard Cantillon〕，孟格，特別是桑頓那一篇是這些論文中我最喜歡的)。不過，我對聖–西蒙學派的研究竟使我不知不覺投注了大量時間在米爾身上，由於米爾實際上並沒有特別吸引我，我卻意外得到最知名的米爾專家之一的聲譽。之所以產生這樣的結果，是由於我在追溯聖–西蒙學派對英國的影響時，注意到此一議題在米爾的來往信函中所占的份量，許多可以對此事提供線索的重要信件，不是散佈在眾多的刊物——而且通常還是放在很難找的地方——不然就是只以手稿的形式存在。

瀏覽了現成沒有出版的書信，顯示了此類材料實在蘊含了豐富的寶藏，其中特別引人的是米爾和他後來的妻子之書信，所以我就開始有系統地收集、甚至出版這最有趣的材料。我看到這些資料剛好是在戰時，當時既有閒暇而又有一位合適但平時僱不起的助理(博希博士〔Dr. Bosch〕)，使我比原先預想的更加深入這個計畫。不過在刊行了米爾和泰勒之間的書信[1951]，並且把我所有的材料交出為米爾成功作傳的傳記家帕克(Michael Packe)來處理後，我把收集得來所有米爾書信的手稿交付給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的邁尼卡(Francis Mineka)博士，因為我相信他所做的編輯工作會比我做的好得多。

我對米爾的研究工作產生了一項未曾預見、但是非常讓人高興的果實。我在編輯他和其妻的書信時，必須省略大部分米爾在1854年冬到1855年春，因為健康的理由至義大利和希臘旅行途中寫給她的長信。我突然想到為了給這些書信集出個全註版本，在整整一百年後，重複

這次的旅程應該是很有趣的，我成功地說服了古根罕基金會給我一大筆津貼來支助這次旅行，因此我和內人才得以花上七個月的快樂時光乘車旅行，先是穿越法國的西部和南部，越過義大利，最南行至那普勒斯(Naples)，然後幾乎繞遍西西里(Sicily)，行至柯夫(Corfu)和雅典(Athens)，並以雅典爲中心造訪幽柏衣(Euboea)、達菲(Delphi)和大半個裴洛波里色斯島(Peloponnesus)。因爲我們是乘汽車旅行，當然要比米爾有時候連火車都沒得搭要來得快，而且一般說來，雖然我們盡量以米爾造訪的日期到達各地，我們還是節省了足夠的時間可以從那普勒斯繞道埃及發表論「法治的政治理想」的演說，這是應埃及銀行(Bank of Egypt)之邀而作的。

這演講再加上時常縈繞在我心裡有關米爾的想法，使得我們在1955年秋回到芝加哥之後，《自由的經緯》的寫作計畫突然清晰地呈現在心裡。不過，我還要說一個與此有關的故事。米爾在他的《自傳》(*Autobiography*)中描寫他那本《論自由》(*On Liberty*)一書的概念是如何在他步上羅馬國會的階梯時浮現出來。然而在百年後的同一天我重複這項行動時，卻沒有什麼靈感。但是後來我注意到，實在不應該有這樣的期望，因爲米爾撒了個小謊：從書信中可以看出寫作此書的想法早在他到羅馬之前就已經有了。然而，在我結束旅行不久之後，我便有了以開羅(Cairo)演講題材爲主軸，寫一本討論自由的書之清楚計畫。往後的三年，我每年寫《自由的經緯》其中一部的草稿，而在1958至1959年的冬天全部修訂一遍，所以我才能在1959年5月8日我六十歲生日那天將完稿交給美國的出版商。(書的印刷完成於1959年12月，但是正式的出版日期是1960年2月9日。)

1960年5月《自由的經緯》問世之後不久，我開始患了嚴重的憂鬱

症，歷時整整一年。我稍後把它歸咎於我戒煙的反應(這是我牙醫發現我的上顎有一處潰爛而引起的錯誤示警)，而一年後我又開始抽煙斗，症狀真的幾乎馬上就消失了。但現在我比較傾向於認爲這是我目前[1972年3月]忍受了幾乎有兩年[持續至1974年獲頒諾貝爾獎之前]同一類憂鬱症的早期發病。第一次發病結束於1961年的春天，這段時期我們是在查洛德斯維爾(Charlottesville)的維琴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度過的，這一次旅行大部分的時間都籠罩在這憂鬱症的陰影中。

我愈來愈相信原來在1969年只是初期的心律不正，到了1970年代早期變成那麼糟糕的情況，主要是因爲我個人非常看重而且做人很好的薩爾茲堡醫生將我誤診爲糖尿病，他開給我的藥使我血糖過低，這便是我所稱的「內在顫抖」(inner trembling)狀態的主因，這也使得我無法進行智性活動，後來我才知道我發明的這種描述就是醫生們所熟知的血糖太低之症候。這樣的解釋所要說明的是，即使在我不再服那種藥物之後，我的血糖值還是在低標準，我相信這樣的人是不太可能有糖尿病的，雖然這也可能與我的體重由八十九公斤左右降到七十公斤多一點有關。

雖然我對芝加哥大學所提供的智性環境樂在其中，但是我在美國一直沒有像在英國那樣賓至如歸之感。而且我也非常擔心我的職位所要求的一般說來算是相當早的退休年齡(六十五歲)，會使我和我的妻子晚年無法生活無虞。因此1961年至1962年冬我意外地接獲位於貝雷斯高的佛萊堡大學之教授聘書，不僅可以延長三年的教學生涯，而且可以獲得對我來說還不錯的養老年金，我便毫不猶豫地應聘，而且從

來沒有後悔過。我們在那裡度過的八年，從許多方面來看都是非常令人滿意的。我再次成爲經濟學家，但是能夠專注於經濟政策問題的教學，我覺得我在這方面依然還有一些見地。我們算是幸運能夠找到一間很不錯的公寓，特別是能夠享受黑森林(Black Forest)的美麗環境。

我在佛萊堡的時期幾乎到最後都還能保持充沛的精力和健康，工作能力也絲毫未減，實在是件值得稱幸的事。雖然我年過七十以後，精力開始明顯衰退，而且那些年來大部分時間所從事的研究工作還沒有完成，但是大致說來，那幾年的成果非常豐碩。那幾年我們也比以前更常旅行——到過日本四次(還順道往訪台灣和印尼)，最後在洛杉磯的加州大學待了五個月，回程曾飛往南太平洋(South Pacific)(大溪地〔Tahiti〕、斐濟〔Fiji〕、新喀里多尼亞〔New Caledonia〕、雪梨〔Sydney〕和錫蘭〔Ceylon〕)。

我在佛萊堡安定下來之後，馬上著手後來變成一本巨著討論法律、立法和自由[《法律、立法和自由》(*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三冊，1973-1979)]的寫作計畫，這是希望作爲《自由的經緯》的一種補充。我在佛萊堡時期大部分發表的論著都是這項工作的衍生物，八年後當我們離開佛萊堡時，我已經完成了相當長的手稿(除了結論那一章還沒寫)，雖然我仍相信其中有些重要的想法，但是我認爲以其目前的表達方式並不適合出版。

問者5：我記得你曾經跟我說過一個計畫，如果我記得沒錯，是要獲得福特基金會的支援來重建維也納大學，時間是在1950年代。

海耶克：是的，重建其傳統。我的想法是要創造出類似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的機構，把依然活躍的難民召回維也納，比如施羅丁格和波柏——噢，我是有一份很棒的名單！我想如果能夠得到資助，我們應該能夠創造出一個很棒的中心。但是後來的結果是產生了目前在維也納的福特研究所(Ford Institute)，完全致力於數學、經濟學和統計學的研究，我對這一點並沒有特別贊成。我想計畫的失敗絕對不是因為維也納大學對這樣一個構想沒有展現熱誠。

《到奴役之路》的轟動所產生的主要好處之一是，經由本書而來的各種演說旅行或藉由通訊，我得以和一些與書中舉出的課題抱有同樣想法的人接觸，遠比我所想像的人數來得多。我發現不僅在美國，同時在歐陸好幾個國家中也存在著一些個人或小團體依然保存著偉大自由的傳統，但是為了重振或維護這一傳統，卻和在倫敦經濟學院的我們那小團體一樣感到孤立，在這個小團體中不只我的密友羅賓斯，還有好幾個其他的同事，如普蘭特、佩許和賓漢，他們的觀點基本上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

我發現和各地志同道合的人討論使我備受啓發——如賽蒙斯和他的芝加哥幫，日內瓦的洛卜克(Wilhelm Röpke)，以及由尤克肯(Walter Eucken)所領導的德國幫——因此我漸興起一種想法，希望能把這些人湊在一起成為一個國際團體，來討論他們努力喚起自由傳統所引起的問題。我覺得只有在團體裡面成員都有同樣基本的想法，這些問題的討論才可能有結果，而且因為每個人都朝著不同方向來推展背後的理想，因此我們有很多可以彼此學習之處，且在其他許多方面，我們大部分人都無可避免地必須要接受一些和自由原則實在不相容的流行想法。

雖然緊接著戰後那幾年，我對這個計畫想得很多，也說了不少，但是要不是我在瑞士碰到一位非常能幹的組織人才把我的計畫付諸實行，這可能仍只是個夢想。蘇黎士有位叫作洪納德(Albert Hunold)博士的人募了一些款讓洛卜克能夠推動發行一份自由主義的季刊，但是因為他們之間有一些摩擦，使得這個計畫變得行不通。但是洪納德博士取得捐贈者和洛卜克的同意，將已經在瑞士收齊的錢用來資助我所提議的討論會。在我成功地從美國一位喜愛《到奴役之路》的讀者募到一些額外的資金後，安排此一會議在1947年春召開就變為可行，我對參與的成員和議程有決定權，而所有籌備的工作則由洪納德博士負責。在日內瓦湖(Lake of Geneva)，危微(Vevey)上的蒙貝勒蘭(Mont Pèlerin)所舉行的十天會議，有來自美國、英國和好幾個歐陸國家的三十六名學者和政論家共襄盛舉，會議開得非常成功，以致決議變成一個永久性的學會，並以第一次會議開會地名來稱之。

往後的十二年，我一直是學會的理事長，這期間會員人數快速增加，我在洪納德博士的協助下，幾乎每年都安排在不同的地方開會，對此我要感謝許多朋友和許多新的想法。所有的組織連絡工作，我全仰仗著洪納德博士，但是後來洪納德博士有了世俗的野心，終於使得合作不可能，因此我發現必須堅持我們兩個都退下來，讓新人來領導。比較年輕的會員自動自發來做這件事，經過一兩年的關鍵時期，學會又恢復其活動，而且經過快二十五年之後，依然朝氣蓬勃，有一段時期學會的理想似乎在世上漸為人所接受，而在1971年的現在又再次受到集體主義新潮流的威脅。

我常常羨慕一些人有自己的知識，能以井然有序和隨時再現的方

式來貯存知識，並且不僅能隨時重述他們學過或自己想出來的推理過程，而且能夠以他們剛認識的字眼來表達。這些人隨時有答案，他們是精明的老師，我想也會是好的作者：作為一個好作者需要能夠綜觀某一主題，並能夠經常知道他當時所處的位置是在推理的大結構中哪一點。

不過我不確定這種靠著好記性輕易掌控知識的人，是不是也會像那些在既有窠臼中不太容易邁得開心靈步伐的人那樣有原創性的貢獻。但是，至少我確信自己大部分的創意想法，是因為我對人盡皆知的問題並沒有傳統的答案，幾乎每一次我都必須痛苦地再重新思考，而在思考的過程中我通常會發現一般人所抱持的看法不是有瑕疵，就是有不足之處。

比較了自己與同事以及朋友的工作能力和方法之後，我愈來愈清楚有兩種非常不同的心態，而我則代表一種非常明顯的例子。這兩種型態主要的不同之處在於，正確的記憶或論據鏈(chains of argument)的隨時再現，在一個人的知性組成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我從記憶裡將讀過或聽過的片段予以再現的能力，實在是非常弱。即使在年輕的時候，雖然我的短期記憶相當不錯，而且凡我跟得上的論證、甚至是我聽過的故事，都可能對我的思想留下永久的影響，我卻不太能加以重述。就好像這些馬上變成合成照片(composite photograph)的一部分，給我對世界的概念添了貢獻，但卻不是我可以再度用來描述世界的那套。

我曾經有過的原創想法，其實並不是由按部就班的推理過程所產生的。有人主張所有的思考都是由文字，或一般說來由語言產生，我一直認為自己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反例。我非常確定每當我有了問題的答案，我常發現早在我能以文字表達之前，就經常「看見」答案在我

面前。其實一種符號抽象型態而非重現圖像的視覺想像，可能比文字在我心智過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相信視覺記憶強和缺乏語言記憶通常是相關的。

我一直受到合成照片(也就是好幾張不同的臉疊影所產生的結果)這種想法的吸引，這種東西以前時興過，但是我可能從來都沒有看過。不過合成照片似乎能夠代表我思維的特色——我不記得某個論點，但是好像已吸收其中的部分在自己的論點裡。要我挪用某個論點以自己的語氣再現，要費很大的勁，如果主題是我全然不知道的可能最爲容易，但要是我自己已經想過的問題，那就幾乎不可能。但是，即使在研究一項新的科目，讀第一本教科書的心得也會是非常的模糊不清楚。而且我通常不喜歡重複使用相同的教科書，而喜歡讀別的同一科目的教科書。漸漸地，事情就會清楚起來，而我會要求爲大部分適切的問題由我自己的思維找出答案，我對我整個思維的存量並沒有清楚的輪廓，也不會對同一個主題給予兩次相同的詮釋。

大概在我要搬去劍橋的時候，特別是和國王學院的高桌新夥伴在一起的時候，我會因爲跟不上別人英語談話而感到相當沮喪。直到戰後我重訪德語系國家，才發現不是我對英語的了解而是我的聽力大爲惡化。我的左耳早就聾了(我想是戰時砲彈爆炸所造成的結果，但是醫生說是童年感染的影響)，但是到了四十多歲我另一隻耳朵的聽力一直好得足以彌補這個缺憾。從此之後，聽力的喪失大大剝奪我參與社交活動的樂趣，而且幾乎無法再上劇院；我曾經有一段時間上劇院，這是我經常性的娛樂之一。雖然並沒有像我一度害怕的那麼糟，但是我之所以看起來比真實的我更加不愛交際，很大部分是因爲這個原因。

也是在劍橋那幾年，我可以盡情地陶醉於收藏經濟學舊書的嗜好。我在維也納時就開始有這個嗜好，最初是與我計畫寫貨幣理論和政策史有關，我於1939年將這份特別的收藏賣給位於巴斯里的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以籌措我當時買房子的頭期款。1930年代前往牛津、劍橋和愛丁堡(Edinburgh)，還有其他一些邀我講學的省份，使我有相當多的機會可以收藏十八和十九世紀的著作，雖然我沒有辦法與幾代以前的大收藏家相比，但是我相信我最終的收藏(1969年賣給薩爾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Salzburg〕)和我這一代的人所能收藏的比起來一點也不差。我一直藉著書目的採購來不斷地增加藏書，但是戰後書的來源卻乾涸了(或至少是貴得驚人)，剛開始我主要的收藏都是英國的作品，後來我從維也納老一輩的同僚沙姆斯的遺孀處購得一批法國十八世紀很不錯的經濟文獻，使我的收藏比較平衡。

除了登山和滑雪這些運動，還有早年在奧地利時對家族歷史的興趣，很不幸地我並沒有發展其他的嗜好，現在我老了，感到很後悔。

問者6：對你而言，登山豈非不止於一種嗜好而已？

海耶克：可能是這有助於增進我對十九世紀英國學術氣氛的了解。學術工作和登山是如此配適得宜，就像斯蒂芬所寫有關登山的書裡所提到的。就我的情形而言，登山是和植物學有關的。我熟悉英國的登山文學，這有助我融入英國的環境。

問者6：登山使你和經濟學家庇古相識，不是嗎？

海耶克：戰時我們都在劍橋，他教基礎經濟學課程，我教高級班，但

是後來我看了某本迪肯(Richard Deacon)——這是筆名——寫的書，我才想到為什麼庇古會突然地對我感興趣。迪肯說庇古對能跨越藩籬的人感興趣。我已經忘了1939年時，我想去奧地利，但是又不想被人懷疑德國人給了我什麼特別的好處，這件事的詳情。其實，我是要去看我現在的妻子。之後庇古馬上就對我發生興趣，他對我突然感興趣和突然掉頭不理(在他邀請我去湖區和他一起住，一同登山之後)其間的對比完全吻合迪肯的說法，但是最晚在1939年的7月或8月，雖然明明知道戰爭隨時可能爆發，但還是非常確定自己可以冒險到奧地利去。那些山我非常熟悉，我可以走得出去。

問者6：你的計畫是爬過卡林希亞(Carinthia)的山區？

海耶克：我對那片地方比對沃納伯格(Vorarlberg)–瑞士交界區域還要來得熟悉。西邊靠瑞士那邊的山是近代冰河山，一個人去可能會有一點困難。不過那個地區我有很多朋友。

雖然我已經成爲別人所能認同的純學者，而且現在我也不會想要另一種生活型態。但這原不是我所期望或是認爲最適合我的。有相當程度是因爲居住在異國，大多時間都是身爲異客，比我的大多數朋友更不熟悉日常生活的事務。這種外在環境使我完全無法實際參與大眾生活，即使身爲學者，也令我遠離科研的具體實證而必須致力於更抽象的層面，但是也只有在這方面我才能比朋友占優勢。要是我一直留在祖國，或者在我完全被同化之後繼續留在英國(會有此後果主要是因爲經歷了戰時的英國，我所有的同情都是在英國這一邊)，我很確定

定會被捲進大眾和政治活動或是行政工作。行政工作我倒不是真的很在意，雖然我認為自己不擅此道也不完全是真的。因為，如果真的有需要，我相信我至少能夠勝任自己的職責。

我相信我比大部分其他的人更能將思想完全朝向未來，我時常清晰地認識這點。我似乎很早就喪失安享眼下的能力，而生活之所以吸引我，是我對未來的規畫，滿足主要是實現了我的規畫，而難過主要是因為無法履行規畫，因為我並沒有太大的野心，也沒有高估自己的能力，只要我有確定的工作要做，我通常能成功，而且我對一生大部分的時間，感到相當滿意。

問者5：你寫了一本心理學的書，我記得那本書［《感官秩序》］。

海耶克：我還是認為這是我對知識較為重要的貢獻之一。有趣的是，心理學家們現在發現這一點了。

問者5：沒錯，去年一年或前後我看過有些人引用。

海耶克：這本書是二十五年前寫的，而觀念則是五十多年前就有的。

問者5：或許請你大概說一下那個觀念？

海耶克：我想真正重要的，而在最先有了這種想法卻不能做的，是把我想要回答的問題，而不是我想要的答案，加以公式化。這個問題是：決定不同感官品質之間的差異是什麼？我是嘗試想要化約成因果關聯，或者你也可以說是因果聯想的系統，其中某一特定感覺的品質——比方說藍色的屬性或其他什麼都可以——其實是其在導致行動的潛在

關聯系統中的位置。

理論上，你可以複製一張圖，顯示一種刺激如何喚起其他的刺激，然後再喚起進一步的刺激，原則上可以複製所有的心智過程。我說「原則上」，是因為這太複雜所以根本做不出來。這個想法使我無意間發現原則的解釋和細節的解釋之間的差別，我現在知道這種差別叫作類型預測(pattern prediction)，這原先是從我在心理學的研究工作中發展出來，後來應用到經濟學上。

問者5：沒錯，我想類型預測是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是大部分的經濟學家依然欠缺這項概念。

海耶克：這理論的整個問題完全是在我們並不真具備準確預測的能力下，我們對複雜現象的解釋能到什麼程度。我們並不知道任何的法則，但是我們的全部知識，基本上就是一種類型的知識。

※ ※ ※

問者6：您不是曾經提過施羅丁格和《感官秩序》有關？

海耶克：大出我意料之外，他似乎是位完全了解《感官秩序》的人。不過當然是因爲他也研究這種問題。在施羅丁格是位預科生(Gymnasiast)時，我就認識他了。他的父親是位業餘的植物學家和工業家。老施羅丁格是我父親圈子裡的成員，定期在我們家聚會。有時候年輕的施羅丁格也一起來，他大概比我大個五六歲。後來不用說他就搬到倫敦去了。

※ ※ ※

問者6：我認為你是康德知性傳統和康德運動的人。米塞斯也說他是，

他的用語顯示他是這個傳統的人，但是你們兩個對認識論(epistemology)卻有不同的意見。這件事曾經困擾我。大致看來，你們兩個都是康德主義者(Kantian)，但是你叫他為功利主義者(utilitarian)。你要如何分別這兩個傳統？

海耶克：說來話長。你知道格雷(John Gray)寫了一本有關我的書［《海耶克論自由》(*Hayek on Liberty*, 1984)］。他當然把我說成是康德主義者。第一我想說：「你誇大康德對我的影響，我從來沒有仔細地研究過康德。」不過事實上在我大概二十或二十一歲這個關鍵的年齡，我被當代康德主義者一位名叫里爾其作品所吸引，他寫了一本很棒的論批評的書，以及兩本半通俗的導論。我想我所知道的康德哲學大部分是來自一位康德主義者。於是，我先是跟格雷說我對康德的直接了解實在太少，不足當此厚譽，但是我必須承認我間接受到相當大的影響。

問者6：以你的觀點你不是個功利主義者。

海耶克：現在當然不是。首先我想是米塞斯讓我熟悉功利主義的，早年我也讀了很多。實際上多到我在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研讀邊沁(Jeremy Bentham)的文章時，發現邊沁原來是個很好的經濟學家，在貨幣理論方面有非常卓越的研究。

那時我開始緊鑼密鼓地整理邊沁雜亂無章的論文。不過，大學學院的第一屆邊沁委員會，也就是我發起的那一屆，在戰時解散，事情於是告吹，後來在我離開倫敦之後，才確實著手編排。如果我還留在倫敦，毫無疑問地，大學學院會要我再加入繼續這件事，但是那時候我已經到美國去了。我對邊沁文集沒出過力，而且之後我也變得相當

懷疑，因為我非常清楚邊沁受到法國十八世紀傳統比英國、或者應該說是蘇格蘭的影響要大得多——

問者6：您指的是蘇格蘭的理性主義者。

海耶克：我發現了蘇格蘭人，並且發現我觀念的根源是在佛格森和蘇格蘭人，該傳統和邊沁傳統之間有著明顯的衝突。而且經由我對米爾多年的研究，實際上動搖了我對曾經認為是偉大人物的仰慕，結果我現在對米爾的看法也是非常批判性的。

※ ※ ※

問者6：可否請你說一下演化源自人性這種理論的主張？

海耶克：演化觀念的模型在十九世紀初之為人所知曉，是瓊斯爵士發現了印歐語言(Indo-European languages)的關聯。那時起大家都注意社會演化的過程。

問者6：我以前沒有聽過這種說法。我知道語言學就從那時候開始，但是沒有想到這層關係。

海耶克：達爾文同時期的語言學家說：「噢，我們早在達爾文之前就是達爾文主義者了。」但我想這點從未被披露過。可是顯然你可完整地敘述從一種原型向不同類型的演化。

問者6：有沒有人以巴貝爾塔(Tower of Babel)或是聖經的權威來向瓊斯挑戰？

海耶克：我想神學家並不關心。並沒有像神學家反對達爾文的立場那樣。

※ ※ ※

海耶克：我漸漸成了一個柏克式維新黨人。

問者6：這是個不錯的組合。

海耶克：我只是假設，我想柏克(Edmund Burke)基本上是個維新黨人，而且我想史密斯也是。奇怪的是，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夫人——我確定我還沒有跟她說過。上次我見到她的時候她用了一個句子：「我知道你希望我變成一個維新黨人，不過不是，我是個保守主義者。」因此，已明顯感覺出來。

※ ※ ※

問者2：你就資本理論寫了一本非常艱深的書[《純粹資本理論》，1948]，依我看是很難懂。你在那本書想要傳遞什麼訊息？

海耶克：簡單地說，我認為雖然龐巴衛克基本上是對的，但是他以生產平均週期闡述實在太過簡化，以致於在應用上會有誤導。如果我們要把龐巴衛克的觀念想得透徹，必須引進更複雜的假設。但是如此一來，事情就會變得太過複雜，幾乎不可能做下去。

問者2：你著手進行的時候有沒有想過這件工作會變得這麼複雜？

海耶克：沒有，沒有。我實在沒有想到。我是漸漸了解到，如果不能用簡單的形式以簡單的平均生產週期來代替投資週期的範圍，那麼整體的風貌必然會改變。平均生產週期是顯示一項原則的第一種模型，

但幾乎無法應用到實際的情況。當然現存的資本從來沒有以一組特定的期望為基礎來穩定增加，而是不斷地將所累積的真實資本資產重複用在無法預見的新目的上。因此，動態過程看起來非常不同。

我想從我作的研究中得到最有用的結論其實是在拉赫曼(Ludwig Lachmann)論資本的書上。我想，就跟許多事情一樣，我在經濟學上的嘗試，比如這項資本理論研究工作，顯示的是我們距離有效解釋尚有不少障礙，而不是要提出什麼正確的解釋。我所強調的這些事——如一般現象的複雜性，資料不可知的特性等諸如此類——其實是在指出我們可用知識的限制，而不是我們使得特定的預測變為可能之貢獻。

這剛好也正是我的看法不受人歡迎的另一原因：這個時期流行的科學方法的觀念，重視所有以專門預測為基礎之科學領域。這正是這些人之所長，而現在卻有人指出，經濟學所能作的專門預測其實非常有限，而且最多只能作到有時候我稱為類型預測，或是原則的預測而已。這些觀點在那些習慣於物理學或化學之單純的人看來非常令人失望，且根本就不算是科學。就他們那種看法，科學的目的是專門預測，最好是可以用數學來驗證，但卻被指出，如果把這個原則應用到複雜的現象，將無法得到這項結果。這對他們而言，幾乎就是要否定科學的可能性。當然，我真正要說的是，一旦我們由簡單現象的科學過渡到複雜現象的科學，科學所能達到的目的一定會大受局限。而且人們也討厭我把物理學稱作一門簡單現象的科學，這有部分實在是個誤解，因為物理學理論最後是以非常簡單的方程式來表達。但你必須將理論應用在上面的活躍現象可能相當複雜，這是兩回事。物理學理論的模型實在是非常簡單。

至於機率的領域，又是另一個問題。但是，在我們社會科學的這

個中間領域，必須加以考慮的元素既不是少得你可以全部知道，也不是多到你可以用機率來替代新的訊息。中間現象領域是很困難的。這是我們在生物學和社會科學都必須處理的領域。這是複雜的。我想這已經成為我們所能獲致預測之特定性的絕對障礙。除非人們自己悟出自己無法達到這些目的，否則就會頑固地不斷嘗試。他們會想，要是有人不相信可以達到這種特定性，不過是因為自己是過氣及不了解現代科學。

問者2：希克斯寫過你，我想要引用他的話：「如果要對1930年代的經濟分析史下定論，這齣大戲——這真是一齣大戲——的一位主要角色將會是海耶克教授。有一段時間海耶克的新理論與凱因斯新理論是棋逢敵手。」你覺得是什麼原因使你的理論沒有像凱因斯的理論一樣為人所接受？

海耶克：這可分兩方面來說。其一，雖然凱因斯生前備受爭議，但是死後則被升格至聖界。部分原因是凱因斯本人非常願意改變他的意見，他的學生流傳一句口頭禪：你不是被允許屬於正統，就是不被允許屬於正統。

大約在同時，我因為寫了非常不討喜的《到奴役之路》，使得自己在同輩的經濟學者中名譽盡失。因此，不僅我的理論影響力走下坡，大部分的科系也不喜歡我，影響之深，我到現在還能感覺到。經濟學家大都把我看成是個圈外人，是個自貶身價寫了本像《到奴役之路》之書的人，而《到奴役之路》現在已經完全變成政治科學了。

最近人們對我所提的這種問題又開始感興趣了，希克斯的作品可

能是最明顯的表現，但是卻有一段長達二十年的時間令我深深後悔，我曾經在凱因斯死後一度跟我的妻子提過，凱因斯現在死了，我可能是僅存最知名的經濟學家。但十天之後，這句話不再是真了。那時節凱因斯成了個大人物，而人們卻逐漸忘了我是個經濟學家。

另一個原因，你知道的，是在那之後我只偶然地研究經濟學。我猜想還有另一方面。我對總體經濟學或計量經濟學從來沒贊成過。拜凱因斯的影響，這兩門學科在那個時期成為顯學。就總體經濟學面言，理由是很清楚的。凱因斯本人對計量經濟學不僅沒有很高的評價，反而有負面的批評。但是因為他強調總量、總合所得、總合需求，也就激勵了總體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的研究。因此，他成為數學計量經濟學這一發展的精神領袖，這和他自己的意願實在大為背道而馳。因為我總是對此表示懷疑，所以在這一代主流的經濟學家中，我不太受到歡迎。人們把我想成是老古板，不贊同現代觀念之流。

※ ※ ※

問者6：您覺不覺得您在芝加哥對芝加哥學派有所影響？

海耶克：我原先對賽蒙斯寄予厚望。他的死實在是個大災難。其他人是屬於方法論方面的，他們實際上是總體經濟學家而不是個體經濟學家。史蒂格勒(George Stigler)一點都算不上，弗利曼很可以稱得上是。這對我一直是個問題。弗利曼和我除了在貨幣政策外，其他各方面的見解幾乎完全一致。由這點來看，老一輩的人認為這層倫理是源自於米契爾所創立，由伯恩斯(Arthur Burns)領導的國民經濟研究院(Institute of National Economic Research)[國民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伯恩斯也是我的朋友，但在經濟學上，我們

不同路——而且就方法論而言，他們實際上是邏輯實證主義者。他們認為經濟現象可以被當成總體現象來解釋，可藉由總和及平均以求得因果。雖然就某方面來看好像沒錯，但是並沒有必然之關聯。其實我應該比較喜歡用歷史來說明每次通貨膨脹都是以崩潰收場。但是史實的說明並不能證明一定如此。而發生的原因又不能以總體經濟分析來解釋。

弗利曼不過爾爾。如果你能和史蒂格勒討論的話，他倒是可以看出問題。芝加哥學派還有一位最有天賦的學者之一就是貝克(Gary Becker)，從理論上看，他也是一個比較沈潛的思想家。但是弗利曼說明的能力非常強。他幾乎什麼事情都碰，一般市場問題的看法也正確，我希望他跟我是在同一邊的。你知道的，我常常公開說我最後悔的事情之一是沒有回頭批評凱因斯的《論貨幣》，但是沒有批評弗利曼的《實證經濟學論文》(*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也同樣令人遺憾，因為就某方面看來這也是同樣危險的一本書。

※　※　※

問者2：你寫了景氣循環理論之後所發生的經濟大事，是強化了還是弱化了你對奧地利景氣循環理論的觀點？

海耶克：整體而言，是強化了，雖然我現在比較能清楚地看出，原先的理論只是個非常一般的輪廓，還必須補以細節。我賦予該理論的特別形式是與黃金本位的機制有關，這個機制容許信用擴張到某一點，然後再令特定的逆轉成為可能。我始終知道，原則上以急速升高通貨膨脹來刺激擴張所能維持之期間並沒有一定的時限。但是我順理成章地認為，金本位的形式有其內造的停止機制，而在這方面我對戰後發

展所作的診斷出了點差錯。我知道榮景終究會崩潰，但我所定的期限沒有其實際所經歷的那麼長。我是沒有預期通膨式的榮景可以維持比方說二十年之久。

另一方面，我和大部分的朋友一樣，不相信緊接著大戰之後會有立即的蕭條，我原來預期通膨式的榮景會出現。我以為通膨式的榮景會像過去的歷史一樣持續個五、六年，但是卻忘了當時已經停止採用金本位了。換言之，如果沒有金本位，通膨能持續更長的時間，就很難預言榮景要持續多長。當然，持續的時間是比我預期的要長。但最後的結果卻是一樣的。

問者2：奧地利學派的循環理論，非常依賴於景氣預期乃是錯誤的之說。那麼，你覺得經濟學家憑什麼斷言有關未來的預測通常都是錯誤的？

海耶克：我想通常的情形是榮景總是伴隨著投資的大量增加，大部分的投資後來都證明是錯誤的。這一點，當然符合表面上的資本供給其實並不是真正存在的想法。刺激帶來大規模投資緊跟著資金嚴重缺乏，這種狀況符合備受貨幣影響這種誤導的想法，而我依然認為一般的架構是正確的。

但是這可以有許多修正的方式，特別是與額外的錢到哪去了有關。你知道嗎？這一點我也是過分以戰前的情況為例，那時確實是所有的、或者說幾乎是所有的信用膨脹都進到私人投資，結合成產業資本。但是戰後，許多信用膨脹都流到政府導引的地方，因此誤導不再只是在產業資本的過度投資，而可能有各種形式。必須根據每個特別的時期和情況分開來研究。我想典型的景氣循環已經不存在了。但是加以各

種修正還是可以得到非常相似的現象。

問者2：你已經稍微說了一下你和社會主義份子對計算方面的辯論。你覺得辯論對於社會主義的理論有什麼影響？

海耶克：當然有些立即的影響。當米塞斯挑起辯論的時候，當時還非常流行一種想法：價值根本不必要計算。然後出現的想法是，可以用數學計算來取代價值；再來才有社會主義競爭可能存在的想法。這些都逐漸地消聲匿跡了。但是，在我現在看來，米塞斯沒有完全成功的原因，正是因為他使用了「計算」(calculation)這個詞。別人就是想不出為什麼計算是必須的。

我的意思是說，現在當我回顧當時的討論，米塞斯說計算是不可能的，我可以[了解]這個回答：我們為什麼要計算？我們有技術資料。我們知道自己想要什麼。那麼，幹嘛要計算？如果米塞斯不是簡單地說沒有市場，計算是不可能的，而是主張如果沒有市場，人們就不知道該生產什麼，該生產多少，該如何生產，那麼別人可能會了解他所說的。但他從來沒有這樣說過。他以為每人都會了解他，但顯然人們並不了解他。

問者2：你認為這場辯論對減緩國家經濟計畫在西方世界的擴散到達何種程度？

海耶克：嗯，這個想法又再復活了。國家經濟計畫原本已經式微，但是兩年前[1976]美國韓福瑞(Hubert Humphrey)參議員所提的計畫法案，加上李昂提夫(Wassily Leontief)的煽動，還有那些迎合的人，使我很驚

訝人們又重拾我以為早已被完全棄絕的東西。當然，李昂提夫對經濟計畫依然還是深信不移的。我不認為他曾經了解任何經濟學，不過，這又是另一回事了。

問者2：你認為一般均衡分析對於人們相信國家經濟計畫是可能的有多大影響？

海耶克：當然是有影響，影響有多大很難說。均衡分析對於我們所觀察的事件之解釋有直接的關係，這一點我從來沒有任何懷疑。我覺得這是解釋一種秩序非常有用的概念，這是經濟學的發展一直想做卻似乎沒有做到的。現在我想把一些經濟學的概念描述成河流而不是一股均衡的力量，說得明白點，我們應該以在不規則河床上水流之決定因素來思考。這會使我們對秩序有較清楚的概念。

但是，最後當然會回到經濟學家重複稱為「已知資料」(given data)的假設，這個荒謬的概念是說，如果你假設你知道所有的事實，那麼你從這個假設所得到的結論可以直接用到世上。我對這點的全部思考是始於我的老朋友賓漢開玩笑說，經濟學家說到已知資料，只是要讓他們自己確定已知的真的是已知。這使我在某種程度上要問資料到底對誰是已知。對我們而言，當然是沒有特定的人。經濟學家假設[資料]是他已知的，但這只是虛構的。實際上，沒有人知道所有的資料或是整個過程，這也使我在1930年代想到整個問題是資訊的利用散佈在數以千計的人群當中，而不是由任何人所擁有。如果你這麼看，就會很清楚均衡的概念對你的計畫毫無幫助，因為只有在你知道所有人所知道的所有資料才可以計畫，但是你不可能全部知道，因此整個計

畫是空忙一場，還有，認為任何人都知道確實的資料這一錯誤的認知，也是由這個概念所引起的。

問者2：你是否認為數學在經濟理論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海耶克：是的，但那是代數(algebraic mathematics)，而不是定量數學(quantitative mathematics)。代數和數學是描述某些類型很棒的方法，且與規模的大小無關。曾經有位偉大的數學家說過：「數學的精華是為類型塑形(making of patterns)」，但是數理經濟學者通常對數學不甚了解，因此會認為有力的數學必須是定量和數字的。一旦你接受了這種信念，我想事情就會變得相當誤導——至少在涉及一般理論時是會造成誤導。我並不否認，在提供事件的現狀方面，統計數字非常有用，但是我不認為，統計資料對過程的理論解釋有任何的貢獻。

問者2：你對賽局理論(game theory)的評價如何？

海耶克：我不想對我的老友，已故的摩根斯坦不敬，雖然我認為他的書在數學上是項偉大的成就，但是其中有關經濟學的第一章卻是錯誤的。我不覺得賽局理論對經濟學有什麼真正重要的貢獻，但這是個非常有趣的數學訓練方法。

※　※　※

問者7：你希望看到過去三十年的發展在未來會有多大的逆轉？從目前為起點，你覺得社會會演化成什麼樣子？

海耶克：我的目標還是希望能完全消除所有對市場的直接干預——所有的政府服務必須完全在市場之外完成，包括所有給不能在市場謀取

適當所得的那些人提供最低補助。[那時候就不會]有人想要控制市場的運作，僅止於在市場外為每一個人提供一平準最低收入(flat minimum)。當然，這實際意味著完全泯除其社會正義的一面，這指的是積極為無法在市場賺得最低工資的人，保證取得高於最低固定收入所進行的重分配那部分。福利國家的所有其他服務不過是程度的問題，要看組織管理得怎麼樣。我並不反對政府提供大量的服務，但是我確實反對政府有任何壟斷的情事。當某些服務唯有政府才能提供時沒有問題，但應該讓別人有機會嘗試去做做看。

問者7：這麼說來，比方說如果沒有把私人生產排除在外，那麼你就不反對政府提供服務了？

海耶克：沒錯。當然，這裡有一大困難。要是政府這樣做——而供應價格低於成本——私人便沒有機會加入競爭。如果政府要銷售服務，我希望強制政府要按成本來經營。

問者7：即使是有關對需求的融資也如是。你說你容許政府提供最低限量服務，那麼接著你有沒有想到特別、特定的功能，比方說保健醫療，還是只單想到所得的最低標準？

海耶克：只是所得方面。看了英國國家健保局(British 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例子，更加深了我的疑慮。毫無疑問地，短期之內會對原來無力獲得的人提供服務，但是卻會阻礙醫療服務的進步，而醫療就和其他任何的領域一樣，競爭是進步的基本要件——這一點我毫不懷疑。又因為大部分的英國人都不喜歡這個作法，大家卻都認為不再可能逆

轉回來，所以這才糟糕。

問者7：但重點在是否有競爭，而不在政府是否也從事這些活動？

海耶克：確實沒錯。但你要注意我現在甚至將此延伸到貨幣方面。

問者7：是的。我正要提出這點。最近你又回到早期對貨幣理論的興趣。首先，請容我問您，為什麼你最近又把注意力放在貨幣上。這是你1930年代某時期的興趣。

海耶克：我和幾乎所有朋友之間有一個差異，他們贊成彈性匯率，而我則贊成固定匯率，這一點我是有智性上的論據的。我之所以會得到想要固定匯率的結論，不是由於我認為這一定是比較好的制度，而是[因為]這是政府存在的唯一領域。如果你放任政府不管這個領域，我已經研究過在不同的情況之下，民主的作法必然會走向通膨之途。雖然，我為固定匯率辯護的理由就某方面來說是很單薄的。但我也只是因有人想以彈性匯率來加速通貨膨脹，才會反對廢棄固定匯率。

當德國和瑞士出現這個爭論的時候，當時是以此來對抗進口通貨膨脹，我是支持採用彈性匯率的。事實上，我曾經在德國說過德國守住固定匯率太久了，所以被逼得通貨膨脹，原來是不應該這樣的。德國聯邦銀行(Bundesbank)的人跟我說他們已經警覺到這一點，但還是希望固定匯率的制度能壓抑[美國的]通貨膨脹所造成更多的通貨膨脹，而且他們還故意吸收部分通貨膨脹，以避免世界其他地方通貨膨脹得太厲害，這種說法更證實了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大概是這樣。但是，那當然又使我想到這到底是不是貨

幣政策最好的原則這個問題，並且使我了解到我一向視為理所當然的金本位，可能是政府在政治上唯一可行的原則，永遠也不能恢復了。即使名目上恢復金本位都無效，因為現在沒有政府願意遵守金本位的規則。

這兩件事令我得出結論——剛開始我只是當作諷刺性的笑話來說——也就是：只要政府追求像目前一樣的政策，除了由他們手中拿走貨幣的控制權外別無選擇。但是，這又使我想到一個很有趣的問題，那就是如果貨幣的供應可以自由競爭，會是個什麼情形。這將開啟貨幣理論全新的一章，而由於發現還有許多問題尚待釐清，使這個題目對我不再有多大吸引力。不過，在我進行主要書本寫作時，順帶也寫了兩本論貨幣非國家化的小冊子，我還是想寫一本有系統的專書，我想把書名叫作《優良貨幣》(*Good Money*)。以討論什麼是真正的優良貨幣開始——我們到底希望貨幣有什麼功能，然後再討論若是以該標準來看，貨幣競爭性的發行能提供什麼樣的優良貨幣。

問者7：你同不同意這方面最重要的步驟並不是由誰發行貨幣，而是把私人定契約時使用的所謂計算單位和政府發行的法幣及類似行為分開？

海耶克：是的，也可以這麼說。你知道的，我之反對歐洲共同貨幣的想法，是從說這番話開始的：為什麼不乾脆允許所有其他的貨幣來和你的貨幣競爭，如此就不需要有標準貨幣。人們會選擇其中最好的。如此一來又使我引伸到：為什麼要限制成是其他政府的貨幣，為什麼不讓私人企業來供給貨幣？

問者7：不過，說到這裡會把問題延伸到你其他方面的著作，當然，包括《法律、立法和自由》，我想這不僅困擾了我，也困擾了其他一些人。西方國家先是放棄金本位，然後就是放棄你所稱的固定匯率的原則(我同意是有個原則)：這個過程算不算是個演化的過程，而你的這些提案實際上難道不是在理性上想要重新建構，在理性上想要否定演化的過程？

海耶克：不是的，只有在政府力量所設定的限制之內才是演化的過程。即使是在控制之內，依然還是有演化的過程，但是因為政府的力量排除了非常多的選擇，因此不是真的能夠嘗試所有可能的過程，而是由現行法律所許可，局限於少數可能性的有限過程。

問者7：但是你曾經指出民主政府的發展終會導致全能政府，而確實是有往那個方向走的趨勢，這難道不是社會演化的過程嗎？

海耶克：同樣的，這是賦予政府無限權力所不可避免的結果，這排除對其他形式實驗的機會。一人處心積慮的決定使我們走上單向的軌道，排除了其他替代性的演化。當然，就某種意義而言，所有的壟斷性政府都限制了演化的可能。我想如果政府能夠自我限制在落實一般行為的法則，對演化的限制會最少，但我還是要說，即使是非常好的世界政府也可能是個災難，因為這會排除掉嘗試其他替代方法的可能性。我完全反對世界政府。

問者7：任何形式都反對？

海耶克：是的。

問者7：至於說道什麼樣的演化錯誤可以被，比方說，理性干預來矯正；你的回答會是，沒錯，有些發展的過程，其實際發展所採取的路徑是受到專斷決定的，方法是——

海耶克：——使用暴力來排除其他可能。

問者7：是的，只有這些狀況是你希望以社會結構的自發改變來干預的嗎？

海耶克：這要看你所謂的干預是什麼意思。這些是我唯一容許干預的情況，所謂干預是以一種替代方案來實驗，但是並不排除實際所發生的情形。我想甚至可以讓政府以競爭者的角色加入。我反對的是政府扮演了壟斷的角色，並有權排除其他的可能。

問者7：這麼說來，在某些部門，比方說，我們對私人的結果不滿意，你會——

海耶克：——讓政府也來試一試，和私人企業一起競爭。

※　※　※

問者6：是什麼使你又回到《感官秩序》的心理學上的想法？

海耶克：出版《到奴役之路》後，我覺得自己在專業上大大地自取其辱，所以我不想再冒眾犯。我希望能被科學界所接受。我希望能作一些純科學且不受我經濟觀點影響的研究。我原本以為我可以用一個夏天來完成，然後寫成一篇很不錯的英文論文，但是結果花了我三年多的時間。

問者6：但是《感官秩序》並非真的和你的經濟觀點無關；這本書把你的經濟觀點結合起來。

海耶克：確實。不過在做的當時並不覺得，回顧的時候才發現的確如此。我必須說我由1920年的第一階段和1940年代所得到的洞見——現在我可不能這麼說了——可能是我碰到最刺激的經歷，這些事件形成我的思考模式。且其作用是雙向的。我在經濟學上所做的有助於我在生物學上的研究，反之亦然。

※　※　※

海耶克：你讓我想起了過去。我有點猶豫，因為聽起來好像有點自誇，其實不是，是一種自我發現。說起來我有點無畏無懼，我是指實質上的。這不是勇氣。只不過我還沒有真正害怕過，我是在戰時發現這一點的。年輕人如果天不怕地不怕，就容易遭致危險，這是很平常的，但是我從來沒有真正害怕過死亡，這和某一種穩定性有關。有人在高處會有暈眩的感覺，我也沒有這種經驗。

問者6：大戰的時候你擔任砲兵的空中偵察員進行空中任務的時候也必然無所畏懼吧。

海耶克：是很刺激的。但是並不是害怕。有一次我們真的被義大利人逮著了。有一架直昇機從前面向我們開火。他們開始射擊的時候，我的駕駛，是個捷克人，開始盤旋下降。我解開安全帶，爬在欄杆上。我的駕駛剛好在要碰到地面時把旋轉狀態給矯正好。真是刺激。

問者6：要是我就嚇死了。

海耶克：也許你可以有不同的說法。我少了幾根神經。我想我這是得自我母親的遺傳。她就是那個樣子。

問者6：還有你跟我說過的那個剛強的姑媽。我可不可以提出別的問題？你有一本書中寫到孟格的問題，以此來解釋沒有目的的制度，我在想是不是有什麼我們可以稱作海耶克的問題的？某些一直離不開你，或是你一直在研究的。

海耶克：複雜秩序的形成和辨識。

問者6：那是什麼時候開始變成你研究的問題？

海耶克：很難說我什麼時候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我在作科學方法的研究時，意外的發現複雜性和程度的問題，而要運用同樣的原則並不是那麼困難。我想也許你可以追溯關鍵的時刻是我在獲得「原則的解釋」的想法時。

問者6：那是在《感官秩序》中，同時也可見於你為《英國科學哲學期刊》(*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所寫的〈解釋的程度〉那篇論文[1955]。你對許多不同難題的研究湊成一個很出色的結合。你可不可以指出在1920年代早期，有沒有什麼主要的問題？

海耶克：早年我心裡所想的完全是實際上的考量，希望能夠找到自己的道路，我還沒有完全了解我要這麼做是需要一個理論的。我在找一個理論，但是卻還不知道理論到底是什麼。

※ ※ ※

問者3：已故的偉大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熊彼得在1942寫了《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熊彼得在那本書中預言資本主義的崩潰不在於(像馬克思所預言的)它的缺點，而在於其優點。說得明白一點，資本主義的種子會帶來高度的經濟富裕，也會產生一個官僚和行政人員充斥的年代，以取代使這些美夢成真的改革者和企業家。而這又會破壞資本主義所倚賴的社會結構：對私有財產的廣泛接受和尊敬。熊彼得有關資本主義固有的政治不穩定之論文，和你自己論我們到奴役之路的理論有什麼一致的地方？

海耶克：預測的本質有些相似的地方。不過熊彼得是大玩似非而是的弔詭。他語出驚人地說資本主義當然是好得多，但是不會持久，而社會主義雖然很糟，但是一定會到來。他就是喜歡這種弔詭。

在這預言之下他很正確地觀察到，有些輿論的趨勢是不能逆轉的。雖然他持反面的主張，但他並不真的相信辯論能作為最後的力量。他理所當然地認為事情的狀態強迫人們以特殊的方式來思考。

這一點基本上是錯誤的。要了解人們在某些情況之下必然會相信某些事情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思想的進化有其自己的法則，而且相當程度是倚賴著我們無法預測的發展。我是說，我是嘗試把輿論引到某一方向，但是我不敢預測到底確實會走到那個方向。我只希望我能稍微改變一下它的方向。但是熊彼得的態度是對理智的力量完全絕望，不存有任何幻想。

問者3：你對自由的未來是否樂觀？

海耶克：是的。有條件的樂觀。我想知性的復甦已在進行，很可能在往反方向走到無法逆轉之前會及時來到。我比二十年前還要樂觀，那時候所有的意見領袖都希望走向社會主義的方向。這在年輕的一代已經有明顯的改變。因此，如果改變及時到來，還是有希望的。

本書所提文獻

Boring, Edwin G. Review of *The Sensory Order* in *Scientific Monthly* (March 1953).

Carnap, Rudolf. Letter to Karl Popper. In the Popper-Hayek correspondence in the archive of the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California. (First referred to by Hayek in the preface to the 1976 edition of *The Road to Serfdom*.)

Catchings, Waddill, and William Trufant Foster. *Money*.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23.

Friedman, Milto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and London: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53.

Galbraith, John Kenneth. *A Life in Our Tim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1.

Hayek, F. A., ed.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1935. Hayek's contribution reprinted as chapters 7 and 8 in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0.

——.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2.

——. *Geldtheorie und Konjunkturtheorie*. Vienna and Leipzig: Holder-

Pichler-Temsky, 1929. Translated by Nicholas Kaldor and H. M. Croome as *Monetary Theory and die Trade Cycle.* London: Jonathan Cape, 1933, an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3.

——.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48.

——. *John Stuart Mill and Harriet Taylo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51.

——.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3 vol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73-79.

——. Letters to Karl Popper. In the archive of the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California, 1952, 1960.

——. *Prices and 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1931.

——. *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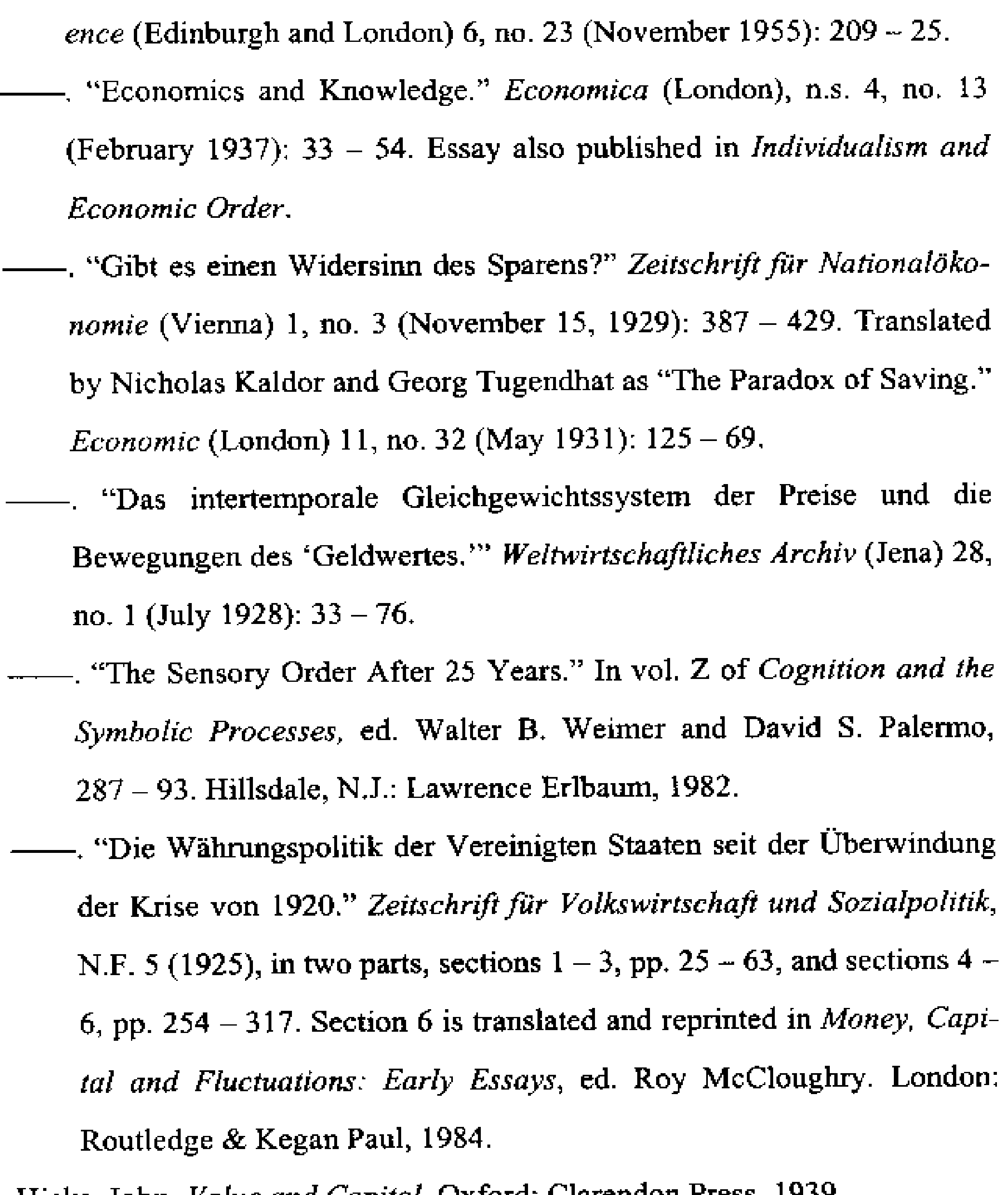
——. *The Road to Serfdom.* London: Routledge and Sons;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44.

——. *The Sensory Order.*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52.

——.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7. Includes "Degrees of Explanation," "Rules, Perception and Intelligibility," and "The Theory of Complex Phenomena.

——. "Das amerikanische Bankwesen seit der Reform von 1914." *Der Österreichische Volkswirt* (Vienna) 17, nos. 29 – 32 (April 18 & 25, 1925; May 9 & 16, 1925).

——. "Degrees of Explanation."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



ence (Edinburgh and London) 6, no. 23 (November 1955): 209 – 25.

——. "Economics and Knowledge." *Economica* (London), n.s. 4, no. 13 (February 1937): 33 – 54. Essay also published in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 "Gibt es einen Widersinn des Sparens?" *Zeitschrift für Nationalökonomie* (Vienna) 1, no. 3 (November 15, 1929): 387 – 429. Translated by Nicholas Kaldor and Georg Tugendhat as "The Paradox of Saving." *Economic* (London) 11, no. 32 (May 1931): 125 – 69.

——. "Das intertemporale Gleichgewichtssystem der Preise und die Bewegungen des 'Geldwertes.'"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Jena) 28, no. 1 (July 1928): 33 – 76.

——. "The Sensory Order After 25 Years." In vol. Z of *Cognition and the Symbolic Processes,* ed. Walter B. Weimer and David S. Palermo, 287 – 93.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1982.

——. "Die Währungspolitik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seit der Überwindung der Krise von 1920."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N.F. 5 (1925), in two parts, sections 1 – 3, pp. 25 – 63, and sections 4 – 6, pp. 254 – 317. Section 6 is translated and reprinted in *Money, Capital and Fluctuations: Early Essays*, ed. Roy McClough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Hicks, John. *Value and Capita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9.

Keynes, John Maynard.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Churchill* [1925]. Vol. 9 of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London: Macmillan, 1971.

——.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1919]. Vol. 2 of *The Collected Writings*. 1971.

——.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1936]. Vol. 7 of *The Collected Writings*. 1973.

——. Letter to Hayek about *The Road to Serfdom* [June 28, 1944]. In vol. 27 of *The Collected Writings*, 385 – 88. 1980.

——. *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1923]. Vol. 4 of *The Collected Writings*. 1971.

——. *A Treatise on Money* [1930]. Vol. 5 of *The Collected Writings*. 1971.

Lachmann, Ludwig M. *Capital and Its Structure*. London: Bell, on behalf of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1956.

Mach, Ernst. *Analysis of Sensations*.

Menger, Carl.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Vienna: W. Braunmüller, 1871.

Mill, John Stuart. *Autobiography of John Stuart Mill*.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24.

——. On *Liberty*, ed. McCallum.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1946.

——.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insbesondere*. Leipzig: Duncker und Humblot, 1883.

Nef, John U. *Search for Meaning: The Autobiography of a Nonconformist*. Washington, D.C.: Public Affairs Press, 1973.

Pigou, A. C. *Economics in Practice*. London: Macmillan, 1935.

Popper, Karl. *Logik der Forschung, zur Erkenntnistheorie der modernen*

Naturwissenschaft. Vienna: J. Springer, published in the autumn of 1934 with the imprint "1935." Translated as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London: Hutchinson, 1959.

Proust, Marcel.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Translated by C. K. Scott Moncrieff. London and New York: Thomas Seltzer, 1924.

——. *Swann's Way*. Modern Library edition, 19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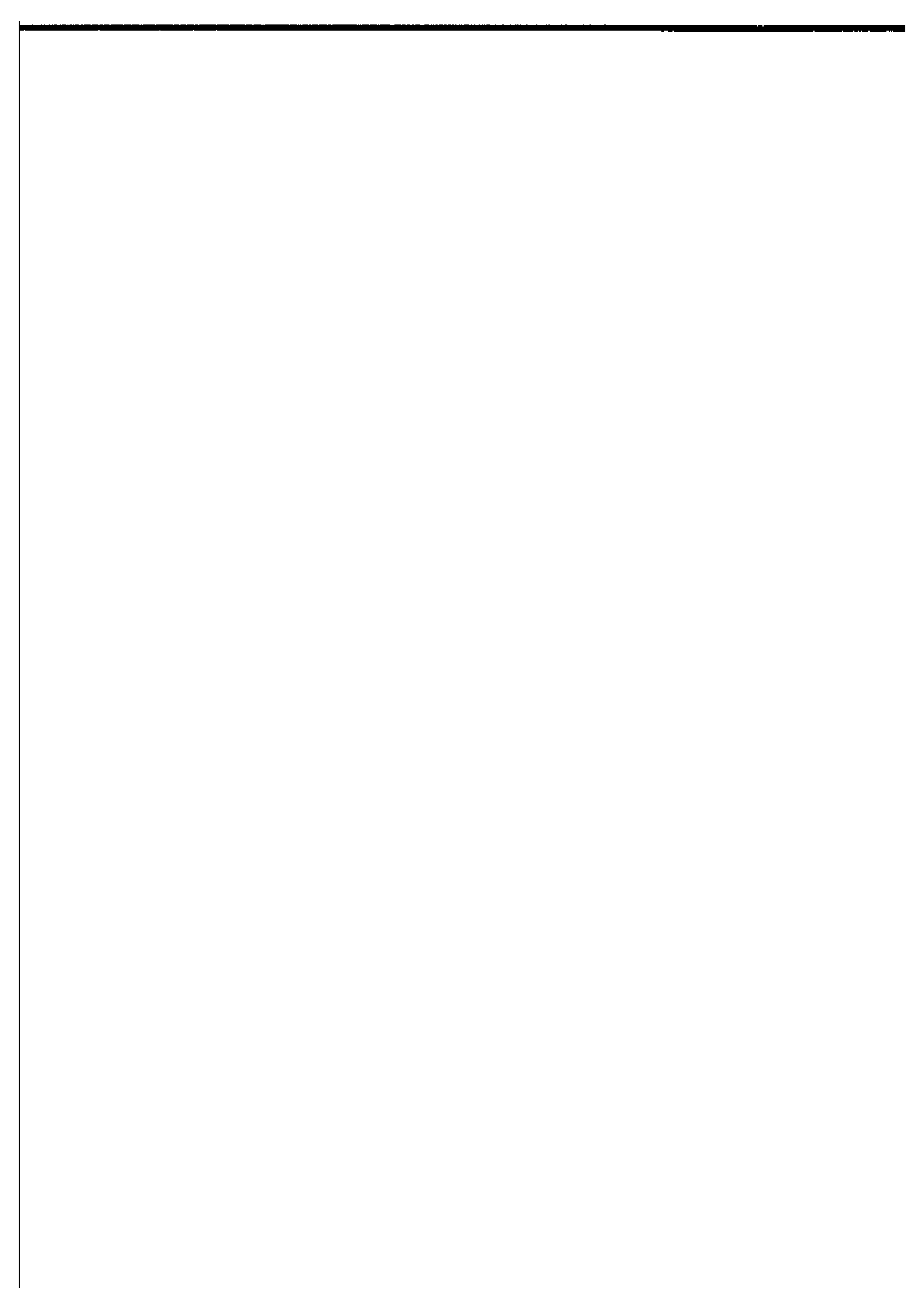
Schlick, Moritz. *Allgemeine Erkenntnislehre*. Berlin: J. Springer, 1918.

Schumpeter, Joseph.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and Bros., 1942.

Spann, Othmar. *Fundament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Jena: G. Fischer, 1918.

Weismann, August. *Vorträge über Deszendenztheorie*. Jena: G. Fischer, 1902.

Woolf, Virginia. "Mr. Bennett and Mrs. Brown." In vol. 1 of *Collected Essays*, ed. Leonard Woolf.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6. Originally a paper read to the Heretics, Cambridge, on May 18, 1924.



人名和地名索引

編者註：此處所提供的資訊，旨在梳理對海耶克在觀點和事業上之發展有關的某些人物之間的關係。

中文版編按：除原有索引之外，中文版索引增補了以下三類條目：1.所有著作；2.原書索引未列之人名；3.一些特殊詞語。

A

B

D

E

F

G

H

I

J

K

M

N

O

Ö

P

R

S

U

V

W

Z